

世界歷史名著叢刊

社會鬥爭通史

第五卷

現代社會鬥爭史

Max Beer 原著

葉啓芳 譯

神州國光社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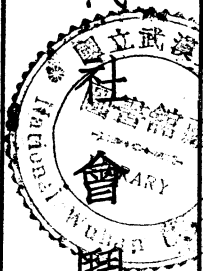
世界歷史名著叢刊

社會鬥爭通史

第五卷

Max Beer 原著
葉啓芳 譯

現代社會鬥爭史



神州國光社出版

譯餘贅語

去春二月，漫游滬濱，雪大風高，閒居無賴。讀德儒柏年新著社會鬥爭通史前四卷之英譯本而善之。念此佳著，允宜漢譯，以供同好。從着手開始至殺青，費時凡二閱月。出版問世，猶春寒料峭也。友好讀者，勉掖有加，均囑全譯五卷，俾窺全豹。惟末卷于一九二九年修訂，增新材頗多，英譯本則至今未出。自忖德意志語，雖曾研習短期，而欲藉之以爲漢譯之根基，竊病未敢。去秋倦游南返，蟄伏荔子灣頭，得柏耳書之最新改版者，讀書之暇，勉譯爲漢文。其有未明，得諸友人陳羅諸君之力不少。然是中如有錯誤，過仍當自負也。書之末章第三節內，曾妄爲刪去一句，其意猶日本社會科學卷藉之有×××符號耳。本卷頁數雖不多，然因原本爲德文，非常吃力，所費時間，爲三閱月，

比從英譯譯來之前四卷的總時間，猶爲過之。至其中錯誤之點，深知不免，爲得早窺全豹，暫付剞劂，一俟英譯本出，將參校而改正之也。大雅君子，惠予指正，則不勝謝矣。

一九三一年三月五日譯者誌于廣州昌華故址

社會鬥爭通史序

胡漢民

德國學者 Max Beer 著「社會鬥爭通史」，以鬥爭的唯物論和社會主義的觀點，分析有史以來一切社會的鬥爭；內容證引極宏博，編排極精審，敘述極深刻，是一部歷史的名作。全書共五卷，其中四五兩卷，我於民國十五年在上海讀書賣文時，曾根據日譯本把它翻譯出來，交民智書局出版，題爲「產業革命時代社會主義史」和「馬克思主義時代社會主義史」。我當時譯這兩卷書，有一個小小的意思：以爲國內的「智識份子」，雖有一部份在大談其唯物論，可是當時所談的，實在很淺薄，至於能運用唯物史觀方法去解釋歷史的，所見更稀。我譯這兩卷書，一方面想介紹這唯物史觀的方法之應用。這個意義，是相等於我從前做「唯物史觀的倫理之研究」的。一方面我從產業革命時代譯起，要

我們明瞭近兩世紀西歐社會主義思想的演進，究竟是一個怎樣的情形。

最近葉啓芳同志，把 Max Beer 的這部「社會鬥爭通史」，全部譯出來了。葉同志是根據史天甯 (H. J. Stenning) 的英譯本譯的據說史氏的英譯本，曾經過原作者的校訂，則這部英譯本的可靠的程度，當在我所根據的日譯本之上。前數天接到葉同志的信，并附譯本四冊，以我會譯過此書的四五兩卷，具有因緣，希望我為這書的合訂本寫一篇序。信中還說：「該書雖全述西土社會，不及吾邦，然其主張鬥爭，持論未純，允宜於序文中加以糾正，俾惠後學而伸正理」。惠後學與否，是一件事，可是以唯物論的觀點，來解釋社會的進化，最後并歸著於階級的鬥爭，這一層，我却有一點單簡的意思，要稍加申說。

孫中山先生在民生主義的講演中，曾有過這樣的一段話。

「古今人類的努力，都是求解決自己的生存問題。人類求解決生存問題，才是

歷史的重心。馬克斯的唯物主義，沒有發明社會進化的定律，不是歷史的重心。」於例舉了若干關於社會進化的事實之後，孫中山先生又說：

「古今一切人類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為要求生存。人類因為要求不間斷的生存，所以社會才有不停止的進化。所以社會進化的定律，是人類求生存。人類求生存，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階級戰爭，是社會當進化的時候所發生的一種病症，這種病症的原因，是人類不能生存，所以這種病症的結果，傾起戰爭。……再不可說物質問題是歷史中的中心，要把歷史上的政治和社會經濟種種中心，都歸之民生問題」。

孫中山先生這兩段話，單簡明瞭。在民生主義中所舉的實例，更其極「能近取譬」之能事。Max Beer 的這部「社會鬥爭通史」，是純乎站在鬥爭的唯物論的立場上來解釋歷史的。換言之，是純乎以馬克斯的唯物史觀的觀點來分析社會的鬥爭的。所以他的根本

主旨，顯然與孫中山先生不合。甚麼是馬克斯的唯物史觀的教義呢？這類文獻，多不勝舉。馬克思在他的「經濟學批判」裏，有一段最基礎的說明，茲錄其一節如次：

「人類在他們生活之社會的生產上，加入於一定的，必然的，非他們意志所能支配的一種關係裏面，就是加入於生產關係裏面。這生產關係，是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的。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之經濟的構造，這經濟的構造是法制上政治上的上部建築物所藉以存立的真實的基礎；而且一定的社會的意識形態，也是和這基礎相適應的。物質生活的生產方法，一般爲限制社會上政治上及精神上的生活過程的條件」。

「并非人類的意識，決定他們的存在；倒是他們的社會的存在，決定他們的意識」。

恩格斯和馬克思，同樣是所謂科學的社會主義之建設者，恩格斯在一八八五年馬克

恩所著三板 *Der achtzehnte Brum aire des Louis Napoleon* 的序言中說

「馬克斯是歷史進行的大法則之最初發見者。根據這個法則，一切歷史上的爭鬥，不問其為政治上，宗教上，哲學上的爭鬥，或是起于精神的方面的鬥爭，實在都不外是社會諸階級的爭鬥的——或則是較為明瞭或則是不甚清楚——表現。而這些階級的存在與衝突，又是由於經濟狀態的發達程度，由於他們的「生產」方法，「交換」方法如何而定的」。

從上文看來，所謂唯物史觀，正為孫中山先生所言，在認定：物是社會進化的定律。它以物為中心，以經濟為中心，社會的演變，都要以經濟的結構為說明。所以唯物史觀便不啻為一種經濟一元論。唯物史觀者認定由生產力，生產方法，生產關係以制定社會的全部經濟制度，由社會的全部經濟制度，建築起「制度的文化」來，如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等，社會之經濟制度，合之「制度之文化」。又制定我們的「精神的文化」度制

的文化，是第一層建築，精神的文化，在精神的生產方面的，如思想，哲學，主義等，屬於社會的心意形態的，如宗教，教育，道德等，是第二上層建築。生產力，生產方法，生產關係有變動。社會的經濟結構也變動，制度的文化和精神的文化，也隨之變動。總之上層的建築。其建立與崩潰都要以下層爲轉移。這便是唯物史觀的大較。

我并不全部否定唯物論者的學說，正如我并不全部否定唯心論者的學說一般，亦正如孫中山先生并未全部否定唯物論者與唯心論者的學說一般。我以爲馬克思的學說，未嘗不含有部份的真理，如闡明社會的互相關係，說制度的文化，會影響及於精神的文化，等等；如闡明人類的偏見，說人們重視其自身的利益，在任何場合，都以各個的利益爲前提，以此形成所謂階級的鬥爭等等。雖然這種見解很單簡，可是應用唯物論的方法來解釋歷史的時候，也往往頭頭是道。記得斯賓諾莎曾有過這樣的一句話：「真理是一串理論」。在某一範圍內，一個學說的倡導者，能把他的思想編配起來，把他的理論組

織起來，成爲一串，在這一串之中，能無所不通，如梳髮一般，梳得很順溜，並沒有什麼障礙之處，就髮言，這髮是梳通了，就學說言，則這一學說，在某一範圍內，便是真理了。所以所謂真理本是有限度的，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即使某一時期有其絕對性，但這絕對真理，也是由相對真理而成立的。關於這一點，恩格斯和列甯說得很清楚。恩格斯說：

「真理和錯誤，與一切流動在兩極對立中之思維，規定一般，在極有限制的領域內，具有絕對的妥當性。……假如我們在那個領域之外，要用作絕對妥當性的東西，必歸於失敗」。

至於列甯，他便是以絕對的真理爲相對真理之一總和的，他確信人類的思維能力，能給予我們以絕對的真理，而且能給予我們以絕對的真理。但他說：

「科學發達之每一步驟，對於絕對真理這種總和，加上新的份子。但每種科學

定理的界限，是相對的，並且因智識之繼續增加，會使這個界限縮小或擴大」。

恩格斯和列甯的話，是一種事實。在任何一門科學上，我們都可以找到實證。當然在這一論點之下，在某一個限度之下，我們同樣承認唯物論是未嘗不含有真理的，然而我們要記得：這僅僅是在這一論點之下和某一個限度之下。假如出了這一個限度，則唯物論云云，也如恩格斯所云「必歸失敗」。

根據這個認識，我們便可以來檢閱一下 Max Beer 的這部「社會鬥爭通史」。我已說過：Max Beer 的「社會鬥爭通史」，是站在鬥爭的唯物論的立場上解釋歷史的。這部著作的完成，完全是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學說之應用。固然，在解釋歷史方面，這部書未嘗不頭頭是道，如梳髮一般，梳得很順溜，因此如斯賓諾沙之說，并不能全部否定其為非真理。可是唯物史觀的應用的界限，應該在何處呢？唯物史觀的應用，是否「放諸四海而皆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呢？」我以為最好舉馬克思自己所謂的一個例。馬克思在他的

「工資勞動與資本」(Lohnarbeit und Kapital)裏，解釋關於生產的社會關係時，曾說：「例如所謂火器(銃砲)的新武器，一經發明，那軍隊內部的組織，必隨着全部改變，各個人所舉以組織的一隊，和作爲一隊所能夠行動的關係，必因而變換其形式。又各隊間的相互關係，亦必跟着同樣變化」。

新式武器的發明，影響及於軍隊內部的組織，這確恩格斯所說：「在極有限度的領域內，具有絕對的妥當性」的一個例。換言之：便是適用唯物史觀學說的一個最確切的例。唯其唯物史觀應用的界限，很分明與嚴格，所以如 Max Beer 的「社會鬥爭通史」，在以唯物論解釋社會進化史時，雖然似乎頭頭是道，可以在很多方面，確實未能把握到社會進化的實際。能把握到社會進化的實際的，不是「物」，不是「物」所產生的「鬥爭」，而是由於人類求生存の意欲。這便是 孫中山先生所說「因爲人類不間斷的求生存，所以社會才有不停止的進化」。

人類求生存，是一件最顯明而無待解說的事實。一個人要求生存，一家要求生存，一社會要求生存，一國家要求生存，一民族要求生存，一切的演變，都以求「生」這個意欲做原動力。孫中山先生還說：「人類保全生存的方法。一方面是覓食，一方面是自衛，爲要覓食，所以在人類社會進化史上，會由穴居野處的生活逐步推進到遊牧，農耕，小工業，以至近代資本主義的工業的生活。爲要自衛，所以會由洪荒時代混沌的生活，逐步推到神權時代，君權時代，軍國主義時代，以至現代帝國主義時代，的悽苦的生活。唯物史觀中經濟結構的基礎，所謂生產力，生產方法，只是爲求生而覓食的一種工具，其上層的建築，如制度的文化等等，只是爲求生而自衛的必要的設施。文化的轉變，經濟結構的轉變，都隨著求「生」的方式而轉變，把握住社會進化的原動力的，不是「物」而是人類求生存的意欲。所以根本的動力，仍然是「生」不是「物」。人類的意欲，是沒有盡心的，不能生，要求生，能生了，要求有富裕之生與暢遂之生；更明白的說：沒「有」要求

「有」，有了，要求「多有」。初時是要求維持生活，繼面是要求過豐裕的生活，最後是要
求過享樂的奢侈的生活。歸結起來，從無生到享樂之生，奢侈後之生的過程中，由一切
努力所發生的種種現象。種種變遷，都只是求生存一念的演變。我可斷定：Max Beer
的這部「社會鬥爭通史」，全部便是以生為中心的這個事實的說明，而與求生之貪慾的無
限度之發展相反的，便是社會主義思想的膨脹與建立。

在第一卷第四十七頁中，Max Beer 敘述到猶太社會主義。禁慾派時，引猶太
知識主義者菲羅(Philo)的話說：

「柏勒斯廷有四千個禁慾派的善行人生著，他們居於村落之中，避免城市之紛
華，因為放恣與淫佚，是城居人所慣常的。……他們不積聚金銀，也不須要地土，
以獲大部份之收入。他們祇是勞工作以賺得生活供給的必需手段。所以他們是無財
產擁有的人，其原因并不由於機會之不幸，而祇由於他們不追求富有。……他們輕

視統治者及官吏，不特因為他們破壞平等，反抗公義，不因為他們不信上帝，消滅自然組織。……一切東西，都係真正而可愛的兄弟一樣，有一種關係，只是這種關係，被勝利的狡猾及貪婪所毀滅了。把荒疏替代信賴，把憎恨替代仁愛，禁慾派所學習的，是有神，聖潔和公道之原理。所謂公道，不特在政治組織及某團中，也在善惡之認識中，所以他們接納三種道德概念和原則，就是愛上帝，愛道德，及愛人類。愛人類之表示，就是慈善，公平，與物品之公有」。

我當時偶然翻到這段話，我不自己的提起筆來，批上書眉道：「人類社會間的一切紛爭起於貪，貪即為滿足自己生的要求。猶太之禁慾派，以戒貪為第一義，以淡泊，公義為第一義。這便是祇求生，不求享樂之生與奢侈之生。總理說：「階級鬥爭，祇是當社會進化時所發生的一種病症，於此更得一證明」。其實，像這樣的例，在這部「社會鬥爭通史」中，連篇而是。所以：

(1) 在本書第三章，斯巴達社會主義之實施：黎哥爾格斯，(Lycurgus) 之法制項下，Max Beer 引用潘勒德爾茲(Plutarch)的話說：「黎哥爾格斯之第二種而且是最勇敢的革新，是土地之重新分配。因為他覺得當時存著一種非常之不平等，城市中充塞著無片土寸地的貧民，而財富全集中於少數人手裏，所以他決意把傲慢，妒忌，貪慾，及奢侈等罪惡從根拔除，而且把一個國家中所習以為常和定命的惡性，一律掃除淨盡。……唯一的區別，祇由於鄙視惡行和崇拜善德而已。(第一卷第六十四頁)

把這個意思說得最明顯的，是：

(11) Max Beer 引用海西德關於希臘大哲拍拉圖的記述。他說：「他(拍拉圖)以一種頗為神祕的態度，論證人類一代一代地智能墮落發生爭論，很多為金錢，貪慾，土地，房屋，金銀貨幣而互相競爭，於是而有彼此反抗的戰爭。後來人們

便互相同意，把土地房屋分配起來，私有財產成立了，人民方面便分成統治者及被統治者」。又說：「當一個獨立的個人，請求他人幫助的時候，他祇在與他人合作之中，才能滿足他的軀體之需要。因此人便協助起來，組成一個國家，每一個公民，都有他自己的職業。……他們把自己的生產品，互相交易，由是故有商業及金錢，不久人們又不單純以必需品為滿足，他們更要求各種奢侈品，裝飾及淫佚，便爾發生，更產生貪慾和征服之戰爭，由是而武力之製造成為必要，國家更成複雜了，貧民均有存在，內部之和諧消滅，國家內部，分成兩個仇視之集團」。拍拉圖的最後希望，是「祇要除去地主之貪慾，主張公義」。要做到「一切物品，朋友與共」。（第一卷第九十三——至九十九頁）

接著我們可以看看亞里斯多德的意見：亞里斯多德在某一方面看，雖然非難拍拉圖，反對社會主義，可是他的意見，却是我前述「求生的意欲」之發展的有力的提供。亞里

斯多德說：

(三)「所要平均的，不是產業，而是人類的想望。……人類中有希望滿足某幾種把他捕捉著的熱情，也有切望着享受不必痛苦而可以得愉樂。這樣，他們便犯罪了。然則怎樣可以救治這三種疾病呢？對於第一種，要有適度的產業及職業；對於第二種，要有求節制的習慣；對於第三種，假若他們希望愉樂，則他們應該曉得除却在哲學之外，更沒有滿足他們希望的地方。由事實，可以見出犯罪之成立，不由於「過度」。(第一卷第一〇七頁)

「犯罪之成立，不由於「必需」而由於「過度」，這是「一語破的」的名言。這是在能維持生以後，再求享樂之生與奢侈之生所形成的必然的現象。原始的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如安普羅斯，(Ambrosius) 等都抱持着同一的見解，安普羅斯的學生奧格斯丁 (Augustine) 更說道：「假若我們祇取必需品，其他不取，則我們是綽綽有餘的。他所供給你

的是若干，你便取用夠額就好了。其他一切遺留著多餘品物，必是他人的必需品。所以富者之豐餘，就是貧者之需要。你要爲上帝的原故用夠，便好了，決不可爲滿足你的貪慾而多取」。到中世紀教皇葛里高利七出，（Gregory VII—1073至1085之教皇）在一封通告各主教的信札裏面，很憤悶的寫著：「誰不知君主及諸侯的原始及名號，必不從上帝處來的。它是從驕傲，搶劫，狡猾，和殘殺來的，總說一句，是從各種犯罪來的。他們以魔鬼的力量，提拔自己的地位，高出儕輩，而他們統治的特記，就是盲目的貪慾，及不可容忍的要求」。爲了求生之故，使貪慾極度發展，造成貧富的懸隔與疏隙，於是就需要節制和克治。這個需要，在法律方面，便充實了法律之祖的羅馬法的，自然法之內容。Max Beer 在這部書中，曾有一段簡明有敘述：

「爲羅馬帝國及羅馬法學家所接納的教義，無一不爲自然律所影響。……在中世紀的早期，自然律和羅馬法學家的觀念，互相混合」。（第二卷第二十八頁）

實際，當時羅馬法學家對於自然律的認識，還是很疏略的。他們只企圖證實人爲律之合理，——確定國家權力及社會階級化之存在。可是在旁的方面，如加拉丁法案（*Decretum Gratiani* 屬於聖經法典 *Corpus Juris Canonici* 之第一部）都公認物產公有是最甘美的；又以爲「我的」或「你的」這種辭句，是由於罪惡情境產生的。它雖然不肯定擁有私產便是罪惡，但它却肯定地說：「物主應該以生活必要品爲限」（第二卷第三十九頁至第四十頁）再如一五二五年德國農民運動所計劃的十二條款等，也充分顯示必須回復到自然生活的精神。印度甘地先生，在所創辦的 *Satyagraha Ashram* 中，定有十一信條，（*Observances*）其第五條第六條是：

不偷竊。（*Non-Stealing*）——不得別人的許可不可取，還是不足，即假此物以作彼用，或使用過了一定的時間，亦成爲偷竊之罪過。再者，若非真正需要而收受，亦爲偷竊，此信條之根本真理，因自然供給，恰好適足，無多餘以應我們的額外需

求。

不私有或清貧。(Non-Possession or Poverty)——此條實即前條之一部份。正因一個人不是真正需要，不應收受任何財物，故亦不應私有任何財物，例如一個人能不用桌子，即不應保桌子。守此信條，可使一個人進於簡單的生活。

這種嚴格的規定，這種加拉丁法案的基本的要義，以及社會主義者努力的目標，只有一個，就是要打破人類求生所產生的貪慾，和改進(甚至革命)由貪慾所產生的一切偏見與制度。這些事實——乃至 Max Beer 所標舉的一切，并未確切證實了唯物史觀的「物」爲一切的中心之理論却倒堅實地證明了孫中山先生「古今人類之一切努力，是因爲要求生存」的遺教。因此，我在這部書中，我處處覺得 Max Beer 用最優良的排編的方法，所證引的一切文獻和史料，只證實了孫中山先生的歷史觀的堅確與翔實，這一部「社會鬥爭通史」，雖然想站在所謂鬥爭的唯物論的立場，來剖解一切歷史的社會鬥爭的

事實，可是它的目的，它的努力，其結果，只是充分表明了人類求生的急切，和由求生的努力所發生的種種變故與擾動。

這是一個事實，並不是一個憑空捏造的理論。英國學者希克斯，(R. D. Hicks) 在他討論斯多亞派與伊壁鳩學派的學說的書中，(Stoic and Epicurean) 曾有過這樣的一段話：「慾望起於希求，求不到便發生痛苦。當人們發爲行動去求滿足他的慾望時，其主旨即在解除由求不到所發生的痛苦」。人類有求生的要求，有求生存之慾望，人類的行動，只在努力滿足其要求與慾望。照希克斯的話，便在解除由求不到所發生的痛苦。這便是我在上文屢屢說過的求能「維持生」。一個理想的社會，社會人人只要求能維持生。假如有享樂之生與奢侈之生的話，則這個享樂之生與奢侈之生，是屬於社會人人的，不單是爲社會中一部份的人所專有的。這樣的時代，便是共產主義的時代，便是孫中山先生所說的民生主義的時代。然而事實上還不可能，當人類各個去求生之時，依於

理智之高下，體力之強弱，各人所得的便有多寡之差，厚薄之異。依於人類之慾望，漸漸造成貧富的兩個懸絕的壁壘，這便亞里斯多德所說的；「犯罪之成立，不由於「必需」而由於「過度」。最好的說明，是唯物史觀者咒咀的資本主義。他說：資本主義的制度，是一種人吃人的制度。這與我們信仰三民主義的同志懷抱同一的意見，人吃人的制度何以會形成？便是由於求生的要求者，其要求超過了「必需」而陷於「過度」。就某一方面看來，所謂資本主義制度之形成，可以說是一種人性的必然的趨勢，由這種人性的必然的趨勢，確定了經濟的必然的定向，因為這種制度，無非是由於獨占，享有等觀念之烈強化與具體化。當這種制度未形成前，將形成時，已形成後，一部份人會感覺到其無當與有害，認識它與公道，正義，及自然的教義相違反，這便是一切社會主義思想所以產生的理由。同時，人必須保持其既得的利益，維護其既得的財富，與由財富所產生的政治組織與政治力量，這樣，在資本主義——財富的獨占方面，必須運用種種方法，加厚

其基礎，和加高其壁壘。假如社會而有鬭爭，則鬥爭的原因，便應該在此，換言之，便應該在慾望之不知壓足。

最粗淺的認識，都知道自古以來的道德哲學或倫理哲學，都注意到兩點：（一）正義的維護，（二）慾望的節制。這與歐洲中世紀法律的自然律，有同一的意義，即在禁過關於財富方面的貪慾之發展。孔子說：「無慾則剛」，儒家的經濟學說，其要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其理想的世界，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貨與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的大同世界。孔子的門弟子，如顏淵等，都以正義的追求爲樂，不以簞食，瓢飲，伏處陋巷爲憂。宋明理學，更注意到「昌天理而抑人欲」。甚麼是天理人慾呢，王心齋說的好：

「天理者，天然自由之理也。才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欲」。

（注）關於天理與人欲，我引宋儒的主張，祇爲便於說明起見。孫中山先生對

於這一點，曾有過極精闢的見解。這見解不見於總理全集，是當民國三年時，在東京與我面談的。那時先生閱讀宋明理學，一天我們閑談，我問先生：對於宋儒之學，有什麼意見？他說：宋儒的道理，也有許多很精闢的。但是用的名辭太差，譬如天理與人欲，便不當這樣用。我說何以？他說：據我看，宋儒所說之天理，倒是人欲，宋儒所說的人欲，倒是天理。譬如飲食男女，這是天理，是天然自由之理，不是人欲。人要如何如何安排，如節制，如修省，如用種種倫理教條來拘束它，這便是人欲了，這段見解很精當。非本文所及，未能在此作詳細的闡發。

宋明學者，都處處以無慾爲第一義，孔子也說：「放於利而行多怨」。「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喻於義」是正義的維護，「喻於利」，是慾望之不節制。這兩者是君子與小人的分際。在中國的學派裏，關於這一點說的最清楚的，要推墨子。墨子經濟學的

消費公例，是：

「以自苦爲極」。(莊子天下篇)「則足以奉給民用則止」。(費用中)

他以爲人類的慾望。應該以維持生命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爲標準。所以於飲食，則：「黍稷不二，羹上不重，飲於土墻，啜於土釶」。(節用中)於衣服則：「冬以圍寒，夏以圍暑」。(節用上)於居處，則：「高足以辟潤濕，邊足以圍風寒，上足以待霜雪雨露，牆高足以別男女」。(辭過)這樣就夠了。超過了這個限度，便是貪慾，便是享樂與奢侈。凡此，都爲墨子所深惡，諡之爲「暴奪人衣食之財」(節用中)的。「暴奪人衣食之財」，與唯物史觀者詭稱的「掠奪」同義。墨子的學說，是私產制度已經確立時代的學說，所以很注意從消極的節制，到積極的建設。自然，這學說之內容，合之上文的儒家學說，宋明學說等等，都沒這樣的單純。其包含的意義，應該提出的論證，是比較複雜的。這裏，我爲行文便捷起見，不過姑舉一例而已。

中國的情形是如此，西方又何獨不然？蘇格拉底主張的諸德，如勇敢，如虔敬，如公正，如謹敕，（節節制）都含有克制欲望的意義。其弟子亞里斯脫布斯，（Aristippus 435—305 B. C.）確認人生是有所追求的。追求的目的，在乎求樂，樂如何得？在乎增進智識。智識是甚麼？他祖述他老師蘇格拉底的話說：「智識卽道德」。所謂道德，便是蘇格拉底所提出的節制欲望的諸德。假如我解釋的話並未越軌，則應該說：人生的追求，人生的樂，都在於欲望的節制。

蘇格拉底以後，我們應當數到的，是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柏拉圖的兩個世界：（一）現象世界。（二）觀念世界。他說：我們應當脫離現象世界而歸還於觀念世界。假如我們仍舊留居在現世界，那我們應該竭力模仿觀念世界而求其近似。其主要的學說 Max Beer 在這部社會鬥爭通史中，引述海西德的記述，已頗詳備。在人生的進程上，柏拉圖是主張絕慾的，他認爲人心有兩部份：一是慾，一是義。慾屬於現象世界，義屬於觀

念世界，我們能斷絕物慾，我們便可轉入觀念世界。至於亞里斯多德。也極力主張人應該過理智的生活。(Life of Contemplation)他認為過理智的生活，便是人生的目的。這個學說的根本的意義，是淵源於他的全部哲學觀念的，在這裏，祇就其所主張的理智方面，稍加敘述。他首先要人充分發展其理智，理智的發展，有兩條路：(一)是理智的自身發展，使之發達到最高度，(二)是使理智能控制欲望，統御欲望，指導欲望，使欲望能絕對受理智的支配。前者是理智之單獨活動，後者是理智之統御欲望。亞里斯多德的學說，內容很宏博，其屬於倫理哲學方面的，概略如此，總言之，仍是充份包含著節制貪欲的意義。

最足以證實「節制貪慾」的信念的，是人所熟知的西洋哲學上兩個相反的主義。一個是快樂主義，(Hedonism)一個是苦行主義。(Asceticism)此外是叔本華的意欲一元論，(Voluntaricism)和康德的意志的自律。(Autonomy of Will)快樂主義的代表者，無

論爲抱持爲我主義的如伊壁鳩魯，(Epicurus 341—270 B. C.)或抱持兼利主義的如功利論者邊沁(J. Bentham(與彌兒。(I. S. mill)他們的學說，凡稍涉西洋哲學的藩籬的，都很清楚。前者主張求樂的方法，在制慾而不在縱慾。他說：真正的快樂，在求心之安靜。在乎控制擾亂精神安適的慾念。能致快樂的生活的，不是飲食，男女，奢侈，浮華，而是冷靜的推理，與縝密的致憲。功利論者的中心主張，在求大多數的最大幸福，而他并不主張率然滿足慾望，他主張的最大幸福，在轉化慾望，使它由直接的率然合理的滿足，爲間接的合理的滿足。尤其不單求個人的滿足，而要求大眾的最大多數的滿足。至於苦行主義者對於克制欲望一層，自然更澈底了。無論是犬儒學派或斯多亞派，實行的方法，實行的旨趣，雖有所不同，可是對於制慾與絕慾兩點，是可以相通的。犬儒學派的安蒂斯撒尼斯，(Antisthenes 444—366 B. C.)便是苦行主義的躬自力行者，除一衣兩襲，一杖一囊外，別無所需。斯多亞派，則以汎神論的宇宙觀爲出發點，他們

主張人之所以爲人，不在依從慾望、追隨情感，而在乎依本性爲生活，要能宰制情（*passion*）慾，（*desire*）不爲情慾所奴隸。他們以爲造情慾的奴隸，便是違反了本性，亦是違反了宇宙的本性。（這一派的宇宙觀，是有計劃的定命論，他們認宇宙萬物，都是 *ruling principle* 所統制）。所以人不僅要節制情慾，而且要滅絕情慾。叔本華的意欲一元論，是根於他的「存在是意欲」的觀念的。所謂意欲，便是「求生的意欲」（*will to live*）他要我們絕滅意欲，不能，則一切行爲，也要逆此意欲去做，他的哲學，是厭世的，具有部分的印度佛學的氣味。他的結論，在乎求生之真解脫，似不值多論。至於康德之意志的自律，是純乎一種理性的克治。其立說之嚴肅，命辭之純正，都是爲我們所共知的。

詳細的敘述，與衆多的證引，以及其他人性與社會心理的分拆等等，都是必要的題材，可是在這篇簡短的序文裏，實爲不可能。好在倫理哲學者，與心理學者都已有詳明

的提供，我徒然鋪敘，似沒有更多的意義。我此時寫這些根本的意思，只在希望提示出幾個倫理哲學上主要的思潮，旁證求生的努力，與慾望的推展，是人類活動的中心。唯物史觀者之所謂「物」，只是求生的努力，與慾望的推展之外物。是結果，不是原因；是枝葉，不是根本。Max Beer以鬥爭的唯物論，剖析歷史的社會的鬥爭，只是證實了孫中山先生的「人類求生，為社會進化的定律」的遺教。假如講唯物史觀而必須推及馬克斯，則孫中山先生所說：「馬克思只是一個社會病理家，不能說是一個社會生理家」於此，當獲得多多的證明。

其實在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中，假如照恩格斯的話，則馬克思是并未忘記著求生的努力的。忘記了求生的努力的，只是些淺薄的唯物史觀者，和那些被蘇俄盧布催眠了的唯物史觀者。恩格斯說：馬克思不如是，我也不如是。一八八四年，當家族私有財產，與國家的起源 (Des Ursprung der Familie, des Privateigenthums und des Staats.) 出版

時，恩格斯在他的序言中，說過這麼幾句：

「照唯物史觀說來，歷史之最後的決定的要素，爲「直接生命」之「生產及復生產」。這又分爲兩種：一爲生活資料的產出，即衣食住的產出，和因此所必需的工
具的產出；二爲人類的產出，即種族的繁殖」。

在一八九〇年的書簡中，又有下面的文句：

「照唯物史觀說來，歷史之最後的決定的要素，爲「真實生命」之「生產及復生產」。無論是馬克思或是我，向無比此更進一步的主張」。

這種主張，是堅決的，是唯一的。晚年的主張，應該是一生的主張的定論，恩格斯所謂「真實生命」或「直接生命」的生產，完全是指的維持人類的生命。所謂復生產，就是指人類生命的復生產，即子孫的生殖。我們不論馬克思如何，可是恩格斯已堅決地說：「無論是馬克思或是我，向無比此更進一步的主張」了。則更可證明歷史之最後的決定

的要素，是生，不是物。

就人類的慾望來說，馬克思本身，也并未忘記了慾望的重要。雖起源於求生。所以結果，還是隨物為轉移。關於這一層，馬克斯在他的「工資勞動與資本」裏，有這麼一段話：

「一棟屋子無論其為大為小只要四鄰的屋子和它的大小一樣，那它對於住宅，可以滿足一切社會的要求。可是小屋子旁邊，如果建築一座皇宮，它便相形見絀，小的不像樣子了。這小屋子現在所表現的，是它的主人沒有體面，或只有極小的體面。在文明進步之中，它固然可以改造的高聳天空，但當它旁邊的皇宮，依前此的比例，或更大的比例向天空升起時，那麼這比較矮小的屋子居民，總是感覺不舒服，不滿足，總是感覺侷促不安的。……我們的慾望與享樂，是由社會中發生出來的。馬克思這一段話，只在指證我們的慾望與享樂，是發生於社會。狹義的講，自然具

有部份的理由，因為他同樣揭示了社會的相互關係。廣義的講，則這樣的話，是見其一，未見其二，見其偏，未見其全的。因為如馬克思所說的，只是指出了已成社會的慾望的比較性。（即由比較而生的慾望）却並未明白從原始的人類進化史上，說出慾望的基本的意義。換句話說：馬克思所說的慾望，只是因為人如此，所以我也要如此，因為人有高大的皇宮，所以我也不能住矮小的屋子。可是除此之外，是不是便沒有慾望呢？是不是社會能發生慾望而慾望不能推動社會呢？是不是一定社會先於慾望而慾望不能先於社會呢？馬克思為要堅強其「經濟的一元論」，同時又不能蔑視慾望，便強以慾望為比附，以為慾望一定附麗於社會，發生於社會，却無視人類求生的慾望，是社會進化的動力。這是一切尊重客觀事實的人，所不能承認的。

關於這一點，羅素的批判最清楚。羅素在他的「鮑爾希維克：理論與實際」(Bolsheism: Theory and practice)中，有很多批評馬克思的話，主要的幾段是：

「決定一時代或一民族的政治和信仰，經濟的原因，自然很關重要。但是把一切非經濟的原因，一概不顧，只以經濟的原因，斷定一切的運命，而以為一無錯誤，我却有些不信。」

「有一種最顯著的非經濟的原因，為社會主義者所最忽視的，便是民族主義。……單看大戰中全世界僱雇工人，——除極少數的例外——都被民族主義的感情所支配著，把共產黨寶貴的「全世界勞動者聯合」的格言，完全忘掉了。」

「馬克思派說：所謂人羣，(Man's herd)只是階級。人總是和階級利益相同的人互相聯合的。這句話，只含着一部份的真理。因為從人類長時期的歷史看來，宗教乃是斷定人類運命的最主要的原因。」

「人的慾望，在於經濟的向上。這句話，只是比較的合理。馬克思學說，淵源於十八世紀唯理的心理學派，與英國正統派經濟學者同出一源，所以他以自私(Self

·enrichment) 爲人類政治行動的自然要求。但是近代心理學，已經從病的心理的浮面上探下去。爲更進步的證明。過去時代的文化的樂觀主義，已給近代心理學者根本推翻。可是馬克思主義還以這種思想做根據。這不能不使馬克思派的本能生活觀，有殘刻呆板之誚！

羅素的意見，很多與我向來批評馬克思主義的主張相應合。馬克思以後，大部份唯物史觀的解釋者，自恩格斯以次，如考茨基如克諾(H. Cunow)等，對於這一個學說的本身，時有必要的修正和補充。他們在以唯物史觀解釋道德時，便說：

「道德由於進化而出，在本身是一種本能，在人類是一種風俗，其背境都在於求人類的生存。」

從上面的意見與若干未完備的引述中，我們可以認識唯物史觀的本來的意義，已有過急劇的轉變，甚至轉變到喪失其固有的真面目。這不是解釋者之遷就，而是事實的必

然的推演，與真理之必然的發露。根本這個認識，我們可知道 Max Beer 根據鬥爭的唯物論來解釋歷史的這本「社會鬥爭通史」并未能批判到社會進化的真際。雖然它的唯物史觀的方法之應用，是很周密的，這書的內容，是提供著很多可貴的材料，它的文辭，又是優美而犀利的。

我向來的見解：學術的研究，應該恢擴而不應該狹隘。所以純學術的研究與探討，所謂「思想自由」的原則，應該確立，也應該維護。以我自身來講，在十多年前，我就應用今日一部份國內青年所艷稱的唯物的辯證法，來剖解中國過去的倫理。到民國十五年，我充份的介紹 Max Beer 這部「社會鬥爭通史」，想提示研究社會問題者以唯物史觀的方法之運用。我以爲要是我們的信仰不錯，三民主義的本身真確，則一切學說方法，都是我們應用的材料。這些學說方法，不但不能損我，而且還足以增加三民主義的堅確性。所以我說：我不否定唯物論者的學說，正如我不否定唯心論者的學說一般，亦正如

孫中山先生不否定唯物論與唯心論者的學說一般。我認爲以唯物史觀的看法，去看一切歷史的演變，——用唯物論的辯證法，去探究一切歷史的事實，並由此去推求出一種結論。這是很可能的。馬克思如此，恩格斯亦如此，這可能的程度，我想與用實用主義（Pragmatism）的方法或形式邏輯，同樣會得到各別的成績。在中國的學術史上，老子以「無名」的方法，產生他的無爲主義，孔子以「正名」的方法產生他的倫理哲學，宋明學者則以「頓悟」的方法，產生一種專講性理的理學，這種種特色的方法，都并未失了他的效用，同樣都生出一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學說。所以我們不必說某種史觀（或學說）一定不適用、某種方法一定不合宜，應該說：無論何種方法，無論何種史觀，都有它範圍內的成就，不過這個成就，是不是真實的？是不是確切的？是不是已探索到一切歷史的事實之真際？則爲另一問題而已。守舊派的宗教信仰者，中國社會中的神佛虔信者，就他們的思想去分析，這些人都可以說是唯神論者。就他們的思想，去攷察他們對於歷

史的看法，對於社會的看法，則這些人而亦有所謂史觀的話，這些人的史觀，一定不是唯物史觀而是唯史觀。他們相信人生是命定的，然如求神的話，或能得神的喜悅的話，命定是未嘗不可以改變的。他們相信神的地位，是至高無上的，神的權力，是絕對無限的，世界之生滅，人類的禍福，都在於神的掌握之中。所以思想以神為中心，行動以神為中心，唯物因不值一顧，唯心也不值一談，無論是太上感應篇的人生觀，與宇宙觀，無論是安士全書的人生觀與宇宙觀，總之都有其基礎的理由。我說：我們對於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的看法，正如對於宗教虔信者之唯神史觀的看法，一般無二。

我的終結的意見：認為無論是唯物，唯心，或所謂唯神，只是在社會進化的過程中所發生的各別的現象。一切歷史的事實，使我們確信能把握住社會進化的動問的，把握住所謂唯物唯心，或唯神的，只有這個「生」。Max Beer 的這部「社會鬥爭通史」，用一般的眼光去看，固然是一部獲有成績的名著，用唯物史觀的眼光去看，在某種限度之

下，它也是一部能夠成功的好書。可是在根本上在實際上，它所引用的材料，所鋪敘的一切，只都證實了「人類求生的努力，是社會進化的定律」。根據這一點，我仍舊很歡喜的做這一篇序，繼續表示我過去所以介紹此書的誠意。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一月胡漢民序

現代社會鬥爭史

現代社會鬥爭史第五卷目次

第一章 一八〇〇年至一八四七年之法國……………一

一 戰爭與民族自由及統一

二 經濟的及社會的擾亂

三 社會主義之煽動：批評，詩歌，雜誌（一八二五——一八四七年）

四 社會批評和社會革命之試驗：加爾，布涅爾

第二章 德意志人之僑外的革命結社……………二

一 逃亡者同盟

二 義人同盟：韋德靈

目次

三 韋德靈與革命之獨裁制度

四 韋德靈之晚年

五 由『義人同盟』到共產主義同盟之轉變

第三章 德國之政治及社會運動（一八四〇至一八四七）……………三六

一 海燕

二 社會詩：海涅，馬司拿爾，伯克

三 社會批評：海士，格倫，呂寧，奧爾加爾司

第四章 馬克司……………五六

一 馬克司在社會主義之重要

二 馬克司和黑智耳之辯證法

三 唯物史觀

四 階級鬥爭

五 馬克司經濟學之要素

六 進化與革命

七 馬克司與昂格恩之友誼

八 共產主義同盟之設立及其規約

九 德國共產主義的反响：波諦，和曼特爾的柏林訴訟

第五章 保守主義的社會改良……………八

一 浪漫主義的性質

二 馬羅——溫克布烈西

三 羅德俾爾士

第六章 第二次的德國革命（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一〇三

一 政治的經過

二 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之社會潮流

三 共產主義同盟之終局

第七章 一八五〇至一八八〇年之經濟及政治……………二六

一 自由主義時代

二 帝國主義與社會主義之變遷

第八章 第一國際時代……………二六

一 拉塞爾與德國總工人聯合會

二 第一國際之成立及經過

三 巴黎公社

第九章 帝國主義時代（一八八〇至一九一四年）……………二〇

一 帝國主義之經濟基礎

二 社會主義之普及，攷茨基

第十章 第二國際（一八八九至一九一四年）…………… 一四九

一 成功與失敗

二 第二國際與戰爭

三 德國

四 奧匈聯合國

五 大不列顛

六 法國

七 意大利

八 俄羅斯及波蘭

目次

五

九 美國

第十一章 國際戰爭與革命（一九一四至一九二十年）…………… 一五〇

一 第二國際之衰頹及分裂

二 第二國際之新現象

三 列寧及列寧主義

四 一九一七年之俄國革命及社會主義之復興

五 德國革命及一九一八年之反革命

第十二章 第三國際…………… 三四

一 第三國際之形成與展開

二 社會主義國際化之進展

三 社會主義在殖民區域之廣佈

四 社會主義之最後目的

目次

現代社會鬥爭史

現代社會鬥爭史

——社會鬥爭通史第五卷——

第一章 一八〇〇年至一八四七年之德國

(1) 戰爭與民族的自由及統一

德國政治上最不幸的一種失敗，就是德意志諸邦參加于鎮壓法國革命及對拿破侖轄下的法國戰事，其時期從一七九二年到一八一五年。從一七五〇年以來，德國人民已把三十年戰役(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的傷痕逐漸恢復，但現在又投入大海中去了，一方面助長國內的專制和反動，而提倡英國式的工業政策及殖民政策，與夫王政及貴族制度，他方面則反抗資產階級之自由，阻礙德國國民經濟之發展，並且壓制自由化之歐

洲。假如沒有這一次反革命的聯合戰爭，則雅哥賓黨的恐怖政策(Jakobinischen Terrorismus)可以不起，而拿破侖之帝國主義也可以不生。所以法國革命之失敗，大半應由德意志諸邦及英國負責任的。

在十九世紀之最初十年間，法國民族之勢力，本來可以打破歐洲之反動局面，而把自由的發展及工業的機會，給與德國的資本階級，但因為受拿破侖之專制統治，於是古老的德意志帝國便荒蕪殘破，而普奧二國也孱弱不堪，即英國對於歐陸之爭榮，也受太大的限制。更可惜者，就是在這一個幸運的機會中，竟沒有偉大有遠見之人物。當時祇有情緒的保王主義，近視的國家主義，和愚昧的盲從——驅逼當時的德國國民，服屬於反動和束縛，與乎經濟貧乏的掌握之下，即在耶拿(Jena)戰後的斯坦因(Stein)及哈登堡(Hardenberg)所做成功的少少改革也應歸功于法國革命，而所謂少少的改革也無非是都市制度和所謂農民解放(一八〇七年至一八一六年)而已。

當時祇有民族凝結之感情爲統一的努力——無論牠如何地危難和頑固，還仍活動於德國資產階級之間。普王腓烈特威廉三世 (Friederick Wilhelm III, 1797-1840) 及俄帝亞力山大一世 (Alexander I) 爲集中這種努力起見，在拿破侖由莫斯科敗退之一八一二及一八一三年間，便向德國國民應許給德國以獨立自由，而這種應許，直到一八一五年五月二十二日又由普王重加伸令，方成爲正式憲法之定約。

德國民族乃以無限的熱誠參加解放運動 (一八一三至一八一五)，牠敗走拿破侖，並且幫助英人，挽回其在世界的市場和殖民地，又爲當時的大小諸侯，保存其榮位。然而其結果，則德國所受之酬報，却爲神聖同盟，爲梅特涅 (Metterniche) 之統治，爲出版結社之禁止，科民族愛國主義以叛亂的煽動者之罪名而加以壓迫，爲德意志聯邦 (其中有帝一，王五，小諸侯二十九) 之民族的分裂，爲法郎福德 (Frankfurt) 的聯邦會議。朱里斯摩山 (Julius Mosen) 在其來布色的戰爭 (Völkerschlacht bei Leipzig) 一詩中說

道：

忠誠的同胞

應當爲爾的祖國，

在來布色的戰爭中，

爲自由之祖國而奮鬥……

在來布色的墓原之中

康健的人們已安眠了；

墓場中的歌者之聲音，

祇有烏鴉來細聽。

爲問墓中的骸骨，

爾願意什麼；

究竟爲什麼原故

流下了這麼多的血液？……

不過詩人之陳訴，學者，知識階級，有教育的市民，和政治問題的著述家之抗議，對於法國國民的七月革命（一八三〇年）及法國小資產階級及無產階級的二月革命（一八四八）之趨向於自由主義及社會主義的路向上，沒有多少效果，但像布爾山沙夫同盟（Burschenschafts-Verbindung），體育協社（Turnerei）——或稱漢巴沙爾祝典會（Hambacher Fest 一八三二年），及法郎福德警衛兵之攻襲（一八三三），則對於民族之統一和自由，反有幾分效力罷。

(2) 經濟的及社會的擾亂

德意志民族，因為參加於反革命的戰爭和解放的戰爭，已經弄成非常貧乏。法蘭西底駐兵，向德國人榨取二百萬馬克底戰費；一八一六年和一八一七年歉收飢饉，其後數年便發現生產過剩的貧窮：一般人的購買力，差不多降到零點；貨倉和商店堆滿滯銷的貨物；而在市場却沒有實際的需要；因為近代技術的結果而完全武裝起來的英國之競爭，令西里西亞 (Silesia) 的麻業歸於絕滅，工匠陷於貧窮，打倒了撒克遜 (Saxony) 的工業，又因為國民貧窮，在高價的機械之基礎上不能組織新工業，工錢低到意料之外的程度，於是能夠節約勞動力的機械，很像是無用的東西。祇有萊因蘭 (Rhineland) 和威斯特法里亞 (Westphalia) 兩地才顯出法國革命的自由社會之狀態，原來法國政策就是把萊因流域變為法國化，採取寬大態度，因而工藝勃興，而產業革命的一般過程開始出現。

一八三〇年以後，情勢更好，——巴黎之七月革命，使德國資產階級爲新鮮的空氣所吹動。不倫司維克(Brunswick) 撒克遜(Saxony)，漢諾威(Hanover)，都有暴動，政府不得不提出多少的政治讓步。在德意志南部各國，其國會漸有活氣，巴敦(Baden)的下議院，公然討論如何招集德國會議。經濟活動既已發展，自然科學也就興盛。哲學的及社會主義的著作家郎格(Friedrich Albert Lange)在唯物論史(*Geeschichteder Materialismus*)中(一八八七年版第二卷四三六頁)描寫當時德國經濟和精神的發展，非常清楚。他說：『七月王政和法國的立憲主義，現時受許多人的歡迎，其原因是有產階級得有物質利益的原故。而當時之德意志則以商人和罕司曼(Hanseman)同盟有限公司的創立人爲一般人的代表。商會和類似商會的團體，在三十年時代，陸續發生；教育方面，則工商業學校，皆由繁盛都市的資產階級設立，政府最重要的活動，爲商業貿易。……這十年內最有意義的社會政治之產物，爲「德國關稅同盟(一八三四年)」，德

國關稅同盟，實在德國境內創立自由貿易。同時德國又建築第一條鐵路。其中最值得注意的，爲一八三五年：這一年開始有鐵路，而司託拉司（Strauss）宗教批評的著作耶穌傳（Das Lehen Jesu）及吉哥夫（Gutzkow）的自由思想的小說懷疑者華利（Wally, die Zweiflerin）同年出版，而後一書的著者卒受監禁。

自然科學也同時勃興，德國產生了偉大的自然研究者：如化學家里比格（Liebig）生理學家繆拉（Johannes Müller）地理學家坎坡德（Alexander von Humboldt）及數學電磁學電信學家哥斯（Karl F. Gauss）。一切思想家和詩人，都拋棄了荒唐無稽的，唯心論和浪漫主義。先把思維用在感官能夠知覺的地方，拋去了從前佔優越地位的唯心論哲學，而代以實在論的理論。這就是：人人先有實在然後方有思維，先有事物然後才發生概念和理想。哲學地說來，是由唯心論變而爲唯物論。

在宗教研究上更有重大的意義：從來都以爲上帝創造人類，但自此以後人類因爲曉

得雖用他的理解力和感情都不能理解一切事物，所以便在種種時候創造上帝。由人類經驗和考察的精神沈澱，又由支配頭腦和心臟的一切感情和氣質，而創造上帝。人類神經化了自己的精神，換一句說，人類把自己精神提昇，超越於一切條件和制限之上而成爲絕對及超越感覺。這從神學上說來，實爲無神論的說法。在德國內擴大這種見解的，爲費爾巴哈（Ludwig Feuerbach）的主要著作基督教本質（Wesen des Christentum）和發凡論集（Vorläufige Thesen），這兩書都在一八四一年一八四三年出現。

這種新的變換，在哲學上更有非常的意義。從來人人都以爲無限的精神（或稱上帝）創造世界而且支配世界。或如黑智兒之想像，以爲無限的精神可以自己發展一切物質的世界（恆星，遊星，礦物，植物），這便是無限精神發展進程中之顯現於外而可以目觀之形態階段。但是現在的人，都以爲物質從無機（礦物）到有機（植物動物）；牠自始存在，自有秩序，用其內部的力量而發展。由此更曉得所謂精神的事物，不僅沒有非物質

的存在，而且祇是有機東西之一個機能（就是和胃臟把食物變為血液，頭腦把感覺印象變為思想一樣），更有人則以為精神的東西，從來雖超越於物質的東西，但牠限於有機的東西之中，才逐漸明白表現，而在人類之中便成為理性。

依據這種純粹自然科學的唯物論的觀點，則精神全沒有特殊的力量：精神祇為肉體活動之一種產物。又有一種見解，則以為精神的東西雖然具有特殊的力量，但牠必妥和物質結合方能存在；精神和物質，是一種統一的實體：是世界本質的實在。這一種見解，稱為汎神主義的理論。

對於神學和唯心論的世界觀之攻擊，即對於神和天使之攻擊，是和對於專制王政及官僚國家之攻擊，相並而進的。因為國家及社會之成立和保存，並不是國王和警官，而是市民，和企業家商人；而市民及商人階級若要利用相當之政權，便不能不積極參加於國家及社會了。

對地主貴族的專制政治之反對，是要倚靠德國資產階級的國民經濟力量之結合，德意志的民族之統一，和新權力支配的德意志帝國之重新組織的熱望。

一八三〇年，德國資產階級的政綱，如下所述：教會的獨斷論變為自由宗教的思想，把哲學的思辨變為自然科學的研究，把警察式的政治變為經濟的刺激和努力，把獨夫的暴政變為自由的憲法，把地主貴族的分立變為民族的統合。其在哲學上之代表則為青年黑智兒派——司託拉司 (David Friedrich Strauss 一八〇八——一八七四年) 費爾巴哈 (Ludwig Feuerbach 一八〇四——一八七二年) 包爾 (Bruno Bauer 一八〇九——一八八二年) ——其文學上之代表則為青年德意志黨如波尼 (Borne) 海涅 (Heine)，吉哥夫 (Gutzkow) 羅貝 (Lanbe)。這個時代非常聰明活潑地研究人類的各種問題，不過這些代表者裏面，很少能夠發展自己以成就不朽的事業。他們或窮愁天死於德國監獄，或避官吏搜捕而亡命他國：他們祇在亡命之地方，如法，比，英國等地，從事工作。

這種以自由爲本質的潮流，在士丁拿（Max Stirner 其真名爲 Gaspar Seimdt）之『唯一與其所有』（*Der Einzige und sein Eigentum* 一八一四年），最爲極端表現。他把神，人類，共同性，道德，一切普遍的概念，都當爲幻影，盡行排斥。祇認個性，及力量，爲唯一實現的東西。他說『我所研究的，並不是神的及人類的東西，一切真理，善，正義，自由，並皆沒有，所存者我而已矣，而我也不是普遍的東西，却是唯一無二的東西』。本來士丁拿是個人主義的無政府主義之最利害的代表。但因他的著述，反對當時逐漸發生的共產主義運動，所以便失去了他尖銳的論爭之一部分了。

（3）社會主義之煽動：批評，詩歌，出版物（一八二五至一八四七年）

從外國流入的社會主義之刺激，在一八四二年前後，首先發現於近代技術確已建立的威斯特法里亞及柏林等地方。當時德國社會主義，雖然不過是法國社會主義之反映，但

在激烈的黑智兒派當中，已把德國哲學，作為社會主義之乳母了。這個問題當在下文詳述；此處祇普遍地敘述一八四二以來，社會主義思想流到德國，於是便和民族的統一運動互相連絡，發生社會主義運動。一八四四年西里西亞(Schlesien)和波希米亞(Bohemia)發生工匠勞動者的糾紛，其意義極應注目。(註)

(註)「這次勞動之叛亂，並不是對政府，而是對企業家……牠給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之宣傳以一個新的

刺激。」(見馬克斯革命和反革命 Revolution und Kontre Revolution二四頁)

一八四四年，可以說是近代德國社會主義出現之一年。一八四四年，馬克斯在巴黎完成他的教義。一八四四年，年輕的柏林學生拉塞爾(Lasalle)在信中說勞動者的糾紛實是共產主義最初之脈搏；(註一)一八四四年海涅之織工歌(Weheried)及德意志之冬夜(Deutschland, ein Wintermärchen)的序文之性質是完全共產主義的；一八四四年柏林工匠同盟成立；一八四四年麥斯拿爾(Alfred Meissner)發表他的詩歌。一八四四

年又爲德國社會主義新聞雜誌最爲流行的一年；從年代的次序數來，則如下述：·巴黎一八四四年之德法年書 (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ucher) ·一八四四年巴黎之進步 (Vorwärts) ·一八四四年比爾維爾 (Bielefeld) 出版而由亞寧博士 (Dr. Otto Lüning) 所編輯之 Weserdampfboot ·一八四五至一八四六年海司 (Moses Hess) 之社會鏡 (Gesellschaftsspiegel) ·一八四五至一八四六年普德曼 (Heinrich Püttman) 之來因年書 (Rheinische Jahrbucher) ·一八四六年之德國市民書本 (Deutsches Bürgerbuch) ·一八四五至一八四七年呂雷之民衆書 (Dies Buch Gehort dem Volke) ·一八四七年達司達德 (Adalbert von Bornstedt) 之德國不魯塞時報 (Deutsche Brüsseler Zeitung)。(註1)

(註1) Lasalles Nachlass, herausgegeben von G. Mayer, Berlin 1921 第一部 102頁。又前舉馬克新書。

(註2) 亞德拉 (Georg Adler) 德國初期社會政治勞動運動史 (Geschichte der ersten sozialpolitischen

(4) 社會批評和社會革命之試驗：迦爾，布涅爾

一八二四年，有一個德國官吏兼食糧化學者迦爾 (Ludwig Gall, 1791—1863年) 在一八二四年計劃調查德國之社會狀態 (一八一五——一八三〇年)。他一方面看見貧窮——失業底結果——陸續增加，『一切人類都陷落社會之坑底。』(見其該救濟誰呢 (Was soll helfen)?) [一八二五年 Trier 出版]，而他方面他又看見穀倉是存穀物的，職工場有充分生產之可能，許多工匠和農民，爲着增大富量本來是可以隨時工作的，然而國家却愈弄愈窮。德國也和法英二國一樣同遇着當時由相對的生產過剩而發生之恐慌。迦爾說，我們決不能說貧困及富裕，是自古以來存在的，實在說來，牠並不是由於人類治生方法之不完全所致的。下述的說法並不是強詞奪理。因爲在實際上『土地可

以生出養育兩倍現在人口之衣食必要的資料；又如在最下層階級和上層階級之間，像今日那樣激烈的互相反對，也並不是自古已然的。這種反對的仇視，是隨一切文化和科學進步而時時增加的，因為這些進步，僅僅有利於上層階級的緣故（九——十頁）。迦爾以爲貧困之原因在於人類勞働力喪失價值。迦爾也曾說過，貧困原因，在於勞働者對於資本家反抗力量之微弱。但是却不明近代理代社會階級之構成；他把農民工匠和工錢勞働者都歸爲一種身份，而與這種身份相對的富人（靠利息，利潤，地租，俸給，恩給而生活的一般人）則當爲另一種特殊的身份，他說「這兩種身份，由於相反的利害，而澈底地分離，成爲互相敵對的關係；在這種情況之下，富人地位，越加改善，則勞働階級地位，便越加不幸和悲慘。這種變化，比之古來的變化，危險得多；牠必然會使所有財產集中於富人特權者之手，而其餘一切階級，便無條件地隸屬於這一個階級，供他的奴使；一切向上心都爲牠所壓殺；一切文化爲牠所破壞；即有高深之智識，也祇好安受

「這種無可如何的狀態而已」(九三——九四頁)。迦爾當時提議發行穀物信用証券以救濟農民之窮乏；這就是他的改善農民地位，必會對於工商業有良好影響之意見。

迦爾讀法英二國的社會批評之書籍(傅立耶和歐文)便提議以合作社(協同組合企業)為救濟之方法，可惜到後來他停止了社會政策的宣傳，而專從事於食糧化學和技術之研究。

詩人布涅爾(Georg Buchner)生于一八一三年十月十七日而死于二一八三七年二月十九日。與其說他是社會政策者，不如說他是為着勞働階級之革命化而為短少期間的活動者。他卒業于達謨新塔(Darmstadt)中學校，在司德拉斯堡(Strassburg)研究醫學和自然科學(一八三一——一八三三年)，這時他便信仰「人民之友」和人權社之思想。他耳聆一八三三年布蘭葵(Rede Blauguis)在巴黎陪審官前的演說。一八三四年他返基森(Giessen)，加盟於教育學者及傳教士維德博士(Dr. F. L. Weidig)所領導之共和主

義的愛國祕密團體，起草黑森（Hessen）之田農應向茅屋和平，而向宮殿戰爭！（Der Hessisch Landbote, Friele den Hutten, Krieg den Palasten）一篇檄文；這篇檄文，由維德博士加上適當的聖經辭句，使其表面成爲一種豫言的和原始基督教的文章。在不絕逮捕之危險中，布涅爾於一八三四年創立「人權社」的祕密組織，後來僥倖避免逮捕，便先逃往司德拉斯堡，次逃往蘇列茨（Zurich），不久便以大學講師之職業短命而死。其戰友維德博士於一八三五年四月被捕，受拷問於獄中，一八三七年二月二十三日——豫審中——自殺，其距離布涅爾之死後僅爲四日。

在布涅爾之戲曲：丹頓之死亡（Dantons Tod）維赤克（Wozzeck）之裏面，全不含有社會主義的性質；祇向被壓迫階級表示熱烈的同情而已。但是在和吉哥夫通信之中，便看出布涅爾對於共和主義的和社會的思想，確受法國祕密結社之影響。一八三三年四月五日，福琅克福特兵變，他在家信上寫道：「據我的意見；以爲現代救濟的手段就祇有

暴力而已」。德意志各邦想用其他手段來改革，恐怕不行罷。

一八三五年七月，由司德拉斯堡寄吉哥夫的信裏，說道：窮富二者之間的關係，是世界唯一革命的要素，自由女神所得者，祇是飢餓而已。

布涅爾不相信資產階級之開明運動，或自由思想之宣傳，能夠達到他的目的。他在司德拉斯堡寄給家中的信說道（一八三六年一月一日）：「我個人是決不屬於吉哥夫和海涅之文學團體，即所謂青年德意志派的。想用流行文學便可以完全改造我們宗教和社會的理想，這祇是完全誤解現在社會狀態之結果而已。」同時他又寄給吉哥夫之信說道：

「我坦白地說吧：爾和爾的朋友都沒有走上最好之路向。爾以為根據着理想，先從有教養之階級以改良社會，能夠做得到嗎？我敢說這是做不到的！現代是粹純物質的。你們要克服有教育的社會和無教育的社會之間的傾軋，是決然做不來的。我確實相信，少數的有教養而富有的人，或者為着自己，還希望可以暴力而得較多的讓步，至於對於多

數階級之慘酷態度，則他們是決然不能改變的。」（註）

（註）Georg Büchner, Gesammelte Schriften, Verlag Paul Casirer, herangegeben und eingeleitet von Paul Landau, 第二部，一五九，一八五，二〇二頁。

我們可以說布涅爾是豫知祇有無產階級才是唯一的革命階級之社會叛逆者，可是他相信無產階級祇由飢餓和原始基督教論理的情熱才可以強迫他們出於行動。他說即在社會事物之中，我們也不能以絕對正義之原則為出發點。他的社會觀念，全是法國當時流行的思想，他接受以拉曼尼司（Lamenhais）和李盧爾司（Leroux）等為代表之宗教社會改良主義的傾向之影響。（註）

（註）拉曼尼司事見本書前一卷。

在巴黎以著作或勞働度生活的德藉逃亡者，完全與上述者不同。他們無論如何，都要徹底研究社會政治的思想，和加入社會革命的集團。我們下面敘述這些人之歷史罷。

第二章 德意志人之僑外的革命結社

(1) 逃亡者同盟

一八一五年以來，爲德國自由統一而奮鬥的人，多被放逐，他們受着經濟的壓迫，避難國外，所以便不得已在國外成就他的事業。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一八三二年，集會三萬個南德意志民主主義者之罕巴查爾(Hambacher)大祭典，一八三三年佛琅克福特又發生大騷亂，其後一切政治的逃亡者便全羣流落巴黎，受法國進步分子的保護。最初他們所組織的『德國國民同盟』(Deutsche Volksverein · 法文名 Association patriotique Allemande) 也僅以政治的自由和德國的統一爲目的。以這一個同盟爲根據，芸尼地(Jakob Venedey) 瑞斯德博士(Dr. Theodor Schuster) 所指導之『逃亡者同盟』

(一八三四年設立)便繼續發展。芸尼地(一八〇五年)在Köln出世是海德堡(Heidelberg)之大學講師，因參加罕巴查爾祭典之原故，便逃到法國，在巴黎刊行『逃亡者』(Der Geachtete)雜誌。雖然這個雜誌同情於傅立葉派，但仍然受限於德國民主主義之範圍。一八四八年他返德國，被選為佛琅克福特的國民議會會員。其友人瑞斯德(Dr. Theodor Schuster) (註1)本為哥德根(Göttingen)的法律學講師，七月革命(一八三〇年)之後他和羅禪布刺德(Ranschenplat)博士及阿命士(Ahrens)博士共謀暴動。失敗後逃到法國加入祕密結社，在逃亡者同盟中，瑞斯德和芸尼地爭辯甚烈，瑞斯德深受聖西門主義和傅立葉主義之影響，所代表者為社會改良主義之立場。他看見當時社會已分為少數之有產階級和多數之無產階級。而他又倍從布茲可(Buhoz)之主張，以為國家要保護生產公會。(註2)平心看來，瑞斯德不能超出於布茲司以上。無產階級革命潮流卒致激發，他便從運動之中退出來，最後他放棄法律學而研究醫學，為一個巴黎的醫生。

(註一)據 Wernut und Sicher 之 *Kommunistenverschwörung in 19. Jahrhundert* 一書所述，則瑞斯德和 Karl Wilhelm 同謀。見該書柏林一八三五年版第二卷。

(註二)見 Theodor Schuster 之 *Gedanken eines Republikaners* 巴黎一八三五年。這書爲 Heinrich Schmid (Nene Geit Bd. XVI.) 所引用，但過于看重瑞斯德之地位。Gedanken 之第一部曾登載于一八三五年之 *Genchalen*。

『逃亡者同盟』和法之『人權社』相聯絡。同盟之目的已在總則中揭出了：牠「實現德國之解放和復活與乎人民權利宣言中所曾敘述之原則」。這一個目的是使下級會員所一般地了解的。至於上級會員之規約中，則更舉出如下之目的：「從暴虐隸屬之束縛下解放德國，並從人類所能豫見的爲限，創設一種不令隸屬關係重新發生之形態。爲要達到這個目的，便惟有先就德語和德國習慣之土地，確立而維持其社會政治的平等，自由市民道德，和民族統一，其後更推到全球之一切民族去。」(註)

(註)Wernut und Steier, *Konstruktivismieroch-Worungen in 19. Jolrhundert* 第一卷，一七七至一八一頁。

法國「人權社」中，有右翼（純粹民主的及民族的）和左翼之分，而在「逃亡命同盟」中也分有兩派。瑞斯德指導左翼，組織「義人同盟」(Bund der Gerechten)（一八三六年），其初奉空想的共產主義，其後則奉革命的共產主義，所以便變為「共產主義同盟」(Bund der Kommunisten, 一八四七年)，馬克司之共產黨宣言，就是為這一個同盟而作的。

(2) 義人同盟：韋德靈

在逃亡者同盟會員五百名中，約有四百名轉入義人同盟。前所引述布涅爾的一句話：「我們即對於社會事物，也不能不從絕對正義之原則而出發」，這就是當時懷抱有

社會政治思想團體之一般感情的表現。義人同盟爲社會正義而戰。這一種思想過程，實受有拉曼尼司之一個信仰者的話（*Worte eines Gläubigen*，法文原名爲 *Paroles d'un Croquant*）之影響，該書出版於一八三四年，波尼（*Ludroig Borne*）譯成德文，盛行於德國勞動社會之間。拉曼尼司是叛逆的傳道者，他用聖書的文體敘述民主主義和社會正義。我們可以借用海涅之語言來說，拉曼尼司是把耶哥賓黨的帽子蓋在十字架之上。該書除波尼譯本之外，還有羅禪布刺德（*Ranschenpalt*）和韋德靈之德文（*Weiting*）譯本，這可知當時該書之受人歡迎了！

後來瑞斯德退出同盟之活動，而韋德靈（*Wilhelm Weitling*）便繼之任事，他是當時一個職工徒弟，但能夠博通共產主義之書籍；因此他是同盟之真正指導者，和他一起活動的爲沙普爾（*Karl Schapper* 一八一二——一八七〇年）；沙氏生於威爾堡（*Weihlbürg*），在基森學森林學，爲森林官，後來參加佛琅克福特暴動（一八三三年），失敗

後逃到瑞士；又到巴黎加入祕密團體的『家族社』(Familles)和『季節社』(Saisons)。沙普爾不是學問家而是實行家——他是一個陰謀家，一個祕密結社者，一遇有民主主義暴動，他無不參加。後來他便屬於共產主義同盟。和沙普爾一同活動之人物還有下面幾個：第一個爲靴匠包爾(Heinrich Bauer)，他活動于最有精力的奧巴富蘭克人(Oberfranke)和巴黎的法德二國人之祕密團體之中；第二個爲鐘表匠慕耳(Josef Moll)，他生于1811之哥倫(Cologne)而死於1849年之巴敦(Baden)革命。第三個爲愛華伯(Ang Hsmanu Everbeck)博士，他生于丹澤(Danzig)，可惜他雖長住巴黎，從事著述，却不能和其同志共由空想的共產主義而進到革命的共產主義，他的假名爲協伯拉(Wendel Hipler)，加伯德(Cabets)之 *Ikarion* 一書就是由他譯成德文的；第四個爲柏林教授摩爾拉博士(Dr. German Manrer)，他不能超出舊式之共產主義的範圍，(註)他在巴黎爲德國新聞而著述；晚年死於佛琅克福特。最後我們要曉得由一八三七

年至一八四四年間在同盟黨人之中，其最重要之思想家爲韋德靈(Wilhelm Weitling)。他有超卓的建設之頭腦，和勇於犧牲并無私欲之性格，他是馬克司時代之前的唯一偉大共產主義者。他本是一個法國軍官和德國女子之私生子，生於馬德堡(Magdeburg)，時期爲一八〇八年十月五日。他最先學做裁縫的工作，在一八二八年離去故鄉，直到一八三五年他都在色次山(Sachsen)和維也納(Wien)，後來他到巴黎加入「義人同盟」和「家族社」；他在巴黎不久便返維也納，但一八三七年，又返巴黎開始共產主義宣傳之生活了。他受「義人同盟」之囑託，第一部寫作的共產主義之著述爲現實中的人類和理想中的人類(Die Menschheit wie Sie ist und wie sie sein soll) [一八三八]。這本書仿放拉曼尼可以聖經文體來寫作的。其格言爲「耶蘇看見很多羣衆便現出可憐的樣子，對門徒說：『穡多工少……』」照韋德靈解說，則所謂「穡」者是完全成熟的人類財貨之共有。爲人類共同生活之標準應是自然律和基督的愛。不過韋德靈并不僅宣傳共產主義，他還擬定了

未來共產社會之憲法：爲要達到經濟之共同行政之自治的目的起見，把人們組織成一種家庭，家族友朋之形式，農業和工業都由被選出的委員會所指導，至于全國則以各家族之首長組成一個委員會以管理之。這本書裏面各種批判的和實證的思想，便是韋德靈宣傳之基本；他後來著調和及自由之保證（*Garantien der Harmonie und der Freiheit*），一八四二年又作貧窮的罪人之福音（*Das Evangelium des armen Sünders* 一八四三年），也不過把這種思想加以擴張而已。韋德靈之學問多從傅立葉，歐文，布蘭克等人得來，不過他富于思索和創作；他把德國未來之計劃和共產主義組織之計劃，獻給德國勞動者，教訓他們在從私有財產轉形到「共有財產」（*Gemeintum*，這是韋德靈確譯共產主義的名詞）之時期，要應用革命獨裁之戰術。不過他也有一種弱點，像一度黑影，掩蓋于他的事業之上：就是他曾和聖西門傅立葉一樣，哀訴於國王和有力者之前，求乞他們担任救濟人類之任務！調和及自由之保證一書的結句，和聖西門的新基督教之結句，及

君士德蘭地(Considerants)將其社會運命(Destinee Sociale)一書獻給法王路易，真是相似。這是一八四二年的事情。此後他便是一個完全革命者了。他參加于反對七月王政的布蘭克和巴爾伯司(Barbes)之叛亂的計劃。一八三九年五月十二日，沙普爾(Schapper)，包爾(Bauer)和摩爾(Moll)等都因為參加變亂，受長期待審之拘留，但是韋德靈却沒有因此受罰。前三人釋放後到倫敦，設立同盟中央局，而韋德靈到瑞士，則據着少數德國勞動者所編行的德意志青年呼聲(Hilferuf der deutschen Jugend. Herrsgeben und redigiert Von einigen deutschen arbeitern)月刊(日內瓦發行一八四一年)，繼續宣傳。後來韋德靈主編之少年時代(Die junge Generation)又繼續出現。在青年呼聲之卷頭論中有這樣的話：『我們德國之勞動者，要為我們及一切人類之幸福而大聲疾呼，由于這種呼聲，便令人人相信我們可以正確認識我們的利益，我們不用拉丁文和希臘文那樣藝術的表現來誇張，我們祇用純正德語來說出我們的苦痛和困難。』

(註)見 Gutzkows Gesammelte Werke (Costneoble, Jena) Bd. VII (Paris und Frankreich 1834至1

八七四) S. 117六。

這一段話後來爲吉哥夫引用於他的巴黎通信之中，(註一)他又在這一種雜誌之中發現有紀元前二千年之巴黎一篇論文，特別引起他的興味，所以他便加以註釋說：『牠想在二三百年之間，將巴黎和全世界加以改革，令到人類完全不曉得貨幣，軍隊，國家，爲何物，……牠對於勞働階級和逐漸實行的共有財產之急激改革的思想，大膽地暴露出來，人類決不會禁止這種逐漸擴大於巴黎和瑞士的德國勞働者間的觀念，而努力和牠反抗的。』(註二)

(註一)見 Gutzkow (A. A. O.) 1160頁以下，又 Georg. Adler (A. A. O.) 三十頁。

(註二) Gutzkow (A. A. O.) 1161頁。

和韋德靈同在瑞士從事共產主義活動的；是伯加耳 (August Becker) 和西拉耳 (Se-

bastion Seiler)伯加耳曾在基先讀書，和布涅爾(在一八三二至一八三四)結交，後來逃亡瑞士；一八四二年，他由瑞士寄稿給一高倫(Kolner)的『萊因新聞』(Rheinische Zeitung)。西拉耳生于西里西亞(Schleien)，在里尼茲(Liegnitz)從事記錄之職，後投入砲兵隊，昇為砲兵隊長，以後走到巴黎，加入『季節社』，被驅逐而逃瑞士，又到不魯塞及巴黎看見二月革命；他也曾在倫敦(一八五〇年)和馬克司，恩格斯，韋力茲西(Willichsw Hwfe)共同活動，——因此他也加入共產主義同盟為會員。

因為居在瑞士的共產主義運動逐漸發展，遂令保守份子大大不安，便逼着官吏加以暴力的干涉。于是韋德靈便在蘇列茲(Zurich)被捕，其文稿書信都被沒收送交政府，政府特設委員會施行攷核，而以有名的法理學者伯倫茲里(Bluntschli)為委員長。一八四三年發表伯倫茲里報告，——報告之動機本來對於共產主義飽含敵意——但其結果却變為共產主義的最好宣傳資料，因為他們原來得不着豐富材料，現這借用政府的力量却得

着了。不過根據這一個報告，則韋德靈犯有褻瀆神聖侵害財產的罪名，要處四個月禁錮。他後來不服而上訴，其結果改爲六個月懲役，期滿驅逐出境。他受懲役後，逃往馬德堡，(Magdeburg)再經漢堡而轉倫敦，最後往不魯塞和紐約去，紐約本來祇有共產主義同盟的一個支部，現在因爲韋德靈却成了同盟的中心了。

(3) 韋德靈與革命的獨裁制度

解放同盟之目的，是：「民主主義的和共產主義的家族同盟之實現。」因爲真正民主主義之基礎必不在於普通選舉和政治的議會工作，而實在以共產主義最高目的爲標準，而牠一切勞働和享樂，權利和義務，都組織起來，所以這一個家族同盟的性質是民主的。又因爲這個基礎，祇有由革命纔能夠創造出來，所以「第一步要用革命的戰士，取得臨時革命的選舉權，在武裝集會之中，爲要建設新秩序起見而選舉臨時的革命政府

和革命裁判官。這時候有選舉權的，應當以從事社會有用的職業和勤勉有能力而愛秩序的人爲限。其他如資本家，商人，教士，律師，和一切同類的寄生人物，都沒有選舉權。」

所謂「家族社」，並不是政府，不是國家，而祇是管理生產財貨交換之中央管理局；各個經濟部門，都由以生產者所選出的委員會，和家長會議共同管理，他同時又可以決定工銀和確定勞働的時間。

社會革命勝利之後，革命軍宣言以解放同盟的原則爲土地之標準。勞働階級武裝起來，把含有惡意的富豪和反革命者之武裝全體解除；廢止裁判所和警察制；有選舉權的人，要決定可以信用的代表者，以預備填補空缺。一般的勞働義務，成爲法律；浪費和怠惰，必須處罰。一切金錢，完全廢止，當作貨幣通用的，祇有勞働證券；勞働證券是表示勞働時間和性質之證明書，由這種證明書可以向公共倉庫領取同等價值之貨物。凡

在言論上或行動上有幫助革命之好意的富人，得受相當的年金。因為勞働證券既當爲唯一之貨幣，所以反革命之富人不得不將他的財產交公共團體處理，因爲他自己的錢財不能夠得到食物衣服和其他生活手段的緣故。一切具有勞働能力的人都分屬於各種職業團體，在各該團體裏面選舉那些代表他們利害的人，以組織職業委員會，職業會議，和民主主義的和共產主義的家族同盟的議會。職業委員會在各處地方，從種種生產物之質和量，來決定一個人之勞働價值。這個臨時政府之職務在於延緩社會的鬥爭，而在這個期間內則由補缺之選舉使政府更爲鞏固。『這個社會鬥爭，并不限於地球上任何地方，倘有王冠和錢囊之支配及其共犯者共同欺騙民衆，因而越向民衆加以榨取的事情，那就社會鬥爭斷然不能停止。』(註)

(註) Vermut und Sieber 之前舉書，第一部，一九三——二〇〇頁。

(4) 韋德靈之晚年

三月革命(一八四八年)暴動後韋德靈雖到柏林活動，但無效果。因此他離柏林而到漢堡，在那裏雖然有多少同情者，但仍然被逐，不得已重返紐約。他爲着他的理想，爲着他的生活和家庭而工作。在鬥爭和窮苦當中，他繼續於一切之發明和計劃，再活二十多年，直到一八七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方才死去。他是始終未受過社會公正待遇的人，同時又是我們同志中最偉大而又最善良的一個人物。假如要勉強舉出他的事業中之缺點，那便是和聖西門，傅立葉及蒲魯東一樣，其自我意識同是太強。他不特具有理想之長才，還具有建設的天才和公平無私的犧牲的品格。他的著作直到今日還不失其價值，這便可見他的偉大了。(註)

(註)參考參靈 (Vergleiche Mehrings) 所編纂的韋德靈之調和的保證 (Garantie der Harmonie) (Vor-

wort-Verlag) 出版柏林一九〇八年。

(5) 由「義人同盟」到共產主義同盟之轉變

因為參加「季節社」之巴黎叛亂而被逮捕的沙普爾及包爾和其他的同志，卒於一八三九年之末釋放。他們于一八四〇年二月七日在倫敦設立德國勞工教育同盟——到後來便改爲共產主義勞工教育同盟——這一個同盟，是德國僑民勞動者間的共產主義宣傳之中心點。在倫敦雖然本有許多同盟的支部，但因經濟革命之經過，又隨着英國近世史之進行的發展，于是便和新憲章運動(Chartist)相連結，而抱有民主主義的和社會政策的思想。同盟會員公然和社會民主主義的運動相接觸，後來在一八四五年，在倫敦逃亡的社會民主主義分子開始爲國際的團結。這一個「友愛民主黨」(Bruderlichea Demokra-tie)裏面有英吉利人，法蘭西人，德意志人，意大利人，波蘭人，所以牠用各種言文以普及社會革命的思想。至于德國勞工教育同盟，除德人之外，也是逃亡于倫敦之一切各

國社會主義的工匠和勞動者之第二家鄉。倫敦之「義人同盟」中央部與巴黎，不魯塞，瑞士，德意志之各國同志相交通，同時又對於巴黎進步（Vorwärts）雜誌所發刊之愛巴斐德（Elberfeld）的『社會之鏡』（Gesellschafts Spiegel）和其餘同類出版品的進步的共產主義學說，加以研究，這些學說後來又由馬克司和昂格斯的擴大而得獲新的見解。一八四二年終，昂格斯到英倫，便和英倫本部及巴黎支部發生關係，不過巴黎支部，以加伯爾，薄魯東，及韋德靈之思想佔優勢，所以新的見解便不能注入。當時在巴黎活動的，為愛華伯克（Everbeck）。格倫博士（Dr. Karl Grün）及海士（Moses Hess）。而海士恰好像一條鎖鏈，在消極批評的空想共產主義和馬克斯的社會主義之間，連結起一度精神的橋梁。所以關於他的事跡很有詳述的價值，這當留在下一章了。

在瑞士呢，則由一八四五年到一八四六年間，「義人同盟」不狠發展。其會員祇陷於社會的和宗教的狂信，或則發狂地為空想的計劃。

同盟精神之重點，實在倫敦，牠對於共產主義之本質和目的的研究很爲興盛。馬克司從不魯塞把印刷品或石印的通信寄給他們，使住在倫敦的人明瞭新的方向。因此本部中的人員如沙普爾，包爾和摩爾等於一八四六年十一月發佈傳單送給各會員，并發出關於目的和戰術并皆明顯的無產階級的和共產主義的問題，一八四七年二月所發佈之傳單，就更爲進步了。這時候（一八四七年一月）住在倫敦的會員派摩爾爲代表，到不魯塞見馬克司和昂格斯，請求幫助。

我們現在已到了『共產黨宣言』的起草和三月革命的勃發之前夕了。所以我們在下章要回顧的德意志諸邦於一八四〇到一八四七年所發生的各種事件。

第三章 德國之政治及社會運動（一八四〇至

一八四七）

（1）海燕

腓特烈·威廉三世（Friedrich Wilhelm III）統治德國，凡四十三年，於一八四〇年逝世；腓特烈·威廉四世繼位（一八四〇至一八五八年在位），——他本有豐富的才能，但因為性格輕浮，并好和各方面敷衍，所以便變成衆人之和事老，他沒有堅確的精神，而對於國民之狀況又沒有透澈之瞭解，他從傳統教育得來的偏見，更不能排除。所以他雖有善良的意志，沒有實際的決斷。這種性格之根基常有極強的傳統偏見，所以他

是不能接受一切新思想的。

對於充滿着活潑生氣的『青年黑智兒派』和『青年德意志派』等智識階級，則新時代開始之希望經已過去，而痛苦失望之時代却來臨了。最有力的表現，則為赫爾域(Hervagh)布魯志(Pruzt)沙烈德(Sallet)海涅及法來里格拉(Freiligrath)等的政治抒情詩。德國政治詩本來已非常發達——在十八世紀末古典時代已經狠為優越，——一部份因為物資上和民族上之猛進，而一部份則因為政治和精神之壓迫，所以政治詩便更為發展了：

煽動家，雅哥賓黨 (Jakobiner)，

應當勇敢進行。……

青年黑智兒派，

深深地被觸着心靈，

大膽地把神聖弄污，

把宇宙的神祕論旨翻新。……

勇敢進行，

崇拜理性，

崇拜裸體的婦人，

并且宣言這是新的上帝！

司托拉司 (Strauss)，費爾巴哈 (Feuerbach) 和包爾 (Bauer)、
已經熱烈地把捉着我們。(Rudolf von Gottschall)

當時有一種學者，在歷史的發展中期待一切，並指示其發展，而沙烈德 (Sallet) 便唱着下面的詩歌來答覆他：

你們說，「熱血的青年，

何不拋去狂信的自由之幻夢！

因為好的東西祇在歷史發展之中。」

但是歷史中有什麼事情呢？……

歷史祇說明巴士的獄的破壞

和國會中狂烈的鬥爭。

可憐的王黨人！

你們的面影在地面消滅之時——什麼人還記憶你們呢？

法來里格拉(Ferdinand Freiligrath)在受政府壓迫之時候，他寫着下面的詩歌：

世界上沒有更好的棋盤：

我由沙爾德(Schelte)向林勿脫(Liminat)回來！

你們把我從棋盤的這一格逐到那一格，

必要把我逐出棋格以外麼！

村過村時鄉過鄉，

國過國——於我無傷——

但是這樣殘酷的棋局終不能壓迫我，

被困的怕還是國王！

(2) 社會詩：海涅，馬司拿爾，伯克

格侖 (Karl Grün) 在一八四五年說道：『社會主義的問題，已經指出現在的德國也上了路程了。新聞紙中對於無產階級的興起，勞工之組織及社會化從前沒有隻字提及，但現在已驟然有許多意味深長之論文了。』(Puttmanns Deutsches Bürgerbuch I 八四五，七三頁) 工業發展，極急激地反映到詩歌上，而新經濟狀態的光明面和黑暗

面，都成爲詩歌之對象了。

在煤烟圍繞着的都市中心，

幾千個煙突猛烈地吐出光焰！

『自然』仍具着放任的態度：

天真的形式經已改變。

而在奧大利國，則伯克(Karl Beck)却用鐵路建築之事情以慶祝各民族間之親善。

鐵路的軌道是因緣之線索，

鑄成了美麗的指環，

在國際之間正在交換了，

結合的婚姻。

不過新經濟狀態的光明面，在法國是幾乎看不見的。詩人們總受着社會批評的影

響，他們着眼到近代的窮乏。社會批評的傾向本來由法國傳來。海涅 (Heinrich Heine) 對於法國政治和社會的情勢，曾在寄阿格斯堡 (Augsburger) • 亞爾克摩爾 (Alkmoor) 的報紙之巴黎通信 (一八四一——一八四三年) 中提出法國社會主義之系統研究。海涅雖是藝術家，而且又是貴族，但他具有很強的社會倫理的良心，便使他不得不注意於法國共產主義之研究。同時在巴黎從事雜誌的著作之多數德國逃亡客，也研究社會主義書籍，努力社會主義運動。一八四二年，司坦因 (Lorenz von Stein) 博士之『現代法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刊行，在書中他把一八三一年以來法國資產階級 (Bourgeoisie) 和無產階級 (Peuple) 之階級對抗，極意描寫；全書的意義頗不一致；有許多篇章——尤其是關於共產主義一章——完全像經過檢察官手裏之檢查。但牠對於德國社會批評的思想，確有很大貢獻。其他的大貢獻則為海士 (Moses Hess) 之宣傳，他在一八三四年以來專心把青年黑智爾派的思想事業連結於社會主義之內。一八四四年西里西亞

(Schlesische) 的工人暴動，對於德國社會詩，增加很多實際的興味。韋爾夫 (Georg Weirth) 和法來里格拉德翻譯英國社會詩，使德之智識階級曉得工業的『現代女神』(韋爾夫)之黑暗面。當時韋氏之詩歌中已經這樣說：

無論誰何也不能和緩勞働之冤苦，

勞働者自己已排開阻力而努力進行。

在奧國的馬司拿爾和伯克已經努力于喚起社會的良心。

高高的烟突吐出火烟，

鐵軸裹着血紅的火焰，

趁着沈重的音調向前跳躍，

可曾看見那些面色慘白的孩兒。

馬司拿爾 (Alfred Meissner) 在他的司士加 (Ziska) 裏面，用很有力的筆調描寫泰卜

爾(Table)的虎斯黨(Hussten)之社會倫理思想，這也是很有意義的工作。他決定要從精神和物質的缺乏之社會中施以救濟，他的信念非常堅強，他說：『在他的時候到來，把一切外在的權力都屈服於精神面前的時候，……精神界之力量已經流佈於最貧賤者之身上了。日期近了，新認識的聖靈降臨節快來了。……到那個時候新的救世主來臨，除去一切罪惡和困窮，以勞働之分配，為全世界人類頒示平等的慈愛，你們的身體，將和基督之十字架，環繞着玫瑰花圈，放出異常燦爛的光彩了。』

伯克在其我們何故貧窮的一詩中，會使貧者向富者作如下之高呼：

你們積下不少的財貨，

但我們却要借貸和捱苦，齊到教會請求去，

祇有忍耐無可告訴，因為我們貧窮，

所以忍苦是我們永久的義務。

不過海涅比其他詩人更高出一籌，他在藝術上像希臘人，而在社會倫理上則像猶太人。他在一八四三年六月十五日寫給阿格斯堡·亞爾克摩爾報的信上說：『假如我生于皇帝時代之羅馬，在和朋友們通信之中，對於當時皇太后的政治陰謀全沒有談論，而祇說些普通的加利利（Gallileen）的故事，我怕同志們必會笑我罷。學識高深的同志們，如果我對於皇帝宮廷儀式之報告，僅僅說有幾個加利利人，點着火油的火炬，照耀着黃金建造的宮廷，此外別無重要之報告，那就更挖苦我了。……不過這樣挖苦，在現時實在沒有效力，因為火炬已散作火星而消散，而羅馬世界的一切腐敗的繁華，也和火星一齊消滅了。』海涅這裏已說出他對於法國共產主義的報告之意義。又在其三年之前，對於波爾恩（Ludwig Borne 一八四〇）的事情，有下述的話：

『在新約聖經裏面，我以為最值得注意的話，就是約翰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二至第十三節：「我還有好些事要告訴你們，但現在你們不能領會。祇等真理的聖靈來了，他要引

導你們明白一切的真理。因為牠不是憑自己說的，乃是把他所聽見的都說出來，並要把將來的事，告訴你們。」這關於將來的話到底沒有說出，所以便成爲新的啓示。這一種啓示，由以真理救贖罪惡開始，而終於以殉教而建設永遠歡愉的千年王國：於是一切約言，便都完全實現了。』下述的是社會平和，共同勞働，及友愛的共同生活之第三福音：

我們在岩石之上

建立第三間禮拜堂

用第三種新底聖約；

把一切悲哀，盡皆消失。

海涅的時代的詩歌 (Zeitgedichte)

(3) 社會批評：海士，格倫，呂寧，奧爾加爾司

德國的工匠學徒，雖然帶着傅立葉和聖西門的社會主義到德國去，但在別一方面，則德國思想家，已努力從德國哲學——如黑智爾和費爾巴哈——中加以社會主義之演繹，而成爲德國的社會主義。在他們中之最重要的——馬克司出現以前——就是萊茵蘭的社會主義之前鋒海士（Moses Hess），他生於一八一二年一月二十一日，波恩（Bonn）地方，家庭的氛圍充滿猶太人的忠誠篤學的空氣。當讀書的時候，早聽過他的祖父所說救世主來臨的說話。他父親在哥隆（Cologne）開設糖廠，一八二六年，叫他充糖廠之理事，想把他做成商會の後繼人。不過他不喜歡管賬；他要做學問的工作，誦讀斯賓挪沙（Spinoza）的書，斯氏的書，是當時猶太新青年，對於傳說信仰發生懷疑者所常誦讀的。一八三〇年，他就學於波恩（Bonn）大學，研究宗教問題，讀四福音書和教會史，並且拋棄了猶太人對於基督教的偏見，因此他便離開雙親的家庭。他曾在短少時間逃往國外，但因沒有費用，便不得已重歸故國。在他旅遊之中，他怎樣開始和社會革命

家相接觸，而得受新生命的第三福音，則我們不能詳知了。不過他由一八三五年以來，即已熱心從事社會宗教和黑智爾的思想，却是無疑義的；其研究之結果便是他的神聖的人類史（*Heilige Geschichte des Menschheit*, 一八三七年），在這書中以神祕的宗教方法，將歷史各階段，當爲人類精神及物質的統一及調和之發展階段。書中並沒有表現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這大抵用顯明的表現方法，在當時是非常危險的；所以海士不過把『新的神聖典章』，給人類以統一的意志和『神聖的民族國家』而已。後四年，他發表歐洲的三頭政治（*Die Europäische Triarchie*, 1841），他在書中把哲學，法國的革命精神，和英國的社會實行三者互相結合。同年費爾巴哈之基督教本質（*Wesen des Christentums*）出版，海士受極大影響，由此他便在德國哲學和社會主義之間架出一道橋樑來。但這道橋樑祇不過一時的假設而不能長久繼續，必須要待馬克司出現，用黑智爾的辯證法，纔完成其體系——這些要點，將在次章述說出來。海士究竟怎樣由費爾巴

哈而演繹社會主義，他自己却沒有認真論及。他祇說道：費爾巴哈說神的本質是人類所先驗（超感覺）的，至於神的本質之真義就是人類本質之真義：換一句說：神學就是人類學（神的教義就是人類的教義）——這一句話原是真理，但不是普遍的真理。因為人類的本質便是社會的本質，為同一目的和一致的利益之原故，於是各種各式之個人，便共同活動起來，所以人類之真義。便是真實的人本主義，便是人類社會結合之教義，換一句說，人類學和社會主義是同一的。這是一八四五年海士發表的話。（註）根據海士的話，則費爾巴哈以為宗教不過人類精神的神道化，神之認識不過即為人類之認識，這是不對的；因為這并不在於各個人類認識而在於社會的共同活動，和人類對於社會利害調和之認識；真的神學為人類的慈愛和人類的共同活動。簡而言之：則一切宗教都是社會倫理而已。

（註）海士的 *Sozialistische Ansätze, herausgegeben von Zlocisti, Velt-Verlag* 柏林一九二一年，一一

在今日看來，海士的演繹推論別無深意，但在當時（一八四一至一八四五）却大受歡迎，這是因為他把社會主義和青年黑智兒派哲學及宗教批判聯絡起來的緣故。一八四二年，海士把這種思想傳授於昂格斯（Friedrich Engels），他會昂氏于哥倫（Köln）。而引導之瞭解社會主義。不過他的推論對於馬克司却無何等貢獻。因為馬克司哲學造詣甚深，無須乎這樣之研究。海士這時，投稿于馬克司所主任的萊茵新聞（Rheinischer Zeitung）。一八四二年至一八四三年冬天，海士旅行巴黎，會見『義人同盟』的會員。其後他投稿於德國各家社會主義的報紙，一八四六年及一八四七年便成爲馬克司的黨徒，一八四七年作無產階級革命之結果（die Folgen der Revolution der Proletariats）登于德國不魯塞報（註）這篇論文極好，比之昂格斯的共產黨宣言草案還好得多。海士把馬克司在後幾個月發表的共產黨宣言之要旨化爲通俗文字，他大約是以馬克司在一八

四七年秋天不魯塞勞働同盟的講演稿，和與此有關的討論結果爲根據而後寫成的。

(註) A. . O. Seite 207—230, auch in anhang zu Engels, *Grundsätze des Kommunismus*

(Erlangener) von Dr. Hermann Dunker, *Internationales Arbeiter Verlag, 1929, S. 48 ff.*。

海士生涯之最後二十年間，完全用在研究猶太民族，社會主義和自然科學的問題。他自始至終是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者而且是仁愛寬容及友誼的基督徒。他後來和德國一個私娼結婚，并以真愛和尊敬對待她，令她一生過着幸福的婚姻生活。他在一八七五年四月六日的巴黎，於其夫人和朋友之哀悼中逝世。(註)

〔註〕 *Biographie des Moses Hess, des Sozialisten und Zionisten, Von Dr. R. Zlocist. Welt-Verlag,*

Berlin, 1921.

上面經已說過的格倫 (Karl Grün 1813-1884)，便是海士高足之一；他是語言學者，後又做新聞記者，一八四四年以來便成爲一個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色彩之著述家。

他也曾在短時間亡命巴黎，和蒲魯東君士得蘭 (Considerant) 及加伯德 (Cabet) 同遊，而萊因蘭很接受他的勢力。本來他之社會主義，是有缺點的：就是混淆於人類的愛和正義二者之中；他也受有費爾巴哈思想之影響。他說道：『基督本質之最後結論，就是以仁愛代信仰。……因為基督本質是情和愛，這在將來是會實證的。』(Pwtzman 'Deutsches Bürgerbuch' 一八四五。五六頁所載)

當時多接受法國哲學而少接受德國哲學的是奧士呂寧 (Otto Lüning) 博士。他在定期刊物民衆雜誌 (Dies Buch Gehört dem Volke, 第一卷一八四五年) 之中，其主張和布蘭克 (Louis Blanc) 相呼應，以為現代之重大害處，就是競爭和『生產物品之勞働者及把物品變為財貨之企業家之分裂，因為分裂所以便不能把充分的工銀給與勞働者』(八八頁)。他像布蘭克一樣，以勞働者的生產合作之團結和國家的社會改良為救濟之方法。他又以為勞働者之鬥爭是對於一般的社會關係而不是對企業家的。

奧爾加爾司 (Herman Thomas Oelckers 一八一六——一八六九年) 是一個戰士，殉教者，和永不變節的活躍的著述家，一八四四年他著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運動，他所主張的是以國家社會主義為基礎的勞動組織。他在(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參加革命運動，在撒加辛 (Sachsen) 地方，被處以十年之監禁。

第四章 馬克司

(1) 馬克司在社會主義之重要

馬克司在法國社會主義思想計劃之完成和普及，與乎社會主義的哲學基礎之探索和思辨之最熱烈之中，在巴黎完成其一己之理論。

他的理論克服一切其他的社會主義體系，而成爲一般社會主義者和覺悟的勞動階級之共同根據。自此以後，社會主義便成爲勞動階級最爲關切之事件，而勞動階級又成爲政治學上一個重要問題。

在馬克司之前，勞動階級本是政治之奴僕，是社會學者所加以憐憫之對象；但在馬

克司以後，勞動階級，是統治之要求者，是將來的支配階級，是舊社會之破壞者，是第二個社會階段之建設者。

在馬克司之前，社會主義祇從史前的黃金時代，從自然法，從原始基督教，從人道主義之思想，從社會倫理——引出牠的根據。但在馬克司以後，社會主義却以經濟力趨向於社會化的集團而把一切物質及精神之促進爲目的的勞動階級的和革命的現實政策。在馬克司之前，社會主義祇是第三種聖書中之對平安和敬虔之千萬年的希望；但在馬克司以後，却成爲逐漸成長之戰鬥的政黨和階級之政治經濟的目的物了。

馬克司前之社會主義，是條文的，獨斷的，固定的，永遠妥當的信仰之教義，至於馬克司之社會主義，則是由私有財產制度到公有財產制度之社會的原動力。

勞動階級和社會主義本來是互相分離的；但馬克司却把牠結合起來，像肉體和精神一樣：他把精神灌入於勞動階級之中。

近世勞動階級，從精神上說來，實是馬克司之記念碑。可惜這種事業，不能在他自己及身而為十分詳細之完成。這實由於我們之錯誤和混亂。

自然這種事業到今還未十足完成，但馬克司已以其天稟之聰明透視一切現象和事件之曲折和混亂，而突入於事物之本質中，因為他具有理解歷史最新時代一般方向之能力，因而完成他的事業。他把以前的一切假面，空虛文句，虛偽，和客觀障礙，盡行破壞，使之像朝霧一樣的消失，他應用這種眼光而為精神的天才勇者。

(2) 馬克司和黑智爾之辯證法

馬克司出於一八一八年五月五日之特里爾 (Trier)；父親執律師業，而由猶太教士之家庭產生。一八二四年，他之父母才宗基督教。他卒業於故鄉的中學而轉學於波恩和柏林大學，一八四十年，在耶拿大學得哲學博士學位。他曾想回波恩大學為講師，後來

曉得沒有希望，所以便改轉心腸而從事於自由的著述家，他在一八四二年投稿於哥倫之萊因新聞，後來升爲該報之編輯人，但萊因斯因卒因馬克司言論激越而受檢查官之干涉。一八四三年，馬克司辭編輯職，與燕妮(Jenny von Westfalen)女士結婚，一八四三年晚秋旅行巴黎，研究社會主義之書籍，和投稿於青年黑智爾派的政治家盧格(Arnold Ruge)所發行之德法年書(Deutsch Französischen Jahrbucher)。這個雜誌在一八四四年，祇發行兩本，但在其中載有黑智爾法律哲學批判序論(Zur Kritik der Hegelschen Rechts-Philosophie)一文，這已露出馬克司主義的端緒了。

由於上文所述，我們可以認識馬克司與其先驅者不同之點了，他是使社會主義和鬥爭的勞動階級以及社會發展互相結合，而且把這種種要素融合於統一的體系之中。然而他如何得獲這種統一之思想呢？

一八四三年馬克司到巴黎之時，已具有很深的哲學素養，他抱着自由之渴望和社會

主義研究之欲望。他既有教育之素養，所以便容易確定方向，這就是說：從種種雜亂的現象中，看出其本質，而且發見現象的相互關係之能力。馬克司非常富有這種力量。然而他在巴黎見着了什麼呢？他所看見的是種種社會主義的思想，計劃，和見解，是法國革命時代之巴比夫（Babeuf）的陰謀和勃蘭揆（Blanqui）的祕密結社之勞動階級和革命的遺產。他又研究一八四二年之英國憲章運動（Chartism），於是他把種種材料，借用黑智爾的『辯證法』（Dialektik）綜合起來。他確信這種辯證法能夠指示他以歷史發展之根本法則。

黑智爾辯證法究竟是什麼？古代希臘人以辯證法為談話和問答之一種技術，是否定反對者的主張和證據而且加以反駁的技術，是闡明矛盾和對立之技術。更詳言之，則這種辯證的方法，一眼看來，祇像消極的否定的思考作用，但他能從對立意見之衝突中，抽出真理，而得獲更深的思想，所以是很有用的。黑智爾（Georg Wilhelm Frie-

drich Hegel 1770年生於司徒嘉德 Stuttgart 1831年死於柏林）本是德國哲學家 and 神祕主義者，他把發展之觀念導入於論理學中，這種思考方法的名稱，便是所謂黑智爾之辯證法。按照他之方法，則我們一切概念，都必有其對立或矛盾的方面，換句話說，就是一切肯定的東西必含着其否定的一面。這在表面地觀察起來，是容易輕忽的，但仔細觀察，便可以認識世界上所充滿的一切事物之真相。凡每一件東西存在的地方，必存在其對立之東西。舉例言之，有對無，寒對暑，光對暗，柔對剛，快樂對苦痛，富有對貧窮，資本對勞動，生對死，功業對罪惡，唯心論對唯物論，實在論對唯名論，古典主義對浪漫主義，不過這些都是素朴的思想，還沒有計算到矛盾和對立之世界。惟有批判的理性，纔把簡單的多樣性質和色相，銳利地化成對立，矛盾，肯定和否定之衝突。這種對立鬥爭終了之時，便發生或種高的東西。所以黑智爾之所謂矛盾并不指混亂之成因，不指糊塗錯誤的思考，而是指外在的對立；換而言之：即在實際推移之中，正

義成爲不正，合理成爲背理、有用成爲無用的時候，舊的法律制度，和社會的實際利害及新思想相矛盾的時候，或令法律秩序調和於新的利害與新的思想之間，而達到較高的社會階段的社會鬥爭發生的時候，纔是矛盾。黑智爾名這個較高的階段爲『否定之否定』，或名『綜合』(Synthese)。

這個方法我們要加以更詳細之說明，我們先以一個雞卵爲例。雞卵是一個肯定的東西，但在牠自身已藏着一個可以生長而成爲現實之生命，并且逐漸吃盡雞卵內容的胚胎(否定)。不過這一個否定，并不單限於破壞或絕滅；因爲其結果，則這個胚胎能夠發展而成爲一個生物。否定既終，則將生之雞雛，便啄破卵殼而出。這個『否定之否定』即是『綜合』，牠藉這種有機而較高的東西而表現了。

按照黑智爾之學說，則生活過程(即思想和事物之實在的發展)最重要之樞機，是『否定』力之覺醒，矛盾和對立要素之出現。黑智爾說，『矛盾是一切通行和活動之根

源；所以某種東西，祇在其自己內部含有矛盾的時候，牠才是運動的，欲求的，和活動的。由於肯定和否定之間的衝突之調和，然後較高的發展過程才為可能，而向於更高的階段，他說，在缺乏矛盾展開或使之尖銳化的力量之時候，則思想和事物——實在——便必沉沒於矛盾之中。

假如能真正理解這種辯證法的世界觀，那便可以理解馬克司主義的核心。

德國哲學中之最偉大和最德國化的是黑智爾哲學，像上面那樣簡單的話，自然是不可以說明其方法論的。并且黑智爾本是一個唯心論者：他以為論理的觀念，理性，宇宙的精神，和絕對——宗教地說來便是上帝——實是原始而自動的力量，逐漸發展其自己和其外表的世界，以神性表現於人類之中，按照黑智爾之教義，則世界史和人類史之一切形態，却是世界精神從素朴思想之階段到達神性之發展過程，所以照黑智爾之說法，則上帝是顯現於歷史之中的，這便是說，上帝之自體，逐漸發展，最先表現於無機的自

然物之中，其次是植物和有機物，再次爲動物，最後到人類，則爲最高級的表現。這是德國神祕主義學說之極峯。不過這種研究在這裏和我們絕沒有關係，我們不必多說，我們祇要正確理解黑智爾之辯證方法就夠了，因爲我們祇借牠爲理解馬克司主義之鑰匙而已。

一八三〇年以來，全德國都有離開唯心論而趨向於唯物論之趨向，就是馬克司也由一八四〇年至一八四一年之間移向唯物論去：主張精神不是原始的和主動的，惟有物質及其內在的力量，才是原始的，自己發展的東西。這種發展卽由對立分析而完成。馬克司帶着這種思想走到巴黎。傾注全力於法國社會主義和法國勞動運動的研究。他借助於辯證法，在勞動階級之中發見『存在之否定』，在社會主義鬥爭之傾向之中發見較高層段之『綜合』。所謂肯定，卽建基於私有財產和競爭之經濟制度，而對之而起的卽所謂『鬥爭』，『對立』，和『矛盾』。鬥爭是有目的的，所以鬥爭便逐漸尖銳化，務求達

到最後之鵠的，而且從中便產生社會生活的較高階段——這是馬克司由辯證法得來的結論。

由此我們便可以知道馬克司社會學的基礎，是在於他透澈地瞭解原有制度（肯定，私有財產論）之根據，和正在生長的制度（綜合，社會主義）之根據，二者之間，不能調和，互相對立。然而這些根據究竟是什麼？牠不是卓越的個人，也不是從觀念根據（即思想的斷定或道德的動機等）所否定的或種見解之多數人類的集團，而却是相對立於不能調和并且決定地必然發生鬥爭之矛盾中之有特殊經濟利益之階級。我們應當記憶一八三七年法國人所發生之思想。法國之經濟主義如何支配當時之社會意識（Ideologie）（參考本書第四卷）。當時又如何出現了資本和勞動之對立，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對立，而且當時資本集中和工業的中產階級之消滅現象如何地為社會主義者所充分認識——我們回憶上述的種種事情，就很容易曉得馬克司如何借助於辯證法，由是才把這複雜的現

象加以確然的社會哲學的關聯而完成其全體系之基礎了。并且馬克司着手這種研究，還有確實的進路：這便是國民經濟學之研究，資本家經濟制度之解剖，無產階級之任務，和在舊社會所孕育成長而達到較高階段的各種勢力之探討。

馬克司在其早年的各篇論文和德法年書（一八四四年中）已經建立了以後活動之基礎，這種基礎，在一年後所作之神聖家族（*Heiligen Familie*）一書而愈益發展，此後則于反駁蒲魯東之哲學的貧窮（*Misere de la Philosophie*，不魯塞版一八四七年）和由一八四七年十二月至一八四八年一月所起草之共產黨宣言（*Kaunistischen Manifest*）而更加鞏固了。

（3）唯物史觀

馬克司愈從事國民經濟學以及資本發生和進展之研究，便愈確信國民經濟學是資產

階級社會基礎的精神運動之表現。所以我們現在要詳細說明這種歷史的觀念：

我們祇一看人類歷史，便可以曉得以下的事情，即是各時代的人類，對於法律，道德，宗教，國家，哲學，農業，商業，工業等事情，無不抱有種種或真或偽的見解，保持種種經濟制度和社會國家的形態，並且經驗過不絕的鬥爭，征戰，和遷移。這種非常複雜的人類思想和行動，究竟其根源是什麼？馬克司最先提出了這個問題，不過他雖提出了這個問題，却并不以為解決這樣一切思想，法律，宗教，社會和商業之起源等問題，為唯一的最重要之事件。即因為他以為這些東西，不過是歷史所給予的事實。他所認為問題的，却是喚起精神的社會的現象之一切內容和形式的變化，改革，與夫一切傾向產生之原因和動機。換一句說：馬克司之研究中心，不是事物的起源，而是他的辯證法（發展和變化）即歷史的革命要素。

馬克司答案如下：令人類感情，思想，和意識內容發生變化或引生種種社會制度和

衝突的人類社會之原動力，并不起因於思考，理念，世界理性和世界精神，而實起因於物質的生活關係，(materiellen Lebensverhältnissen)。人類之歷史基礎也是物質的。然則物質的生活關係是什麼：牠是社會上的人類因為得獲環繞着他的自然，及其內在的肉體和精神的助力，因而形成他們的物質生活，并且將其生活資料，加以生產，分配，和交換，使滿足他們需要的財貨之「方法」。

物質生活全範疇之最重要的東西，就是生活必需的資料之生產。而生產則由生產力決定。生產力有二種，一屬於物，一屬於人。物的生產力：即土地，水，氣候，原料，工具，和機器。人的生產力：即勞動者，自然科學家，技術家，而最後則為民族之特質——即由人類集團所促進的歷史傳統之勞動的特質。

一切生產力中之最重要者是勞動者：他們是資本主義社會創造價值之唯一的力量。其次則為近代的技術科學；牠是社會革命和革新的次大之力量（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二，

十三及十四章。哲學之貧窮（一〇〇——一〇二頁）。

因爲勞動者各種技術之進步，各種原料，鑛物，消場等之新發見，各種方法，工具，機器等之新發明，生產方面之科學的適用，與于商業和交通機關之改良及擴大，所以生產力之發展——社會的物質基礎（經濟的基礎）便變化起來，舊的生產關係成爲無用。因爲舊日的生產關係，即一切舊社會階級，法律，國家制度，和精神的體系，都祇適應於現時漸次消滅或經已消滅的生產力的狀態之緣故。一到了社會和精神的上層建築，已和經濟的下層建築不相適應之時，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便必然成爲相互之敵對了。

于是新的實在和舊的形態互相敵對，新的基礎和已消滅了的基礎之腐敗結果互相衝突，在人類思想中便漸次發生作用起來。人類接觸於新的外界，感覺着新時代之開始。社會層子是發生變化；前時被人輕蔑的人格和階級，因爲得經濟的社會的勢力而便興

起，而前時被人尊敬的人格和階級，却低落下去。一方面社會下層基礎之變革逐漸進行，而他方面則宗教，法律，哲學和政治的體系，無論怎樣已經老朽不能滿足精神的要
求，却還把持着其傳統的地位，繼續存在。又因為人類的思想原是保守的東西：牠不能
跟着外界事物進行，這恰像光綫之達到我們的視線必要有幾秒鐘之距離，故此我們的眼睛，必要在太陽通過了某一段特定之時間才見太陽一樣。黑智爾有一個狠妙的譬喻。他說『曼拿華(Minerva)梟鳥，必要等日落後才飛出來』。好在牠飛出雖遲，但究竟還是
飛出的。因為新的思想家逐漸出現，瞭解新的情勢，產生新的概念和思想過程，適應新
的環境。人類意識到底也發生了疑惑和問題，於是新的真理發見，再進一步，便達到意
見之糾紛，論爭，傾軋，分裂，階級鬥爭，和革命了。

(4) 階級鬥爭

馬克司關於歷史過程的認識之最重要的一種貢獻，就是他的『社會階級』和『階級鬥爭』的思想。所謂階級就是有共通經濟特徵的一定社會人們之集團。所以以工銀爲主要的生活源泉之人們集團，便是勞動階級。而以利潤，利息，地租，爲主要的生活源泉之人們集團，便是資產階級。對於工銀之支付，對於社會組織的經濟性質，這兩個階級都有不能調和之敵對，起初因爲工銀和勞動時間的原始之敵對，隨後因爲勞動階級之智力增大，于是關於經濟制度之階級鬥爭也便積極地發展起來；一方面資產階級努力於維持現狀，他方面勞動階級便努力於以社會主義變更現在的經濟和社會的生活。這種偉大的社會階級鬥爭，便變成不可避免的政治鬥爭，而鬥爭之直接目的，便是政權之奪取，由是一方面資產階級，想靠國家的力量以維持地位，而他方面則勞動階級，却想奪取政權以實現其更遠大的目的。

根據馬克司之見解，則這種鬥爭，勞動者終得勝利，勞動階級必成立由私有財產到

社會主義制度的過渡期間之獨裁統治，而漸次改革社會。

『勞動階級之獨裁』一語，最先由馬克司使用（見一八四八年法國之階級鬥爭九八頁以下，一八九五年和一九二〇年柏林版），是在一八五〇年；在兩年之後馬克司（在紐約通信）自認爲從『階級鬥爭而領導到勞動階級獨裁』的觀念之創始者（*Nene Zeit*, Band 25, 2, Seite 164）。最後他在哥達綱領批判（*Kritik des Gothaer Programms* 一八七五年寄德國社會民主黨幹部之信札）說，『勞動階級獨裁，是過渡時期，亦稱真正革命時期之國家權力。』（*Abgedruckt Nene Zeit*, 1871, Band 9, 1. & 573）

（5）馬克司經濟學之要素

馬克司經濟學之主要問題是：資本主義經濟的原動力和目的究竟是什麼？財富增大之來原是什麼？他在資本論（全三卷，一八六七——一八九四年）一書中，便把這個問題

題詳細解剖。

他說：財富是國民生產的財貨使用之數量。普通的資本主義經濟，是一年一年地生產更多的財貨，又把牠集合起來而再生產剩餘，這樣而財富就增加了。

然而以怎樣的人來生產這些剩餘呢？換而言之，使財富增大的是那類的人類集團，那樣的階級呢？

馬克司爲要解答這個問題，所以便研究所謂『價值』。財富本是以價值計算的。但價值是什麼？馬克司決不陷于空想，他看見企業家之商店，是以生產的費用爲價值之基礎的。然而生產費用又是什麼？生產費用便是原料，建築物，機器，和工具之消耗，支給工銀之費用，與乎附加於商品上之通常的利息。按照馬克司之說法，祇有以能力應用於生產及原料和商品的運輸工作之勞動，才能做出價值。由此可知使用生產，和把原料拿到生產地之搬運，是社會上必需的筋肉和頭腦之勞動，是價值之源泉，是價值之衡

量。但是這些價值勞動者所取之工銀，常比他所做出的價值之數量爲少，因此生產的勞動祇是替企業家做出支付工錢以上的剩餘價值而已，這種差異是剩餘價值的源泉，而且在剩餘價值之中，企業家得獲利潤，銀行家得獲利息，地主得獲地租，而經紀人則得獲佣錢。

不過也不能夠說各個企業家都得獲其工場上所生產的剩餘價值的，因爲他必須插足於世界市場和面對着競爭。例如他的工場之剩餘價值額原爲百分之五十，但別的企業家之剩餘價值，却爲百分之六十，或四十或三十的，那就在市場上平均計算，實在祇有百分之四十五而已。

價值之衡量既由生產的勞動所形成，則用於某種商品生產的勞動越少，其價值必越少。若在以機器勞動代替人力勞動之時候，則其所做出之商品必是較便宜的。由是用人類勞動力越少則剩餘價值也跟着減少，而且各個商品之利潤減低，則一般的利潤率也必

然減低，企業家爲要和這種進程相對抗，那就祇得採取大量生產的方法。然而大量生產談何容易，倘非有大量的原料，和巨大而且精巧的機器及建築物，是不能夠有大量生產的。能夠達到這種企圖者，便祇有大資本家或股份有限公司方才可能，而資本短小的工業家和手工業者却在所消滅了。由是經濟生活採取集積和集中的過程，而令階級和階級之間的鴻溝更深更廣了，同時又把社會分成極少數的大富豪和極多數的無產者，更使工業中心地的勞動者團結起來，強固他們的組織和階級意識，擴大他們的階級鬥爭，令他們的革命熱潮達到頂點。這最後一幕戲劇便把一切生產手段放在全民指導及管理之下，一般人民實現經濟的民主主義而沒收資本家的所有。不過所謂勞動階級的獨裁，是意識地指導變革過程，而過程中自然也有一切阻礙，所以在其中便必然地發生一個打破這個過程的一切障礙之中間階段了。

(6) 進化與革命

馬克司不是把進化和革命當爲兩相對立的東西。關於這一點，他和黑智爾相同。黑智爾辯證法，和馬克司全生涯的事業，是同樣地統一和緊密的。所以共產黨宣言之進化的精神，并不比資本論或經濟學批判爲少，而且反而言之：則資本論和經濟學批判，也并不比共產黨宣言少了革命的精神。

這又如何解釋呢？

黑智爾辯證法，是人類鬥爭的進化和思考理性的矛盾之尖銳化。牠決不是自動的，和平的，和寂靜的生成，生長，及順應，而却是破壞由『肯定』而變形的『否定』之實現。所謂否定之全作用，是達到『否定的否定』之革命的作用。這是黑智爾論理學之精華：牠發見宇宙中和社會中存在之矛盾，其中含有矛盾的鬥爭和舊『肯定』之解體。按

照黑智爾辯證法，則進化和革命，並不是敵對的。

馬克司的社會主義之辯證法也是這樣。凡讀馬克司著作的人，應該曉得在書中究竟研究什麼：換句話說，即他所研究的是客觀過程——經濟的發展，資本主義生產及流通的分析——呢，抑或是無產階級之活動。

經濟的過程，祇是進化的物質，而無產階級及其指導者之活動，才是革命的變革。在共產黨宣言和在共產主義者同盟中之演說，都以無產階級為討論之對象。所以革命的要素強烈地表現於其表面中，在這裏我們可以看見馬克思是革命思想家的樣子。

但在資本論却有所不同，牠是以資本主義經濟為討論之對象。所以進化的要素便強烈地表現於其表面之中，在這裏我們可以看見馬克司是經濟發展之解剖者的真面目。

黑智爾在論理學會經說過『思考的理性之職務即是矛盾的銳利化之職務』，馬克司把這種職務交給過有階級意識而願意犧牲的先鋒——他們是必然地由生產條件所發生的

無產階級之鬥爭，推進到極峯的。

由是可知黑智爾和馬克司同認矛盾的衝突和對立的銳利化，是使生活之展開和宇宙力之充實的最有効力之手段。

由革命手段而進化：便會達到社會經濟的認識和社會革命的行動，——這是馬克司之約言。（註）

（一）馬克司此後之生活：人所周知，所以不加詳述，祇記其大略如下：馬克司一八四五年在巴黎被逐而到不魯塞，他住在那裏，直到一八四八年。在該年三月初到五月底他又到巴黎，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九年他在哥命（KOH）爲新萊因報之編輯，其後數月又回巴黎居住，一八四九年終，避居倫敦，直到一八八三年三月十四日死。他的經濟學大著作資本論即在倫敦完成。

（7）馬克司與昂格斯之友誼

和馬克司最爲深交而且最能補助之朋友，是昂格斯 (Friedrich Engels)。昂格斯自然也是有偉大智識和才能的人物，但無論如何，也不過和海士，格崙，呂寧，蒲魯東，和布蘭克等，相上下而已，其所以能在社會主義史中佔有絕優的地位，是因為他自始至終和馬克司結有很深切關係之緣故，他佩服馬克司之天才，在前後數十年間，盡把精神物質，大大犧牲，以促進馬克司之事業，用知識的愛慕所發生之情熱，以堅固他們的友誼。

昂格斯一八二〇年生於巴門伊北菲爾特 (Barnen-Elberfeld)，其父親是企業家而且是誠篤的新教徒，他接受很好的中學教育，卒業後過着實業生活，曾經經過宗教的危機，因而成爲青年黑智爾派和無神論者，其後又由海士之介紹，而成爲社會主義者。他二十歲便以著述家而初露頭角，當時狠帶着青年德國派的愛國色彩。一八四二年終，他到父親所設立之曼徹斯特 (Manchester) 工場服務，在那裏答應萊因報之囑託，專做關

於英國社會狀態之論文；一八四三年，與憲章運動（Chartist）及歐文主義之指導者相結托，開始投稿於他們的機關報；他由社會論理的立場著國民經濟學批判（Kritik der National-Ökonomie），登於馬克司之德法年書（一八四四年）之中，是為兩人終身友誼之媒介。一八四五年發刊其社會批評的著作，是為英國工人階級之狀況（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同時又在巴黎不魯塞和萊因為共產主義之活動；馬克司當時著有神聖家族（Heilige Familie）一書，對於墨守自由主義範圍之青年黑智爾派的友人作一清算的批評，昂格斯對於該書是有相當貢獻的。一八四七年作共產黨宣言草案，為共產主義同盟之一個發起者，他的精神生活，自此以後便和馬克司結合為一，他做新萊因報之寄稿者（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參加巴敦叛亂（badischenanstand）（一八四九年），為新萊因評論（Neue Rheinische Revue）從事工作（倫敦一八五〇年）；他由一八五〇年至一八六九年間在曼徹斯特從事商業；在他父親的英國工場服務，但在

同一時候他研究軍事和自然科學；以金錢和英文的著作，極力幫助馬克司的生活。一八七〇年以後，他和馬克司同住倫敦，並且幫助馬克司同著反杜林論（Anti-Dühring，一八七七年）。馬克司死後（一八八三年），他努力把資本論第二，第三卷編好出版，他所自著者則有人種學，哲學，和政治學等論文，他死於一八九五年。反杜林論一書對於馬克司主義之傳播是非常重要的。

（8）共產主義同盟之設立及其規約

一八四五年以來，馬克司和昂格斯把他們的新見解，廣佈於『義人同盟』會員之間，所謂新見解即是共產主義并非由于有力的博愛家之扶助，或從殖民地那樣的社會制度之完成的計劃，所謂共產主義實是組織勞動階級而成爲獨立的政黨，而這個政黨要由革命的手段奪取國家權力，以傾覆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實行共產主義的改造。

這種思想，在曾經發生憲章示威大運動努力由民主主義而到達於社會改良之倫敦，早已接受了。

一八四七年一月月尾，『義人同盟』本部派摩爾（Moll）到不魯塞，勸馬昂二氏加入同盟。同盟在一八四七年六月一日，大會於倫敦，昂格斯和馬克司之代表和爾夫（Wilhelm Wolff）都往參加。九月，發行沙普爾（Schapper）編輯的共產主義時報（*Kommunistische Zeitschrift*）第一期。標明『萬國勞動者團結起來！』之口號。自此後，『義人同盟』便改爲共產主義者同盟，在一八四七年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八日召開大會。當時馬克司出席，并受大會之囑託，和昂格斯担任起草共產黨宣言。大會決定所採用規約的重要點，如下所述：

第一款，同盟之目的，是資產階級之推翻，勞動階級之統治，舊階級支配的資本社會之廢止，與乎階級和私有財產廢止的新社會之建設。

第二款，加盟之條件：(a)適應於同盟目的之生活與活動；(b)在宣傳運動上表現革命的精力與熱誠；(c)共產主義之信仰；(d)不加入於一切反共產主義的政治或國民的結社；(e)同盟決議之服從；(f)嚴守一切關於同盟事業之祕密；(g)支部加入之應諾。

第三款，一切會員，盡皆平等；有如兄弟，無論何時何地有互相援助之兄弟的義務。

在上述各要點以下便是組織上的各項目。

馬克司歸不魯塞，便把共產黨宣言送倫敦印刷，恰在這時，巴黎革命忽起，并且反響於德意志聯邦各國。

(9)德國共產主義的反響；波崙，和曼特爾的柏林訴訟

在不魯塞，巴黎，倫敦，工作之德國工人，帶了新的使命回祖國去。柏林，哥倫，

北勒士勞 (Breslau)，是共產主義思想侵入德國的最先的都市。返國的學徒，加入于職工和學徒的工會中，努力普及這種思想。在柏林中盛行這種活動，我們看一八四六至一八四七年起於柏林之曼特爾事件，和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在柏林和來布色 (Leipzig)，帶有多少馬克司主義的意味而活動之波崙，便可以明白了。

波崙 (Stefan Born) [一八四四年生于里沙 (Slissa)]，父母都是猶太人。他最初肄業中學，後來因父親經濟困難，便不得已選習手工業，一八四〇年，到柏林習印刷，利用餘暇研究學問，到一八四六年末他已成爲有普通學問的人物。因爲他接受新共產主義思想之刺激，便往巴黎，後又轉往不魯塞，爲德國不魯塞報之印刷所職工。他由此認識馬克司，不過他雖然接受馬克司之一部份教義，但終竟是傾向於生產合作思想 (路易·布蘭克的思想) 之實行家。他富于思致，允執中庸，主張「修正派」的意見，他又是雄辯家，組織者，而且是很勇敢的戰士。一八四八年，他爲柏林，來布色，德勒斯登 (Dre-

den) 的工人中之最重要人物。一八四九年以後，他退出一切實際運動，在瑞士從事印刷業，合作社經營，和新聞記者，又在巴色 (Basel) 做法國文學教授，晚年著有四十八年回顧錄 (Erinnerungen eines Achtundvierzigers 一八九八) 一書。

波崙在一八四六年受共產主義的刺激，是由於一個裁縫工人曼特爾 (Christian Friedrich Mentel) 之指導，曼特爾為純粹的柏林人，在一八四〇年至一八四五年之間，奔走於西歐各都市從事工作，一八四六年，才返故鄉。曼特爾加入手工工會，祕密徵求能夠分任教義傳佈之同志，波崙說（見四十八年回顧錄三〇——三一頁）：「他正在潛心物色，努力想得獲祕密會議之會員，——由一個已入會的靴工名叫希自米耶爾 (Schuhmacher) 介紹我入他的祕密結社，他的傾向不屬於瑞士的縫工韋德靈，他努力主張第一步必要取得政治的自由，立於這一個基礎之上，於是從資本主義束縛中解放勞動階級的祕密的勞動同盟便成爲必要了。他的說話雖不免雜亂無章，但我們却可以得獲

他的根本思想，他的代表意見就是，我們考慮新時代的歷史之生長過程之時，不能像韋德靈一樣，以裁縫學徒的頭腦而捏造出來的新國家為問題，我們應當用心考慮的就是在其世界觀之中以為普通自由主義可能克服的中間階段，以歷史的必然性而發生一個政黨。我在上面的說話中便完全了解曼特爾了。『可惜曼特爾設立的團體，不久就被人告發，一八四六年末為官廳所解散，領導人物盡被逮捕，經過長期間審問的結果，曼特爾和希自米耶爾一派，于一八四七年六月，由柏林高等法庭宣告無罪，但另一部份則處以短期之監禁。(註)』

(註) *Vermuth und Stieber*, A. A. O. 第一卷，三六頁以下。

第五章 保守主義的社會改良

(1) 浪漫主義的性質

和民主主義的社會主義及馬克司主義的共產主義同時並起的為社會改良的精神運動，這種運動，以批評的態度對待自由主義，及以個人主義的自我利益為基礎的經濟組織，都取批評的態度。不過他的理想并不是共產主義，而祇是近代的中古秩序，或是一種社會的王政制度。這些擁護權威和傳統為基礎制度之人們，就是：神學家，貴族，公會中的領袖，浪漫主義的思想家和詩人，他們反對容許各個人有商業和經濟的判斷，蔑視教會，國家，和一般的事件，至于把互相從屬的共同生活及社會生活，變為利己主

義，令各個人可以自由隨意的管理這樣的思想，要求與乎經濟的情況，他們是反對的。他們以爲最新的現代真像亂雜無章，混沌而無次序的海市蜃樓，此外又有銳烈的社會敵對，極端的貧富懸隔，一切的虛無，智識力和經濟力之非道德化，無神主義的熱狂。在這種情境之中，他們相信唯有在教會，經濟，和社會生活上保存一定的秩序，保存他們的信仰，他們領域，是他們中世紀的修道院，會館 (Zunften) 和行會 (Gilden) 的時代，這些才是他們的安全建築物，在其中一切基督徒，據着他們的地位，在大地上下了很深的根基。用團體中一份子的名義，在共同的地土吸收他的養分，因而構成精良的有機體。此外他們又以爲國家或王政爲究極點，這是社會過程中經已堅固的基礎。這些思想家 and 詩人，面對着勞動階級的不平，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銳利批評的論調，和下層社會叛逆的社會騷亂。他們以爲這種現象，就是腐敗的徵兆，是經濟和政治的自由主義之放縱的不可避免之結果，他們反對自由主義的資本世界，指出勞動階級死裏逃生的方

法，他們主張要把社會建築於基督教，道德，共同，和權威的基礎之上，而這些實爲一切基督徒，倫理的經濟學者，和王政的政治家之任務。

具有這種保守傾向的，多是有名的著述家，法律學者，詩人，但卻沒有優等的經濟學家。因此他們便做不出何等統一的思想體系；他們大多數都反對亞當斯密和自由主義的經濟學說；或則反對壓迫一切自治團體的中央集權的國家；其中又有想把中世紀的日耳曼法和羅馬教會加以理想主義化，但卻熱烈地反對自由主義及猶太人（反對猶太主義）。其中想創出社會的保守主義經濟學的祇有二人：溫克布烈西（Karl Winkelblech 其假名爲馬羅 Mario）和羅德俾爾士（Karl Rodbertus）。他們對於實際政治，實無足稱道，但他們却具有優秀的頭腦和高尙的性格，馬羅在一八四八年職工大會中爲宣傳的活動，而羅德俾爾士却對於拉薩爾，和基督教的社會運動，却有多少影響。

(2) 馬羅——溫克布烈西

馬克司以進化的觀點研究西歐的社會，他以爲當時的人類歷史過去的階段是必然的，資本主義和個人無限制競爭的自由主義，並不是完全無理的，他以爲這是對於過去的一種進步，是現在強力的變革，是正在生長中之將來，——馬克司目注前途，目注于社會主義經濟階段之成長，但馬羅恰與此相反，他努力把日耳曼的中世法律，或層段組織的共同社會，爲以職業而團結的社會之基礎——自然要除去其中一切無用的部分和特權等，弊害——以順應於近代的社會情況。簡而言之，把職業自由改爲嚴格的工業秩序，把自由競爭改爲行會制度，把自由經濟的各個私人改爲以整個經濟生活及機械和產業同向于經濟共同社會之組織化。一方面牠不是自由主義，而他方面也不是共產主義，既沒有熱望支配國家權力和人民財富的資產階級，也沒有想在革命的怒潮之中，使一切

都歸于平等和粉碎的無產階級；既沒有集權的國家，也沒有官僚政治，在其中僅有自由生產的自治經濟和生活之共同社會。由此看來，馬羅理想實是近代的中世紀：即把整個的經濟生活爲行會組織化，工頭和工人一律平等，價格和工銀由工頭和工人聯合組織的委員會共同決定，以產業會議統轄原料之採辦和分配及定製，又由行會和公會代表成立社會議會，討論一般經濟的立法，議決後才交政治議會加以承諾。同時又有勞動部爲一切失業者分配職業，因爲凡有勞動意志的勞動者都應有工作權。雖然生產手段不能依羅馬法律之原義，還成爲私有的東西，而且私產是絕對無限制地聽憑有產者之專斷，不過無論如何，也應該照基督教和日耳曼法律之意義，把牠連結到共同社會去。但羅馬之主張也有和中世紀不同的地方，就是以民主主義的平等，廢棄一切特權。全國的總生產，須依國內之必要而適當分配。馬維自稱他的制度爲聯邦社會主義。他的社會制度是這樣：每一個生產團體都自主自治，相互立于聯絡之關係，而并不由于國家之集中指導。

馬羅（迦爾·温克布列西）一八一〇年生于巴敦（Baden）之英沙謨（Eusheim），在瑪堡（Marburg）和基森（Giessen）學化學，一八三六至一八三九年間在瑪堡爲化學講師，一八三九年轉任加塞爾（Cassel）高等工業學校的工業化學教授。一八三八及一八三九年當中，他曾住巴黎幾個月；一八四三年爲學術研究到北歐洲，參觀著名于時的摩東（Modum在挪威）製藍工廠，他雖然贊賞圍繞機械工場的田園之美麗，但他却借做工于其中的一個德國工人之口，敘述工場勞動者之貧困。他說：『我向來是以自然科學研究家的態度去觀察工廠，每每祇見機器而不見人，祇見人類的生產品而不見生產者的自身，所以我以爲科學就是形成現代化的文明之基礎。現在聽見住在貧困境界裏的一個外國工人之實話，令我明瞭一切科學之努力，都無價值，并且令我興起探求人類苦惱及其原因與乎施以治療之決志了。』（註）他是忠於這種決志的；他的愛心推及到德國手工業工人去。

〔註〕馬羅世界經濟之體系 (System der Weltwirtschaft) 的序文。第一卷第二部，Kassel 一八五七年版。

馬羅是國民經濟學者，他的長處在解剖從古代到一八五〇年的種種經濟體系。他不知道有馬克司的近代共產主義，又或者他雖然知道而却不肯接受，馬羅的原則是共同社會，而不是政治經濟的階級鬥爭。以爲勞動者祇能限止於社會問題之規範內。馬羅之社會觀念，是拋棄一切異教的原則而玄於基督教原則之上。組織要完成中世紀的一切道德制度，要保守着中世之光榮，而除去其黑暗之一面，保守着中世之浪漫主義而除去其野蠻。要以行會 (Zunft)，教會，及社會的結合和家族，形成全份子的利益和全體的利益一致之大協同組合，而這個大協同組合更分爲各小羣的協同組合。〔註〕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九年馬羅爲工人的精神指導者，這些事實到本章才討論罷。

〔註〕馬羅前書，八五八至八六〇頁。

(3) 羅德俾爾士

羅德俾爾士 (Karl Johann Rodbertus) 雖和馬羅及馬克司精神很為相似，但其不同的地方也自不少。羅氏和馬羅二氏都反對羅馬法，反對資本主義，反對以各個人為經濟本位之社會分裂。他們都以『共同社會』為人類社會之生命，又同把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分離。至于羅德俾爾士和馬克司之共通點，則為勞動價值說和資本集中之觀念。羅氏和馬羅不同之點，是羅德俾爾士無條件地放棄公會之裝飾 (Aufgalvanisierung der Innungln)，而主張國家和集權主義：他認國家為由現在的權威者以有利於勞動者而統制生產物之分配。

羅德俾爾士一八〇五年生于格利扶斯華爾德 (Greifswald)，父親是羅馬法教授。他畢業中學後，到哥德根 (Göttingen) 和柏林學法律，後為司法官，到一八二九年解

職。一八三二年到海德爾堡 (Herdelberg) 研究國民經濟學和古典文學。一八四二年開始為國民經濟學社會批評的著述。從一八四七到一八四八年他在聯邦議會之中得受顯職。其後他追隨卑士麥，發表很多論文，有四封寄奇爾茲曼之社會書簡 (Sozialen Briefe an Kirchanann)，一八六二到一八六四年他和拉薩爾結交，其後十年又和拉薩爾派之指導者哈仙格來非 (Hosencler) 結交，一八七二年以後羅德俾爾士對於卑士麥開始取批評的態度，歷舉他內政之失敗，又豫言對於社會問題之必然的失敗。羅德俾爾士晚年 (一八七四到一八七五年) 雖曾打算加入社會主義，(註) 但在 一八七五年十二月死了。

(註) 見羅德俾爾士之書簡和社會政策論文集 (Briefe und Sozialpol. Aufsätze)，三五二頁，米耶博士

(Dr. Rud Weyer) 所編纂，柏林一八八二年版。這本書是研究羅德俾爾士的人所必讀的。

羅德俾爾士以為現代的原動力，不在精神或意志，而在於生活之本體。其意義是說

人類社會不是由意志之力量而促進，而是由非合理的力量，即生活衝動而促進。社會生活之精神是共同的。舉例言之，言語和科學基於精神之共同；習慣和法律基於意志之共同；勞動和經濟基於現存物質的力量之共同。這並不是個人，不是私有財產，不是人格自由，而是精神和物質的財貨之人類共同社會的精神。個人自由和自由主義祇有消極的意義：即自由是從破壞不完的共產主義形態，而導向于新的比較完成的共產主義形態。人類社會是向着共同經濟而進展，從氏族而進向國家，最後更進向於人類社會之統一組織——向着未來社會而進展。現代個人自由的經濟活動，正在發生矛盾：少數人之財富日益增加，勞動階級之貧困則日益加甚，這是因為勞動者不能支配經濟生活，而却由所有者加以支配之緣故。利己主義佔高位；所謂競爭並不是引導最善的人類之幸福，而是引導投機者之暴亂。而資本則統一于國家之內，儼然一個國家的社會；職工和工銀勞動者陷于貧乏之中。貧困之災害重加以循環的經濟恐慌之災害，虐待一切窮人，甚至一方

面把日益增大的生產力之全利益歸于資本家，而他方面則勞動階級按照「工銀鐵則」僅僅得獲飢餓生活所必不可缺的生活手段最低限額之工銀。這是現代社會組織的缺點。國內市場之消費力依然缺乏，而商品之數量則積極增加，這是社會上之根本社會問題。因此剩餘之財貨，要向國外輸出，而各國向外開拓之衝動因之而起，然而因為新市場之開拓，便耽擱了社會問題之解決，經濟的衰沈暫時為之避免。殖民政策也有這樣的作
用：歐洲暫時可以寬和一時，而社會問題也延期下去。但是這種延期作用究竟不能停止：現代之社會問題要加以解決呢，還是社會之解體呢。

解決之方法是什麼？

羅德俾爾士——依他全般的見解——雖然以共產主義為解決之方法，但他以為這個目標要在很遠的將來才能達到。按照他之主張，社會問題之所以發生，是在于經濟日益增大的生產力，和市面消沈或勞動階級之購買力的相對減少，兩者間之不調和大大發

生，所以解決的方法，必要使勞動者參與這日益增大的生產。倘若國家顧慮到這一點，便應該以下述的一種計劃為基本：

各種商品應按其本身所含的標準勞動時間來計算。以標準勞動時間來決定生產物之價值，因為勞動是價值源泉之尺度。生產物之分配，有一定的比例：以價值百分之三十給勞動者（工銀），三十給資本家（利潤），三十給地主（地租），而以其餘之十分給國家（租稅）。這種分配之比例一經確立，則勞動者便得均沾日益增加的生產力之利益，而全社會也必然地向上；階級的敵對緩和了，社會的衝突也平定了。假定一八七〇年之生產物價值總額為一萬萬，則從事生產的勞動者得三千萬之價值。而且勞動生產力在三十年後——即使勞動時間相等——高到兩倍，那時的勞動者便得六千萬之價值了。現時定為一般本位貨幣的金屬貨幣一概廢掉，改用勞動時間之紙幣，如此便會彼此之時間互相交換。國家對於勞動，資本和土地生產物之分配關係，都該施以維持及監督。

然而羅德俾爾士也有忽略的地方，他不曉得生產手段如在私人資本家之手，則分配也就必然成爲私人資本主義。他又不曉得國家不是實際的支配者，而最強有力之經濟所有者——現在的資本家——才是支配者。對於國家他既不懂得什麼，即對於勞動他也不懂得什麼：因爲他教訓勞動者繼續保存一切資本和土地之所生產，（註）但却不教訓勞動者設立工會和合作社，或爲工場法之要求；他反對勞動階級之獨立的政策。直到晚年他纔承認勞動者的社會主義政策。

（註）羅德俾爾士說過，「勞動，資本和土地之社會經濟的階級分立，必須保持，而祇當施行專爲勞動生產物分配的救濟方策。」（見其書簡和社會政策論文集一一〇頁。）

馬克司，馬羅，和羅德俾爾士三人之傾向十分不同。而在一八六〇到一九二〇年之間，德奧二國之社會政策影響所及之一切著述家和運動，都受他們的論理所支配：例如社會民主黨的拉薩爾，考茨基，和倍倍爾；舊教社會黨的會督克德拉（Bischof Kette-

ler)，摩方(Moufang)，科格爾先(Vogelsang)，星格士(Schings)希茲(Hitze)，羅馬教社會黨保守主義的華格爾(Herman Wagener)，米耶(Rudolf Meyer)；講壇社會主義的華格拿爾(Wagner)，孫堡(Schonberg)和瑞摩拉(Schmoller)等教授；新教社會黨的都德牧師(Pastor Todt)和宮庭說教師斯忒杜克爾(Holfprediger Stöcker)。以上各派除社會民主黨及其代表之外，其運動和代表的言論，都帶有「反猶太族」的色彩。

現在最負盛名的國家社會主義，便是這種思想傾向之旁系。但我們却有應當注意之點，就是羅馬和羅德俾爾士二人都不是反閃米特族的。(註)我們關於國內外的種種基督教社會運動(如英之梅利斯 Mourice 和京斯賈 Kingsley，比利時和法國之白朗 Perin 和德曼 De Mun)不再詳述，因為這些運動與其說是社會主義之贊助，無寧說是社會主義之障礙罷。

(註)羅德俾爾士反對米耶之反閃米特族主義(即反猶太主義)的解釋如下，他說「爲什麼要令猶太人憤

怒而不愉快呢？這大概因爲猶太人是保守黨之指導者(如 *See*)，在現在之英國如是(如 *Dralet*)

即在長期間之法國也是(如 *Fould*)罷。」羅德俾爾士之書簡及社會政策論文集，一二九頁。

第六章 第二次的德國革命（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

（1）政治的經過

第一次的德國革命（一五一六——一五三六年），雖也含有統一德國的運動和共產主義的思想，但其主要的理論是農民革命（見本書第三卷）。其結果則為部分的宗教改革與乎諸侯和貴族之勝利。在本章所述的第二次德國革命（一八四八——四九年）則社會改良的理想雖然也佔一個次要的脚色，而為主的却是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和民族革命。現就第二次的德國革命之政治經過簡單說說：當時最重要的聯邦國家為奧普二國，其中的資產階級由一八三〇年以來，已非常排斥專制主義和民族的分立，并且確立自由

主義和統一德國之努力。而各疆細小聯邦國——特別是德意志南部各邦——尤爲激烈。政府遇着了財政之危機，于是資產階級對於諸侯政治的要求便更爲強硬，一八四七年之末，這種情勢已成爲反政府的運動，當巴黎的二月革命報告到德國去，全國便像暴風雨一般地暴發起來：三月十三日維也納暴動；三月十八日柏林暴動；至于各聯邦小國在三月之末便已經動搖了。諸侯和貴族首先爲暴動所屈服；逃亡于國外，或低頭於革命暴羣之前請命，不過對於曾經提出社會政策的要求之勞動階級雖懷着恐怖，但資產階級之革命却不久便平靜了。在柏林則資產階級的大臣根據憲法而要完成資產階級與貴族聯合的政府，因此便和國王開始談判。在維也納則資本家希望回復王室之統治，使他們的實業生活重歸于安寧和秩序。德國按照普通選舉所選出的國民議會，于五月十八日會於佛琅克福特（Frankfurt）之聖保羅教堂，但祇有論爭，并無結果，牠並沒有給德國國民的主權以鞏固的基礎。他們又反對一切社會政策的思想。在這個期間，諸侯從革命的恐慌

回復其原有之理智，曉得一八四八年六月之末的巴黎無產階級失敗的消息，便大舉反動，準備恢復舊日之狀態。十月，反動的軍隊向維也納進兵，十月三十日三十一日和十一月一日便施行攻擊。陷維也納。九月之後烏蘭格 (Wrangel) 將軍解散普魯士議會。一八四九年三月奧大利完全恢復舊態。三月末佛琅克福特國民議會把德國王冠奉於普魯士王，并起草所謂德國國民經已同情的自由主義之帝國憲法。但仍為普魯士王所拒絕；德國國民雖然採用佛琅克福特憲法，但政府却解散國民議會。佛琅克福特派之右翼脫離國會；而左翼則把殘破之議會移於司徒嘉德 (Stuttgart)。帝國憲法之禁止，雖引起德勒士登 (Dresden) 的五月暴動，和巴敦 (Baden) 及巴以利 (Baierischen) 的帝國憲法運動，然而這種騷動與一八四九年七月二十三日拉斯達脫 (Rastatt) 在加利斯路 (Karlsruhe) 的南方) 之陷落，同時告終。普魯士軍隊鎮壓各處之暴動。

德國第二次革命于是便完畢了。勝利終歸於諸侯和貴族。不過失敗者仍操持經濟的

權力，所以勝利者便不能不和失敗者妥協起來。所謂妥協便是令國王和貴族執行一七四八年之約章，但若就一八四八年的精神來完成其事業，則本質上便是不應當的了。五十年間繼續着的異常努力，結果僅做成斷片的事業，而在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間，便連斷片的事業也毀壞了。這可見若不由理智和意志而起的努力，而徒然依靠英雄氣概的人物爲領導，必會使階級和階級鬥爭之發展容易走入歧路並且容易被人制服的。

(2) 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之社會潮流

德國革命時代，有許多帶着社會民主主義臭味的雜誌出現。『社會民主主義』(Sozialdemokratie) 這個名詞已在這種出版物中屢屢應用。這些雜誌之值得稱述者如下：由馬克司，昂格斯，和爾夫 (Wilhelm Wolff)，伏來格拉脫 (Freiligrath) 等所編的哥倫新萊因報；朱利斯 (G. Julius) 之柏林新聞；瑞力福爾 (Gustav Adolf Schloffel)

(註)的柏林之人民之友 (Volksfreund)；波崙 (Born) 的柏林之民衆 (Das Volk)；波崙和蘇文尼格爾 (Schweninger) 等的柏林及來布色之友誼報 (Verbrüderung)；韋德靈的柏林之初選者 (Wrwahler)；伯靈德 (F. Behrend) 的布勒斯勞之飛行報 (Fliegende Blätter)；和在加塞爾 (Kassel) 的熊蜂 (Die Hornisse)。此外還有和勞動者俱樂部組織有關係的各種勞動組合機關報也次第出現。

(註)瑞力福爾雖是西利亞 (Schlesien) 一個資本家的兒子，但爲參加巴敦的帝國憲法運動，和摩爾 (Josef Moll) 同在一八四九年七月十九日戰死沙場。

一切商工業者的希望都混在一般混亂情況之中，但可以分出兩個不同的傾向。一個以馬羅爲代表，想再把經濟放在同業組合的基礎之上；別一個則以波崙代表，認資本和勞動間兩階級互相對立，所以便希望成立勞動組織和得獲國家補助的生產協作社。在馬羅陣營之內是手工業者，而工場勞動者及其他無產階級則歸附于波崙。

這兩種戰綫之力量可從下面統計而得明瞭：一八四六年在普魯士有四十五萬七千手工業的領袖工匠，又有三十八萬五千小工和學徒。至于工場則有七萬九千個，共使用五十五萬一千勞動者。若更連奧德各國，則在兩種戰綫間數字的關係上，手工業經營，便更爲優勝了。

手工匠的心理，必趨向于同業組合制度而反對工業的自由，但其中也有些人感覺着近代經濟生活之必然，以爲不能簡單地復歸於中世紀，而行會制度有改革之必要。馬羅教授以加塞爾民衆大會代表資格出席於漢堡的手工匠會議（一八四八年六月上旬）和佛琅克福特的手工匠會議（由七月十五至八月十五日），他給這些會議以很強的影響，他是和上述的心理傾向相投的。佛琅克福特會議是正式大會，與議者凡百十六名，負有起草工業制度，和草成解決社會問題的計劃之任務。當時的小工雖派遣議員，而大會却不予承認；後來他們提出抗議，大會才允許十個小工代表入場，但祇有發言權而無表決

權。小工拒絕大會之決議。他們另行召集大會於佛琅克福特，和領袖工匠大會同時開會，馬羅提議工匠們要以近代化之行會工業制度代替工業自由，并要求同業組合之聯合，工業委員會和工業議會之設立，和社會的議會之創設。

佛琅克福特手工業領袖工匠大會協議之結果，是概括於呈遞給國民議會的國民經濟委員會之請願書內的。國民議會和具有同樣自由主義臭味的經濟委員會，對於他們的請願，自然加以拒絕。

同時受有馬羅影響的小工大會，要求同業組合制度之近代化，這種全新的組合制度和以前全然不同，牠適應於現代的產業關係，認一切生產者有平等的權利，其中包含社會一切職業的同業組織的憲法（即勞動組織的憲法），和工業委員會工業議會勞動部之設置。此外更要求普通選舉權，一般的義務教育，職業學校，十二時勞動制（用膳及休息時間也算在內），法律上最低的工資，傷病者之保險基金，累進的財產稅和所得

稅，精製工業品輸入的保護稅，皇室所有地之剖分，農業勞動和小農之工銀和給與，移殖過剩人口殖民地之設置。

當時最利害的爲人口過剩之恐怖，即馬羅也抱這種杞憂，他主張採用限制貧困者結婚，以爲制限急速增加人口之手段。（註）

（註）小工大會決議，收錄於 *Biermanns Lebensbeschreibung von K. G. Winkelblech* 第二卷之附錄，

來布色一九〇九年版。

此外又有一種意見盛行於工業活動中心的大都市。三月革命勃發後，已徧傳資本和勞動階級對立之聲浪。三月二十三日的柏林報已說「我國也和法英二國一樣，資產階級和勞動階級之分裂確已經完成了。」波崙所編輯的民衆創刊號（一八四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宣言說，「民衆這句話自然是包括全世界的人口在內，不過本雜誌所主要代表的是國家內的一定階級，即備受壓迫，由工銀而得麵包的勞動階級。」勞動者因爲有集合生

活所以便更加增大他們的力量而積極進行；其後不久便發生很多勞動組織，而在波崙指導之下，以政治，和協同組合來組織全德國勞動階級爲目的的一般『勞動同盟』也成立了。其機關雜誌友誼報，即于一八四八到一八四九年之間，發行於來布色，而以波崙爲總編輯。他在這個雜誌上發揮他的思想，他以爲徒然考察經已完成的『烏託邦』，并且用哲學的妄想來構成理想國家，並不是重要的工作，我們最重要的問題是如何發展階級鬥爭，他的目標便是『生產手段之共同利用』（一八四八年第十號，一八四九年年第十六，六十七號）。『但凡經已完成的東西，都是有反動的作用，而生命和進步，祇存於運動和發展過程之中。』（第一號）

勞動同盟最著名的會集，是柏林勞動者大會（一八四八年八月下旬）；大會是由德國之大都市柏林（Berlin）布勒斯勞（Breslau），丹澤（Danzig），德勒士登（Dresden），漢堡（Hamburg），哥尼斯堡（Königsberg），來布色（Leipzig），彌森（Meissen），

各地的四十個代議員構成的；佛琅克福特的小工大會也派出議員一名。會議議長爲布勒斯勞的老教授伊新壁克（Nees von Esenbeck, 一七七六——一八五八）；（註）副議長爲波崙；書記長是當時頗有名望的柏林輕金業工人比斯基（L. Bisky）。大會決議以下各種問題：德國勞動階級的政治的，勞動公會的，和協作社的組織；爲維持生產協作社而設立信託銀行；勞作權；國家和地方自治團體的平等普選權；減縮兵役爲一年；婚約上財產證明之廢止；間接稅之廢止；十時間標準勞動之確立；學徒數目之限制；十四歲以下童工之禁止；一般的義務教育；爲學徒設立之義務職業教育；工場及辦事處職員之選權及任命，必須有勞動者參加。

（註）伊新壁克之生平，見 Biermann K. G. *Winkelblech* 第二卷，二五二頁以下。

由勞動同盟而組織之『友誼社』（其機關報即名友誼）的指導者爲崙波；比斯基和建築工人瑞溫尼格（Schweninger）。他們召集會議和大會，指導宣傳，（註）又和馬克

司和爾夫及沙普爾等聯絡，因而各方面更發展活潑的運動，但一般上因為革命的失敗，所以友誼社之生命也斷絕了。

（註）在宣傳之中有一件最可注目的事情，就是在二一八四八年一月之末的海德堡（Heidelberg）地方，波雷

和馬羅公開辯論，結果是波雷占得完全勝利。

（3）共產主義同盟之終局

革命爆發後，大多數同盟員都到德國，以共產主義者之資格參加鬥爭。他們到處都表現他們的勇氣，表現出他們有指導出版物集會，和巷戰的能力。但是他們沒有直接主張勞動階級革命，因為馬克司承認當時的德國社會狀態尚未成熟的緣故。馬克司昂格斯伏來格拉脫和爾夫及威爾夫等，都在德國，領導着革命的機關報新萊因新聞而活動。波雷也在柏林和來布色活動；他更立於德勒士登暴動（二一八四九年五月）之前線，指揮巷

戰，當其伴侶向佛來堡 (Freiberg) 退却之時候還指揮作戰。昂格斯維爾茲 (Willich) 及摩爾等，則參加于巴敦帝國憲法運動；沙普爾又在威爾斯堡 (Wiesburg) 活動；此外還有許多人在各地方投身爲鬥爭的組織者。革命失敗之後許多人逃回倫敦，在那裏再組織同盟，以爲國際社會主義和革命運動之中心。當時英國之憲章運動派，法國之勃蘭期派，社會革命的波蘭人匈牙利人等，都參加于這個同盟。直至一八五〇年爲止，大多數人都望革命再起，並且爲着這個時期而準備。但到一八五〇年夏末，馬克司和昂格斯確信他們的期望是錯誤的，因爲勞動階級若要令其社會革命的任務有若干的成熟，便不能再做五十年教育和組織的事業。不過這個見解，是爲一般狂熱的共產主義者如維爾茲和沙普爾等所不能接受的。因爲這樣，內部便分裂不和，馬克司把同盟本部移于哥倫，並且在一八五〇年十二月一日在哥倫改正了同盟規約。同盟之主要目的，在于「以宣傳和政治鬥爭的一切手段，實行破壞舊社會，令勞動階級的精神上，政治上，和經濟上都

得解放，并且完成勞動階級之革命。同盟在勞動階級鬥爭所不能不經過的各種發展階級之中，當代表着全個運動的利益，努力結合一切勞動階級革命的勢力；在勞動階級革命尚未達到目的之前，同盟的祕密結社不能解散。」

關於在德國之宣傳，本來由哥倫發縱指導。一八五一年五月十日哥倫之同盟差遣員諾夫中（Nothjung 裁縫工人）在來布色被捕，搜出了同盟之文書簿籍，因此便逮捕多數黨員，于是而有一八五二年十一月的哥倫共產黨事件，因為這一宗事件，同盟便消滅了。（註）

（註）參看 *Marr. Enthüllungen über den Kölner Kommunistenprozess* 麥羅編纂，一九一四年，進步雜誌（Vorwärts）版。

第七章 一八五〇年至一八八〇年之經濟及政治

(1) 自由主義時代

一八四八到一八四九年的民衆暴動失敗後，反革命運動便風起雲湧。在法國自拿破崙三世即位後，便呈現對外政策的企圖（例如克里米亞之戰役，意大利之戰役，和墨西哥之遠征），和壓伏無產階級，因而得獲資產階級之援助；在英國，則勞動階級捨棄階級鬥爭之思想，而追隨于自由黨之後面；在普魯士，自一八四九年實施三級選舉制之後，禁止出版物，所謂國家學，便由改宗基督教的猶太人士他爾(E. J. Stahl)所利用，而引入於國權，王政，和基督教的傾向；在奧國，因得俄皇尼古拉司一世之援助，打败匈

牙利，由是而恢復了三月革命以前之德意志同盟。反動的時代，大約在十年之間（一八四九——五九年）都非常是有勢力，但在一八五〇年以來的強力的資本主義和民族的發展，便開始打破了反動勢力之防禦綫。當時在加利福尼亞（California）和澳洲發見金礦，在墨西哥發見銀鑛，鐵路建築，電報，輪船，冶金業，和工廠組織之擴張，銀行和交易所之發達，自然科學之進步：——如化學，物理學（電氣），及生物學（達爾文），此外則意，德，波，匈，各國的民族運動同時勃興，令歐洲西部和中部的社會政治的生活非常活躍；便連最反動之俄國也表現自由主義和社會改良主義的傾向。而且克里米亞（Crimea）一役（一八五四——五五年），俄羅斯敗，而意大利之役（一八五九年）奧大利敗，于是歐洲反動的主要支持者都已失敗了。所以由一八六〇年至一八七〇年實在已經算入自由主義之時代。在英國則彌勒約翰（John S. Mill）和格蘭斯頓（Gladstone）得政治上的勝利；在美洲合衆國則爲國家之統一并由奴隸解放而發生內亂（一八六一到一

八六五年），到底也由自由主義的林肯得獲勝利；在法國因中產階級和共和主義的反對派勢力增加，至搖動拿破崙三世之王位；在普魯士則有自由主義的中產階級組織國民同盟以反對卑士麥，而卑士麥也究竟因對內政策和對奧之戰爭政策（一八六六）便不能不採用自由主義的政策（一八六七年）；在俄羅斯，一八六一年着手農奴解放，因而屢進屢退的革命時代開始了；即在東方之日本也打破了中世紀的閉關政策而入於啓蒙時代，和近世的經濟時代了。

在這十年之中（一八五九到一八六九年）我們得了很多的東西：例如馬克司和達爾文之主要著作，蘇彝士運河之開鑿，北美黑奴政治之解放，俄國革命之開端，由一八六六年戰爭結果而起的德意志同盟之解體，普魯士（德意志北部）則廢止集會結社之禁止及普選選舉權之承認，英吉利都市勞動者得獲選舉權，德意的民族統一又開始成立，此外更有日本之覺醒——在這十年之間，給歐洲大陸的勞動階級，以階級的結合，因而開始發

生新經濟制度之鬥爭和最初的民族及國際之企圖。

(2) 帝國主義與社會主義之變遷

從一八六九到一八七九年這十年間實爲自由主義的完成時代。普國對法得獲勝利（一八七〇——七一年）；工業，商業，交通，金融，等新事業陸續設立，或爲近代之工業化；而農業則因爲美洲之競爭而衰退；工場商品又發生相對的生產過剩，于是便做成慢性的經濟和政治的恐慌，不過其間却間以短期之繁榮，便令有多少之間斷罷了。然而這種恐慌，直到九十年時代仍還繼續，由是而引生帝國主義之時代——即尋求海外市場，把非洲和亞洲等『非資本主義』國家加以分割的時代。然在同一時間也是西歐和中國社會主義運動復活的主要時代之一。在七十代之末，歐洲的自由主義之光輝，已經沒落，牠已不能不趨于變革之急流。下列之統計，一部份是專門家的計算，一部份則根據

官廳發表之數字，我們把這些統計仔細觀察，便可以知道由一八五〇年至一八八〇年間變革之基礎趨勢了。

蒸汽力（鐵路，輪船，製造廠）之應用（以馬力計算）

	一八五〇年	一八八〇年
英	一、二九〇、〇〇〇	七、六〇〇、〇〇〇
法	三七〇、〇〇〇	三、〇七〇、〇〇〇
德	二六〇、〇〇〇	五、一二〇、〇〇〇
俄	二〇、〇〇〇	一、七四〇、〇〇〇
奧	一〇〇、〇〇〇	一、五六〇、〇〇〇
歐洲各國合計	二、二四〇、〇〇〇	二二、〇〇〇、〇〇〇
美洲合衆國	一、六八〇、〇〇〇	一四、四〇〇、〇〇〇

鐵之出產額(以噸計)

	一八五〇年	一八八〇年
英	二、二五〇、〇〇〇	七、七八〇、〇〇〇
法	五七〇、〇〇〇	一、七三〇、〇〇〇
德	四〇二、〇〇〇	二、七八〇、〇〇〇
美	五六〇、〇〇〇	三、八四〇、〇〇〇
世界合計	四、四二二、〇〇〇	一八、一四〇、〇〇〇

鋼鐵出產的每年平均額(以噸計)

一八五〇至
一八六〇年

一八八〇至
一八八九年

	英	法	德	美	其他各國	合計
一八五〇年	二、六〇〇、〇〇〇	八〇〇、〇〇〇	一、三〇〇、〇〇〇	七〇〇、〇〇〇	七〇〇、〇〇〇	六、一〇〇、〇〇〇
一八八〇年	二五、一〇〇、〇〇〇	三、八〇〇、〇〇〇	一二、〇〇〇、〇〇〇	二一、〇〇〇、〇〇〇	六、〇〇〇、〇〇〇	六八、〇〇〇、〇〇〇
英	四九、〇〇〇、〇〇〇					
法		四四〇、〇〇〇				

煤炭出產額(以噸計)

德	六、七〇〇、〇〇〇	五九、一〇〇、〇〇〇
美	八、〇〇〇、〇〇〇	七〇、五〇〇、〇〇〇
世界全生產	八一、四〇〇、〇〇〇	三四〇、〇〇〇、〇〇〇

工場商品(包含紡績，金屬，衣類，飲料，皮革，及各種雜貨)(以百萬 Pound

Sterling計)(註1)

英	一八四〇年	一八八八年
法	三八七	八三〇
德	二六四	一四八五
德	一五〇	五八二
美	九六	一、四四三

歐羅巴之人口(大概之數目)

一四八〇年

一七八〇年

一八八〇年

四六、七〇〇、〇〇〇

一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三二五、〇〇〇、〇〇〇(註二)

(註一) 1 pound Sterling 等于二十金馬克。

(註二) 上面的統計取材于 *Nutthalls Dictionary of Statistics*, 一八九九年版。

一八五七年倫敦開博覽會，一八五五年巴黎開博覽會，其後一八六二年的倫敦，一八六七年的巴黎，和一八七三年的費拉德費亞(Philadelphia 在美國——譯註)，連續開幾次世界博覽會，這都表示產業之莫大的進步。

其間更應注意的是人口增加。在人類史上，人口增加，從沒有像十九世紀那樣急速的。這當然是自然科學(機械學，熱，電氣，化學)之進步，對於交通技術以及工業

和農業之應用，而獲得較好的衛生方法和簡易生活之可能的結果。同時人口增加，必有利于一般的都市。工商業之中心地有無限人材羣集，思想之交換非常容易，因此便促進資本主義產業的發達，同時又需要購買產品之人類，于是一方面抬高了社會層，而他方面又把別一種階級推落於深淵之下，在變轉迅速的社會生活中，必然地發生極大之困苦。在這個時候當中，大眾以進步，發達，運動，變革，為口號。而黑智爾，達爾文，馬克司便成偉大精神思想運動之標幟。所以人類思想，在中世紀是宗教的，在近世之初是數學和機械的，而在最近世則逐漸傾向於生物學和社會問題。系統地說，宗教，機械，有機體，或是上帝，自然，人類和社會生活，就是基督紀元第四世紀以來，歐洲人類史中主要標題之次序了。

第八章 第一國際時代

(1) 拉薩爾與德國勞動總同盟

獨立的勞動運動之最初發現，實從接受一八四八到一八四九年的社會思想影響之米布色起。勞動份子不滿意于自由主義的教育運動，熱心要求獨立政策，于是在一八六二年開一個普通勞動大會，並成立中央委員會。拉薩爾在這個時候，向柏林勞動者爲『勞動階級思想和現在歷史時期之特別關係』(Über den bes. andern Zusammenhang der gezornartigen Geschichtsperiode mit der Idee des Arbeiterstandes) 一題之演講，講演之後，勞動者爭先與拉薩爾談辯，因此拉薩爾又發表公開之答辯 (Offenes

Antwortschreiben) 書中歷舉勞動者之任務，例如組織獨立的勞動政黨，為取得普通選普權而戰鬥，凡由自由主義者所提出的方法對於勞動者絕無用處，換言之工銀勞動制若仍存續，則勞動者斷不能從貧困中逃出，因為工銀鐵則使一切改良計劃盡歸無效之緣故，此外又要求由國家補助而成立生產協作社。

德國社會民主主義之創始者為拉薩爾 (Ferdinand Lassalle 一八一五——一八六四年)，生于布勒士勞的猶太商人之家。他畢業中學後，即入來布色商業學校，後來因不願經商，退學轉入柏林大學，研究哲學和古代語言學。拉薩爾有異常的精力，偉大的實行力，和極熱情的氣質，超羣出衆。自然他抱着社會主義之堅強信念，但仍乘有德國派的國家思想，而渴求獨裁者的地位。假使他生在英法二國，必會做成像德士列里 (Disraeli) 或甘必他 (Gambetta) 那樣偉大有名之政治家；不幸生在普魯士，所以他便祇能成爲一個屢受迫害的社會主義煽動家，和智識階級及政治的冒險家而已。在今日看

來，他的演說和著作，雖然有狠多成分，已成陳舊，不過還有很強烈的煽動效果。拉薩爾易得他人之驚歎，却難得他人之信賴。知識極其豐富，但他的性格不足以匹配他之豐富的知識。他沒有殉道者之人格而却具有成功者之性質。他的精神上極受馬克司之影響，而其世界觀却始終是觀念論和國家主義的。他終竟是一個舊式黑智爾派的信徒，所以總相信物質和歷史各種現象祇是上帝展開之表現，而且也相信靈魂之不滅。他狼想和馬克司結成知識上之友誼，但却生不出親切的關係。他和羅德俾爾士，和荷坡特（Alexander Von Humboldt），及其他普魯士的學者結交。卑斯麥也會祕密地和他會見，討論當時之政局。他的戲曲息京（Franz von Sickingen）實為德國統一運動之先驅作品。

來布色之中央委員會因拉薩爾之努力，便在一八六三年成立『德國勞動總同盟』，而以拉薩爾為會長，會員凡四千名。繼拉氏之後者，為法律家及政治家瑞威埃沙（J. B.

Schweitzer)。瑞氏後來和馬克司的黨徒李卜克內西 (Wilhelm Liebknecht 一八二六——一九〇〇年) 及倍倍爾 (August Bebel) 相衝突。衝突之原因，據拉薩爾所說，大概因為瑞氏主張勞動同盟的發展祇當以普魯士和德意志之內部為限，而反對擴張於大德意志的和民主的及國際的主張。李卜克內西及倍倍爾在以後數年常和拉薩爾派相爭，直至一八六九年便在埃新納茲 (Eisnache)，另立黨派，而成所謂『埃新納茲派』 (Eisnacher) (註)，這一派和一八六一年在倫敦所創立的國際勞動同盟之精神相適合。當德法開始戰爭之時候，兩派各取不同的態度。在北德意志的議會，拉薩爾派的議員瑞威埃沙，法拉茲 (Fortsache) 和孟德 (Mende) 等贊成戰時公債，而愛新納茲派的李卜克內西和倍倍爾却不肯投票。到綏丹 (Sedan) 陷落及德國之合併政策開始之時，這兩個社會黨的議員便一同反對戰時公債。倍倍爾和李卜克內西竟因反對戰爭及參加于『第一國際』之原故，被逮於公庭，定監禁之處分，惟第三個被告者荷布拿 (Adolf Hepner) 則

宣告無罪。

〔註〕埃新納茲派隸屬於「全德國社會民主主義勞動同盟」之下，其綱領由約翰布加爾（Johann Philipp Becker）起草，刊登于 *Vorbote* 報之上，這是值得注目的。牠的思想出發點是「祇有勞動公會才能給勞動同盟和將來社會以一般正常的理想，而且祇有牠才能將其中有力量的專門知識利用於真正社會科學的堅固基礎之上。」換言之，即勞動政黨之要素，原來就是階級鬥爭和為未來社會準備的經濟組織而已。

（2）第一國際之成立及經過

由一八六一年到一八六四年，德英法三國之勞動運動重新恢復。一八六二年法國勞動代表，到倫敦參觀世界博覽會，因此便和英國勞動運動指導者相連結，而英法二國之勞動者對於一八六一年之波蘭叛亂，又共表同情；英之勞動者選舉權運動，也同時開始

——這些一切事情，就引生一八六四年九月下旬的倫敦國際勞動同盟（International Arbeiter-Assoziation 簡稱為 I. A. A.）之創立。爲慶祝其創立和鞏固起見，在九月二十八夜，大開會議，英法、意德等國之勞動團體都派代表出席。德國勞動者的精神指導者馬克司也出席于其中。他起草同盟的宣言（就職演說——註）和規約。宣言的根本思想如下所述：組織勞動階級爲獨立的政黨，勞動保護法及工場法之擴張，對於陰謀迫害人民的外交應爲不斷之反抗，萬國勞動者之結合，階級支配之廢止，勞動階級之經濟的解放。國際勞動同盟本部，設在倫敦，由英國勞動指導者和馬克司合組總務委員會以指導一切。這個團體並不是羣衆運動而僅是集合最活動的勞動指導者和勞動者的一個小團體而已；牠實在是關於勞動運動的戰術和目的之引導和決定的統一觀念之一種研究機關。可惜當時的馬克司派和蒲魯東派及巴枯寧（Bakunin）派，正處於互相抗爭之地位，所以上述的任務便沒有完成。國際勞動開過五次大會，但在這些大會之中當爲重要的問題而

討論的，是勞動者之保護，協作社，勞動公會，戰爭，和土地改革等問題而已。一八六六年之大會開於日內瓦（Geneva）。一八六七年在洛桑（Lausanne），一八六八年在不魯塞（Brussel），一八六九年在巴色（Basel）。直到一八六七年，蒲魯東派都佔優勢；但自一八六七年到一八六九年則馬克司派佔優勢了：于是土地和交通手段社會化之決議被大會所採用了。到一八六八年，俄國革命家巴枯寧（一八一四——一八七六年）加盟於國際勞動同盟，不久便和馬克司意見衝突，巴枯寧在國際勞動同盟之內部，却暗地祕密組織為同盟所否認的國際聯合（Alliance International）。因為有這種情形，所以在一八七二年的赫谷（Hague）大會，便令國際勞動同盟發生分裂。其後國際勞動同盟本部雖遷于紐約，但到一八七六年便消滅了。

（註）見考茨基之新編本，*Vorwort* 雜誌社出版，一九二一年。

國際勞動同盟對於公會實有狠多貢獻，同時又準備了馬克司主義之勝利。

馬克司派和蒲魯東及巴枯寧派之鬥爭，更因為雙方的各種誤解，便令其關於主要之論爭，由許多個人的抗爭而變成淆亂，後人便不容易明白爭論之中心點了。不過從基礎上說，兩派同傾向于共產主義，但馬克司派則以勞動組合運動，議會行動，和國家權力之奪取，為到達共產主義終極目的之手段；而巴枯寧派和受蒲魯東影響的分子之主張却恰相反對，牠們以反議會主義及反軍國主義的工團主義為最良好之戰術。由巴枯寧哥老謨（Guillaume）和軒士（Hins）等所指導之工團主義，是從自由主義的社會學說發生，牠承認個人擁有至高權威，而國家與一切權威的集中行動都為罪惡；牠們祇有一點與自由主義的學說不同……即對於把個人財產變為共同經濟——即自治活動集團之相互扶助，這一個條款。馬克司派見解則截然不同，以為人類是由其社會的發展階段而被規定的，所以祇能在其國家形態或經濟形態的內部活動。一方面巴枯寧派和受蒲魯東派影響的份子，極力主張個人自由：即自治團體內部之份子有自由活動的創造；而在他方

面，則馬克司極力爲如下之主張：因爲階級鬥爭之原故而把勞動階級組成政黨和勞動組合，國家政權之奪取，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勞動階級之獨裁，共產主義實現時之國家的消滅，使之變爲協作組織的社會民主主義之統治。固然馬克司也和蒲魯東及巴枯甯一樣，并不信賴國家而保存之；他們都曉得所謂國家祇是對抗無產者而維持私有財產的強制組織。不過其中也有不同之點，馬克司信國家是個人私有財產之產物，必要個人私有財產廢止之後國家方才消滅；而蒲魯東及巴枯甯則以爲國家妨害一切社會的變革，其本體本來是壞的，所以要立刻廢止；巴枯甯更相信廢止國家之最好手段，實爲祕密陰謀和革命暴動。

在「第一國際」的歷史之中，其最有意義的事件實爲巴黎公社之鬥爭（一八七一年）。

(3) 巴黎公社

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 (Parisr Kommune) 之發生，可以歸納到三種重要的事實：

- (1) 由妨礙德國民族統一的法國傳統政策而起的德法戰爭；
- (2) 巴黎市曾在法國大革命之時佔過重要的地位；
- (3) 『第一國際』及一般社會改造思想對於巴黎和各都市之普及。

普魯士之戰勝 (一八六四年，一八六六年)，北部德意志同盟之成立 (一八六七年)，及南德意志之附入 (一八六八年) 等事實；已準備了法國外交之危機。及西班牙王位讓於霍罕蘇侖史格馬林根 (Hohenzollern-Sigmaringen) 王室之王子，并於一八七〇年即位，於是法國方始感受脅迫，但已陷入卑斯麥之外交陷阱中了，當時普魯士之軍事和外交，都已完全作戰爭之準備，祇等着法國政府不能忍耐而宣戰的機會，戰爭之宣告在一八七〇年七月十九日。由八月初旬開戰，法已陷於不利，九月初，法軍被擊破了。九月四日

巴黎革命起，傾覆帝政而宣佈共和，設立國防臨時政府，在臨時政府期內，祇有甘必他（Gambetta）一人瞭解作戰到底之任務，但杜羅祖（Trochu）將軍（大總統兼巴黎總督）却與甘氏反對，其態度早就曖昧不明，他怕內部的敵人（巴黎之勞動階級和共和主義分子）和怕外面的敵人（普軍）一樣。十月三十一日，雖有住在巴黎之白郎葵，計劃再組織有能力的政府，但因戰事關係，國內組織已經不能加以改造，而且甘必他所召集之軍隊，也被擊破，所以到一八七一年一月末，便不能不開停戰之談判了。二月八日舉行國民會議總選舉，結果是反動派得占多數，并擁戴地亞司（Thiers）之反動政府的成立。此後，國民會議先開於波耳多（Bordeaux），再移於凡爾塞（Versailles），從此便向巴黎勞動階級開始襲擊了。

二月二十六日講和豫備會議成立，但從全法國史看來，實為空前未有之奇辱，因在議內犧牲了亞爾薩斯（Alsace）及羅侖（Lorraine）兩省。由是全國都熱狂興奮，而以巴

黎爲尤甚。巴黎國民軍，原爲維持公共治安而組織的，其份子由多數急進主義和勞動階級所組成，牠還附有礮兵隊，二月之末，組織中央委員會，同時爲杜羅祖所統率之凡爾塞政府，派兵攻擊巴黎礮兵隊，卒被礮兵隊擊敗，於是中央委員會便反對凡爾塞政府，在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宣言巴黎爲自治的公社（Commune）。改中央委員會爲臨時政府，行獨裁政制，可惜僅八日（到三月二十六日）中央委員會竟讓巴黎有普通選舉權：換言之，卽中央委員會把政權奉還於巴黎上層階級之手，而施行民主主義政體。巴黎公社從三月二十六日至五月底之最後失敗日期爲止，都實行這種民主主義的都市行政。所以牠決不是獨裁政制，因爲牠由合法的民主主義選舉而出發，而組成國際勞動同盟會員，勃蘭期主義者，蒲魯東主義者，資產階級共和主義者，已絕望的愛國主義者等許多派別所聯合之政府。從現在看來，如果由國民軍所決定之中央委員會始終握掌政權，而不訴於普通選舉權，則巴黎公社，總可以用獨裁政治而繼續存在。這件往事實爲

歷史上之一種重要教訓。把公社變爲聯立政府，那便自然不能有統一的行動和戰術，而目標也不確定了。馬克司攻擊當時之中央委員會，說牠誤用了民主主義之感覺和選舉權，這實是充滿非常的同情而同時又直指其要害的話。馬克司說：

「當時不向着全無力量的凡爾塞進攻，而反在三月二十六日舉行選舉，令反動之秩序更由一度之投票而試驗其力量。當時在選舉區中之秩序黨人，雖然外表用着溫和之聲調，和那些過於寬大的勝利者相交談，但同時他們的心裏必定會想到我們握取政權之時，便爲流血之復讎之計劃了。」馬克司之法蘭西內亂史第二章當時馬克司又在寫給他的朋友漢諾華(Hannover)的古格曼(Kugelmann)信中說道，中央委員會之失敗，實有兩種錯誤，第一中央委員會當凡爾塞軍爲蒙德馬爾特(Montmartre)所擊敗的時候，不立刻命巴黎國民軍進攻凡爾塞以剷草除根。『而第二個錯誤，則中央委員會把自己之權力拋棄得太快，而讓選舉權於資產階級。這真是從可尊敬的良心所發生的舉動！』(Nene

Zeit, Band 20, 1, S. 709)

前面說過秩序黨在一八七一年三月二十六日，由勝利黨給以行使選舉權的時候，經已抱着復讎思想，一到五月之末，就用最慘酷的方法來實現了。巴黎公社沒落之後，公社之戰士自然大受屠殺，甚致凡有嫌疑之份子都受放逐。法國資產階級大約在十年之間，盡地驅除了社會主義這一件怪物。後來直到八十年代，社會主義方纔在巴黎復活。一八八九年『第二國際』設立於巴黎。

第九章 帝國主義時代（一八八〇至一九一四年）

（1）帝國主義之經濟基礎

大體上從一八五四年到一八七九年，德意二國的民族和北美合衆國都已完成了國家的統一，而南部和西部的斯拉夫各民族，則早已參加於民族解放的戰爭，工業的帝國主義繼續壓制地球上一切民族和國家。非洲爲各國探險隊所分割，并且佈滿鐵路網和電線網；全個亞洲都爲汽車和蒸汽機之聲音從中世神祕的睡夢中喚醒；鐵路橫貫北美之大荒原，繼續把殖民送到西部的大地，開發該地之耕地，煤炭礦，五金礦，及煤油礦。當時人類好像祇有一種任務：就是做成財富和集積物質的貨物。我們祇要一看爲近代工業

最重要基本原料的煤和鐵之出產增加的數目，便可以充份明白一層了。

煤炭採掘額（以噸計）

一八八〇年

一九一三年

英

一四七、〇〇〇、〇〇〇

二九二、〇〇〇、〇〇〇

法

一九、四〇〇、〇〇〇

四一、〇〇〇、〇〇〇

德

五九、〇〇〇、〇〇〇

二七七、〇〇〇、〇〇〇

美

七〇、五〇〇、〇〇〇

五一七、〇〇〇、〇〇〇

鋼鐵生產額（以噸計）

一八八〇年

一九一三年

英

七、七八〇、〇〇〇

一〇、四〇〇、〇〇〇

法

三、〇七〇、〇〇〇

五、三〇〇、〇〇〇

德

五、一二〇、〇〇〇

一九、四〇〇、〇〇〇

美

三、八四〇、〇〇〇

三一、五〇〇、〇〇〇

人口數目

一八八〇年

一九一三年

歐洲

三一五、〇〇〇、〇〇〇(?)

四一九、〇〇〇、〇〇〇

美國

五一、〇〇〇、〇〇〇

一〇五、七〇〇、〇〇〇

以前擔當工業革命之任務者爲蒸汽和機械，但現在漸次由電氣和化學所替代了。在一八八〇年以前，英國經濟的優越，絕無搖動，但現在漸次移到德美兩國了。

在這個時代當中，資本主義經濟生活的內在法則，在各工業國中，表現有下面所述之激烈情態：

一，勞動生產之急速增加，盲目的財貨生產方法，毫無紀律，大多數無產階級，互

相結合，在需求和供給之間，發生激烈的不調和，因而時常引生恐慌。商業衰落，失業，財貨之價值低落，把資本主義之光明面，加上極強烈的黑影。因為這個原故，于是上文所述的銷場擴張之衝動便發生了。

二，機械力和機械技術之過度使用，使生活的勞動者之數量減少，各種商品的價值量也因而減少；這種事實之表現便是各種工業品價格之低下；商品所內含之價值越小，則實業家所得之剩餘價值或利潤也比較減少，在和平時代，一切工業國家都發生利潤率低下之傾向，這實是實業家之一個大難題。解決之方法，惟有應用經濟之擴張和高度之生產，因為由大量的生產和販賣，才能把利潤之價額抬高起來。但若要用這個方法成功，則惟有大資本的企業者，才合資格，而那些小企業家，便必然舉辦不來，而終致沒落了，其機警者，則互相結合而成爲股份公司。又大量生產必需大量之原料，而從歐洲和日本看來，則這些原料祇能來自海外各國各地，如熱帶及次熱帶的地方。因為這個緣

故，於是向海外尋出領土之衝動便急速發生，因而殖民政策，艦隊建造，陸軍軍備增加，外國領土的國權之擴張，外交關係之緊張，和國際戰爭等，便都陸續發現了。

三、利潤低下，其結果便爲生產階段之擴張，大企業得獲勝利，而巨額利潤則集中于少數人之上。在本國既找不着用途，于是大量之資本便要投下于利潤率高昂而勞動運動又復柔弱不振的非資本主義地域，或半資本主義地域去。又因爲要保護所投下的資本于安全的地位，資本主義國家便或由直接之征服，或宣言該地方爲其勢力之範圍，更或用和平的侵掠方法，務求擴張其支配的權力于非資本主義的國家，或半資本主義的國家之內。這種權力擴張，又要爲着保護所投下之資本和新經濟之利益，必須對抗其他各國之競爭者，所以便有建造艦隊及增加軍備之必要。這些現象，實爲近代帝國主義政策及世界戰爭之主要原因。

總而言之，統而言之，帝國主義就是維持資本階級及與其觀念相連結的國家主義和

軍國主義之現存的秩序。

(2) 社會主義之普及，考茨基

上一節所述的經濟和政治革命的進化，實在便是社會主義運動進步之主要原因。一八八〇年到一九一四年之間，社會主義以可驚的速度而推廣于各地，世界上各個文明國家，無不有社會主義之代表者及團體。傾服于社會主義的人，大大增加，以百萬計，而其理論的中心，則實為馬克司主義之基礎原理。

德國之技術和工業，經濟應用及科學原理和方法，在歐洲各國之中，實在佔着指導學者之地位，而同時歐洲的社會主義之理論和實際，也由德國勞動階級為之領袖。舉例言之，法國勞動運動之復活，實由德國之刺激而來；而德國社會主義之發展，又刺激當時少數英國之社會主義者，他們在倫敦設立社會民主主義的團體；斯拉夫各國又開始以

德國社會民主黨爲圭臬。所以德國代表在國際社會主義者和勞動者大會之中，最受他國人士之注目。總而言之，從一八七五年至一九一四年這四十年之間，德國社會民主黨幾乎是近代世界的勞動運動之先鋒。而其領袖人如倍倍爾（Bebel）和李卜克內西等，都享受國際之榮譽。

在這個時代之中，德國社會民主黨之理論家，首推考茨基（Karl Kautsky）。在考茨基未以馬克司主義者而顯現于世界舞台之前，卽一八八二年及其後之二三年間，在德國之中，則馬克司主義，大抵還具有人提起的。社會運動之思想，祇以拉薩爾的著述一八四八年回顧錄與其他法國之著作爲基礎；至于社會主義者則大多數效法羅德俾爾士和杜林（Dühring），其較爲進步的，也祇曉得國際勞動同盟之出版物，否則便把其主張之根據，全放在倫理和人道主義之上而已。直到考茨基，才開始把馬克司主義之思想，加以正當之釋解和傳播，以完成馬克司之使命。原來考茨基這一個人，早已具有很好的

自然科學，歷史，及經濟學等智識，而且又兼備通達之文體和堅貞不拔之活力，他是昂格斯之學生，在一八五四年，生于伯拉格 (Prag)。他的父親屬於捷克波蘭系，爲畫家。其母親則屬於德國之意大利種，爲近代的小說家。他卒業于小學，便升入維也納中學。他最深之印象便是民族的性質：這是因爲在他的血統中，捷克系和德國系互相衝突之原故。其後，他研究巴黎公社的事實，便逐漸注意于社會問題，他讀過英國經濟學者和社會學者如穆勒，馬爾薩斯，及斯賓塞之著作，與乎法國社會主義之各種書籍。一八七五年，他參加社會主義之勞動運動，列于左派，研究馬克司之著作，一八八〇年，他發刊最初著作人口增加之影響 (Einfluss der Volksvermehrung)，在這本書中，顯出他對於馬克司經濟學，已有相當之研究，但是他仍注重于人口問題及農業問題去。再後數年，他加入瑞列茲 (Zuricher) 之社會民主主義 (Sozialdemokrat) 雜誌，任編輯之職，到那時，他方成爲真正之馬克司主義者，于是便創刊馬克司主義的最初宣傳機關

報，是為名著當時和後代的新時代 (Neue Zeit)。由一八八四年至一八八七年，他在倫敦，為昂格斯之助手。他從一八八七年至一九〇七年這二十年間，為最努力和收獲最多的時代；在這個時代中所著作的：有多馬斯謨爾傳 (Thomas Morus)，馬克司經濟學說 (Marx Okonomische Lehren)，歐法特黨綱 (das Erfurter Programm)，及其他各種重要的著作，德國和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在他的著作中，實在得獲了極深極大之影響。考茨基對於馬克司主義之普及，最為有力，可惜其後竟變轉了他的立足點，他不再從事于無產階級之革命的鬥爭。一九一七年，俄國多數派建立政府，考茨基極力反對其主張，此後，便成為社會民主主義的改良主義者了。

第十章 第二國際（一八八九年至一九一四年）

（1）成功與失敗

從第一國際的解散到第二國際的創立之期間，雖然也有各種社會主義者和勞動結合之大會，但沒有統一之性質和共通的出發點。到一八八九年，才憑藉着巴黎的世界博覽會之機會，有兩個社會主義的勞動大會開于巴黎，第一個由機會主義者（Possibilisten 卽改良主義者）召集，而其他一個則由馬克司主義者召集，其結果，便創立第二國際勞動大會，在大會之中，確定五月一日爲勞動節。第二國際開過大會八次：卽一八九一年之不魯塞（Brussel），一八九三年之瑞列茲（Zurich），一八九六年之倫敦，一九〇〇年之巴

黎，一九〇四年之亞摩斯德登(Amsterdam)，一九〇七年之司徒嘉德(Stuttgart)，一九一〇年之哥平哈經(Kopenhagen)，一九一二年之巴色(Basel)。第二國際本部自一九〇〇年以後，即設于不魯塞，國際祕書局，亦設于此；議長爲樊達文(E. Vandervelde)，書記爲許司曼(C. Huysmans)；凡參加的國家都派出兩名代表，他們時常會合，決議各種重要問題，以爲大會之準備。

第二國際史，依其最重要的決議案，可以分爲三期：(1)到一八九六年爲止，把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之界線，分別清楚，並且在大會中，排除無政府主義之份子。(2)到一九〇四年爲止，主要的討論在確立政治的階級鬥爭之原則。(3)是爲最後之階段，牠的特點在努力令各國國民曉得必須時時刻刻驚醒，注意于帝國主義戰爭之危險，而且決定國際社會主義的勞動團體對於戰爭之態度。

第二國際之功績，僅在于排除無政府主義一事。因瑞列茲和倫敦大會之討論結果，

在一九〇〇年之巴黎大會中便爲如下之決定：即祇准許社會主義和承認政治的階級鬥爭之團體加入于大會之內。

在第二個階段（即從一九〇〇年到一九〇四年），第二國際決定一切社會主義者，除了在非常情境之外，不得加入于資產階級所組織之政府或內閣。大家深信由于這一個決定，便可以解決一八九八年法國德列夫司（Dreyfus）事件的米拉蘭（Millerand）加入Waldeck-Rousseau-Gallifet之內閣問題。固然照這個決議，在一九〇四年，第二國際把米拉蘭（後爲法國大總統）的名字除去。而一九〇六年，又把維維亞尼（Viviani）及白里安（Briand 後爲法國內閣總理）的名字除去。但『除了在非常情境之外』這一句話，却成爲戰時或戰後之社會黨員失節入閣一個口實了：勞動黨和社會黨便公然與資產階級政黨相勾結，而共同組織政府了。

至于第二國際防止戰爭危險之事業，完全無效。討論雖多，而對於防止戰爭危險的

約束之決議，竟完全不能發生效力。

(2) 第二國際與戰爭

在一八八八年到一八八九年成立之第二國際，其屢次大會都討論戰爭問題。在好幾次大會之中，社會民主黨都佔優勢，所以戰爭之決議自然也屬於民主主義的了。一九〇〇年以來，牠認戰爭之原因，不由于民族之鬥爭和專制君王之暴虐，而實由于帝國主義和殖民政策的努力。社會民主黨的傾向和工團主義反對國家的傾向，已經超過兩次爭論；一八九一年的不魯塞大會，工團主義以杜梅拉紐文許士(Domela Nieuwenhuis)爲代表，而一九〇七年之司徒嘉德大會，工團主義又以赫爾夫(Herve)爲代表。但兩次都由社會民主黨佔勝利。牠並且在司徒嘉德大會決議了一個標準。

法國社會主義者，因爲一九〇五年的摩洛哥事件，已把戰爭問題列在議事日程之

中，而摩洛哥事實已透露世界戰爭業經準備之消息的。在司徒嘉德大會之中，法國代表現出三種傾向：其一爲反軍閥主義派（但現在却已變爲極端的愛國主義者了），赫爾夫以勞動階級之總同盟罷工和暴動，爲對於戰爭勃發時之唯一解答，威蘭德（Eduard Vaillant）和朱列斯（Jean Jaurès）等，也擁護赫氏之提案，承認罷工及暴動爲最後之手段，而朱爾司格德（Jules Guesde）則以戰爭爲資本主義之不可逃避的結果，所以一切反對戰爭的運動總是徒然，而最善的非戰宣傳，實爲社會主義之啓導的工作。比國代表樊德文（Vandervelde），對於朱列斯之主張，表示同意，他說：『他國對於比國之中立，恐怕有立心破壞而強硬通過其國境的，所以他對於非戰主義，絕對表示同意。』德國代表倍倍爾及佛爾馬爾（Vollmar）演說：他們以爲赫爾夫之見解和提案必定不能實行，所以加以反對；他們祇力陳民族思想在文化上之意義；倍倍爾還說，當戰爭勃發之時，人皆興奮，而戰爭之主張實把握着大多數人之意見，于此而爲反『祖國擁護』的運動，實

處于『開倒車』之地位，談何容易。——在其間，談論的時候很長，會場空氣，也極為活躍，但空言雖多，究無結果。大會中之大多數，一方面主張擁護祖國，但他方面又贊成階級鬥爭，所謂『既當擁護祖國，也要擁護社會主義』。——朱列斯在巴黎的某一個集會中，報告司徒嘉德大會之結果，為如下之敘述（見 *Rappoport, Jean Jaures' Biographie*，一九一五年巴黎版，二六六頁至二六七頁），這自然是大多數人之基本見解，他們因為仍然處于私有財產和資本主義競爭支配之下，于是各個國家之利益和國際的社會主義之利益必然發生矛盾，于此而欲除去這樣的矛盾，實在是辦不來的。所以大會祇得希望在各重要國家的勞動階級得獲勝利之時，這種矛盾，才能廢止。大會之決議案由倍倍爾主任起草，惟最後二節，則由盧森堡女士，列寧，及馬爾托夫（*Marotof*）三人所共擬，其詞如下：

『大會雖然承認屢次國際大會對於各種及軍閥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決議之真實性，更

確定反對軍閥主義之鬥爭和一般的社會主義之階級鬥爭有互相連絡不可分離之性質。資本主義之國際戰爭，實爲全世界市場競爭之結果，詳言之，卽各個國家不祇要確保其生產品之銷場，還要努力爭奪新的銷路，因此，便演成對別個民族之征服和土地之奪取。而且這種戰爭，實起于軍國主義之不斷的軍備競爭，所以軍國主義便成的資產階級的階級支配和勞動階級之經濟及政治的征服之主要工具。戰爭之所以發生，實由于支配階級之利益，現在更因爲文明國家制度所養成的對於別個民族之偏見而更成劇烈，而這種偏見之目的實在想把勞動階級之羣衆，脫離自己階級之任務和國際勞動階級團結之任務。由此可知戰爭必然存在于資本主義本質之中；所以必要等到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之廢止，或由于軍事技術之進展，使人類和貨幣受着極大之犧牲，與乎由于軍備之擴充而引起一般民衆之叛逆，務以努力廢除這種經濟組織之時候，戰爭之廢除，方才可能。担负兵役和物質犧牲的大部份的，當然是屬於勞動階級，所以勞動階級之反對戰爭，實爲

必然之傾向。從此可知立于實現各民族共同社會主義的基礎以爲經濟制度的創造之觀點上，戰爭和勞動階級是互相矛盾的。所以大會承認勞動階級之義務，尤其是出席大會代表之義務，必須在認識資產階級的性質和動機，反對海陸軍備之擴充及設置，並且反對其所應用之一切手段，此外還要把國際共同主義及社會主義之精神，教導勞動階級之青年，令到他們充滿着階級之意識。大會更承認軍隊編制上之民主組織，把常備軍改爲國民軍，這種改制足以制止侵略戰爭之發生，而保證各國國民不再發生互相敵對的性質。自然，勞動者對於反對軍閥主義之行動，必要因應于國家，地方，和時間之不同而隨機應變，因爲國際勞動團體，決不能束縛于固定的形式之中。然而無論如何，在可能範圍之內，必要把反軍閥主義和反戰爭的勞動階級之努力，加以極度之緊張，使之互相團結爲一。……勞動階級行動之精神，總要時刻注意，爲不斷的宣傳，假使各國勞動黨接受國際勞動團體之刺激和制限越大，則其所生之效果亦越大。大會實在相信由于勞動階級

之力量，可以利用實際的仲裁裁判以代替國家之裁判，並且對於各國國民，保證軍備廢止之好處，則自然能夠將浪費于軍備和戰爭之大量金錢及物質，轉而利用于文化的目的了。（註）

（註）以上為倍倍爾所主任之草案。

『當國際戰爭將要勃發之時，參戰各國的勞動階級及其所選出的議會中之議員，應該擔負接受國際勞動團體秘書局訓令之義務，他們要用最有效力的手段來阻止將近勃發之戰爭。至于所謂有效的手段，則必要跟階級鬥爭之尖銳化和一般政治形態而隨機應變。』

『然而若果戰爭已經勃發，他們要立刻主張停止戰爭，並且要利用因戰爭而引生的經濟和政治之危機以煽動國民，克盡全力，以促進資本階級的階級支配之廢止。』（註）

（註）這兩段由盧森堡女士，列甯，及馬爾托夫所附加。

一九一〇年的哥平哈經大會和一九一二年巴色大會之決議，都繼承着司徒嘉德大會決議之精神，並且肯定最後兩節之原有文字。

然而在一九一四年七月之末到八月之初，戰爭的心理已經克服了大會中之領袖和一般人，他們立刻拋開大會之決議。祇有少數之社會主義的勞動運動仍舊應用階級鬥爭之原則。其用盡全力搏鬥的，祇有俄國之多數派。于是世界戰爭（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便根本打破了第二國際。換一句說，便是第二國際陷于民族的衝動與乎社會主義和革命的理性之間不能解決的矛盾而消滅了。

我們以下要分段來逐一敘述各國社會主義政黨之歷史。

（3）德國

狠少國家會像德國那樣遍佈着社會主義之火花的，德國勞動者——其中實包括奧國

的勞動者；因爲直到一八七一年，奧國勞動者還屬於德國勞動階級組織之一份子的原故——逐漸表現社會主義鬥爭之傾向。第一次德國帝國議會選舉舉行于一八七一年，在其中，埃新納茲派和拉薩爾派，合共得十萬零三千票，而在一八七四年，則合得三十五萬二千票；社會主義的議員，由二人加到十人。當時，兩派雖已發生衝突，但仍聯合進行，同向一鵠，一八七五年，成立哥達(Gotha)的聯合大會，而且採用了民主主義，社會改良主義和平和主義混合之哥達政綱。其後二年，行總選舉；聯合社會黨約共得五十萬票，選出議員凡十三名。選舉方面既有成功，政府對於社會黨領袖，機關報編輯者，和煽動家等，便大加迫害，一八七八年——經過兩次暗殺威廉一世之事件後——卑斯麥便提出鎮壓社會主義之法令，這一度法令，在起初數年之中，令各社會主義社團，陷于困境，然而終竟不能把牠撲滅。並且組織祕密，黨員增加；一八八七年選舉，德法二國邦交正在非常緊張，戰爭有立刻勃發之危險，然社會主義各黨仍舊得七十六萬三千二百

票，一八九〇年，更得二百四十二萬七千一百二十八票，選出議員，凡三十五名。後來，鎮壓法令廢止，卑斯麥也罷黜不用。一八九一年，社會主義政黨在歐法特(Erfurt)召集大會，採用考茨基所起草之歐法特黨綱，牠把以前通過之哥達政綱盡地排斥不用。考茨基從歐法特黨綱，加以極細緻之註釋，這個政綱在理論上，雖仍屬於馬克司主義，而在實際上，却已成爲民主主義和社會改良的了；革命時代之社會主義者所必然採取之原則，竟全然泯沒了。并且他還完全消失了馬克司對於哥達黨綱批判中所包有的尖銳之革命思想。社會黨因爲鎮壓法令而變成社會民主主義和社會改良主義的性質。反對這種主張的，爲悉普爾(Max Schippel)，金布夫米爾(Paul Kampffmeyer)，和繆拉(Haus Müller)所領導之『青年反對派』，其時期爲一八九〇年到一八九一年。這一派本來完全屬於實際革命運動之勞動階級，但不久便爲昂格斯，倍倍爾，李卜克內西等之權威，和歐爾司(Ignaz Auers)之辯才所折服。當時，修正主義(Revisionismus)已經發生，

因爲在九十年代之前半，經過很長久之經濟恐慌，而在當時却已露出多少恐慌之萌芽。所以到社會主義的鎮壓法令將要廢止之時候，佛爾馬爾（Georg von Vollmar）便公然提出修正主義；再到十九世紀之末，更由卜斯天（Eduard Bernstein）加以完成。牠是僥倖投機的樂觀主義，跟着勞動組合之增大的德國經濟而進展。自由勞動組合會員，在一八九〇年，爲二十三萬八千，但到一九一四年，已超過二百萬，（註）其指導者李基恩（Karl Legien），司密德（Robert Schmidt），和烏姆布列禮（Paul Umbreit）等，都完全屬於正宗的修正主義。雖然有考茨基，麥林格，和盧森堡女士等，非常努力地修正主義辯駁，但都沒有實效。大多數社會主義黨員，竟因爲無意識的矛盾，把理論和實際，分裂爲完全不同的兩件事情。因爲在各種大會成立之祝賀電文和黨之大會——尤其是一九〇三年的德勒斯登大會——之中，顯現出勞動階級革命之傾向，必然勝利，但在日常活動之一切理想，則恰在其反面，祇顧在議會內，爲外表政治之招徠，和社會改良

主義立法之促進。這完全由修正主義及其民族感情，佔了勝利而已，而勞動階級之心內，滿含着革命可能性究竟能否實現之懷疑，和立即要現實政策之觀念。幸而當時還有勝格爾 (Paul Singer) 其人，他用偉大的領袖才和犧牲的行爲，令社會黨有光榮的組織，黨內之精神弱點，盡爲掩蓋。那時德國工業和外國貿易，正有可驚之進步，而黨員人數和議員候選者之票數，也同時爲急速的增加，這不能不說是修正主義派之幸運。一九一二年總選舉之結果，社會黨得票，共四百二十五萬，爲全數投票額之百分之三四·八，被選出之議員，凡一百一十人——然而實際地說來，則德國議會并無用處，牠沒有怎樣的執行權，所僅僅具有的，祇是德國國民的統一和稅捐徵收的承認，其目的也不過裝裝門面而已。然而這種目的，終於達到。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勃發之時候，德國社會民主黨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 簡稱爲 S. P. D.) 之大多數，都祇曉得自己是國民之一份子，而却把保持與資本主義制度正相反對的利益和理想之階級

代表的資格，根本取消了。

(註)基督教勞動組合之會員也非常增加，一九九〇年，不過五千名，但到一九一四年，却加到二十一萬八千名了。

(4) 奧匈聯合國

奧國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經過，實和德國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經過，互相平行，但自其開始于一八六七年以來，便備受政府方面之迫害，比德國社會民主主義運動所受害者，利害得多。然而直到一八七一年為止，牠還屬於德國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一部份。一八六九年到一八七〇年，蘇因(Andreas Schen)，摩司特(Johann Most)，和巴布司特(Pabst)等，都因為煽動勞動大示威運動，被捕于維也納，并處以五年之監禁，但在數月之後，即得赦免。一八七一年，奧國脫離德國，其後，奧國社會運動便更受迫害，

加以一八七三年後，又受金融和財政恐慌之影響，于是勞動狀態，愈形惡劣。社會運動分爲急進及溫和兩派，直到一八八八年，牠們想效法德國拉薩爾派及埃新納茲派在哥達（一八七五年）大會聯合之前例，想成立奧國的統一黨部，然而從一八七七年到一八七八年，奧政府也仿效德國之辦法，頒行社會主義鎮壓結合，把一切社會主義者，概加壓迫，所以統一運動，到底不能成功。這種分裂，其實由于恐怖主義戰術之利用，遂令在絕望中的勞動者之前，竟表現無政府主義，所以便更成惡化了。一八八六年，有亞德拉（Victor Adler 死于一九一八年）之活動，而勞動團結，才告成功，後二年，在亨斐爾德（Hainfeld）大會（一八八八年）中，聯合工作完成。以後雖還有種種民族間的糾紛，但已有顯明的進展了。牠確定社會黨之工作，即是黨要籌劃實施民衆教育，示威運動，集會，出版，勞動學校，務要把種種民族——如德意志人，捷克人，波蘭人，斯羅文亞人，克羅亞人，和塞爾維亞人等——之要素，而成爲奧國勞動階級之大團結，牠堪稱爲

第二國際下之最為組織和訓練的支部。維也納的勞動黨，在當時，還按照着一八八九年之決議，實行休業，以慶祝五月一日之勞動節。這個黨更由不斷之煽動，迫逼着奧國政府，不得不頒行普通選舉，其時為一九〇七年。而在選舉之時候，該黨共得一百〇四萬二千票，選出之議員，凡八十七名。黨內含有智識份子甚多，如包爾(Otto Bauer)，希爾費德(Rudolf Hiferding)，厄克司他因(Gustav Eckstein)，倫那爾(Karl Renner)，和亞德拉數人。牠對於戰術，雖和牠的友黨——德國社會民主黨——沒有差別，但却沒有修正派，這因為奧國憲法，非黨嚴峻，而平和的勞動階級運動，實無勝利之可言，同時，奧國之勞動情形也比德國為更壞之原故。奧國議會，本不能干涉外交，所以其社會民主黨，雖想用議會之力量，操縱外交，使對其隣近之小國——塞爾維亞——保持着和平合理之政策，以維持兩國之邦交，不致有戰爭之決裂，然而竟辦不到。

匈牙利的社會主義運動實和奧國無異，但牠却沒有無政府的恐怖主義之份子在內，

自一八六七年所發生之勞動運動，因為擾亂社會秩序，所以便受政府之迫害。無論勞動者如何鬥爭和犧牲，但在世界大戰之前，仍然得不到普通選舉權和勞動結社之法律上的認可。所以匈牙利之勞動階級，應該硬着心腸，辣手地去消滅其舊日之制度。

(5) 大不列顛

一八五五年憲章運動 (Chartism) 失敗後，英國勞動者非常努力，專心建設勞動公會和消費合作社。其中雖也有參加于第一國際，但祇是少數的和片面的餘音而已。直到一八八二年，社會主義運動方才開始。其前導者為亨德曼 (Henry Mayers Hyndman)，他生于一八四二年而死于一九二一年，富有教養，而且具備着狼強之英國民族性質。一八八〇年，他讀資本論之法譯本，投入馬克司門下。一八八二年，創立『民主聯盟』，最初採用社會改良之黨綱，但不久便改名為『社會民主聯盟』 (Social-Demokratische

Federation，簡稱爲 S. D. F.），轉而採用社會主義的黨綱。多做宣傳工作，推廣馬克司學說，指導失業者以示威運動，然而雖極努力，但勞動階級，却不受其影響。和亨德曼一同活動的又有百克司（Belfort Bax），摩里司（William Morris），和馬克司之女子綺麗娜爾（Eleanor），不過在數年之後，他們即脫離『社會民主聯盟』，而別立『社會主義同盟』，但這個同盟後來卒落于無政府主義者之手內，因而再歸入『社會民主聯盟』去。和社會民主聯盟同時者，有費邊社（Fabian Society），在一八八四年發生，宣傳社會改良主義。其著名人物爲韋布夫婦（Mr. and Mrs. Sidney Webb）和蕭伯訥（Bannard Shaw）。費邊社之理論，大抵以修正派爲宗：即所謂社會主義，決非很遠的終局，而是由議會主義的和國家的方法，順次實行，以獲得社會政策方法之結果。在各民主主義的國家，可由文字著作之宣傳而感化一般之輿論，尤其要感化有教育的人們，而後才能達到這種結果。費邊社以爲勞動結黨，不甚重要；因爲從他們之原則看

來，最多祇認獨立勞動黨之存在，用爲對付頑固的和反社會改良主義的政治之一個威脅手段而已。不過從社會批評和社會實證的思想之普及看來，費邊社之在英國，實有極大之貢獻，他們的活動實是同情于勞動階級的。

『社會民主聯盟』之成立，雖有十年，可惜其指導之領袖，竟不能創造出社會主義的勞動運動，令勞動組合充滿階級的意識。成績既然不佳，所以蘇格蘭和北英格蘭的勞動運動及社會主義之指導者，便受特殊刺激，而努力設立新團體，把社會主義精神移入于勞動組合之內，領導勞動者脫離資產階級之政黨。代表這一派之人物，爲礦工哈地（James Keir Hardie，一八五六年到一九一五年）。他及其友人在一八九三年，創立『獨立勞動黨』（Independent Labour Party，簡稱爲I.L.P.），他又和很多勞動團體之領袖有密切感情，所以他所創立之『獨立勞動黨』，非常發達。當時，又因有威脅勞動團體存在的訴訟事件，他的計劃便更加促進。勞動者漸起獨立的政治行動之傾向。一九〇〇

年，「勞動黨」成立，一切英國勞動團體都次第加入，很快便成爲英國之民衆黨。勞動黨已採用獨立政策，成爲一個次第應用社會主義思想的勞動組合和社會改良的勞動黨。大多數的勞動團體和社會民主聯盟，費邊社，和獨立勞動黨等，都加盟于這個勞動黨之內。自哈地去世之後，黨中之領袖爲麥唐納（James Ramsay MacDonald），他是一個著作家，溫和的社會主義者，和獨立勞動黨員。一九〇〇年，黨員人數，共爲三十七萬六千，到一九一四年，增大到一百六十一萬二千，共選出七十名議員。其後，黨之發達，極爲迅速，但當大戰勃發之時，大部份的社會民主聯盟會員，與乎差不多佔全數的費邊社員和勞動黨員等，都接受戰時政府之訓令，唯有獨立勞動黨，才稍稍離開戰爭之漩渦而已。

（6）法國

自巴黎公社失敗之後，法國于一八七六年，已表現勞動勃興之先聲，當時，有組織的勞動者在巴黎開了一個大會。頤司德 (Jules Guesde)，生于一八四六年死于一九二〇年，寄稿于人權新聞報 (Droits de l'homme)，發揮社會主義之議論，又當平等 (Egalite) 雜誌總編輯，積極活動，和德國民主主義結社互通聲氣，發生關係，因此，他和馬克司及昂格斯二氏訂交。贊助頤司德活動的，爲拉花爾格 (Paul Lafargue)，生于一八六〇年，死于一九一三年，他是馬克司之女婿。以前被逐之『公社』會員，到此都已多數返國，卽入獄之老勃蘭葵也已于一八七九年釋放，不過雖然這樣地把熱烈之生氣貫注于社會主義運動之中，但同時其組織之勢力已經分散。一八八〇年到一八八一年，法國勞動黨 (Parti Ouvrier Francais 簡稱爲 P. O. F.) 成立，其黨綱得馬克司之力獨多，而成于頤司德及拉花爾格二人之手。一八八二年，布魯司 (Paul Brousse) 和馬隆 (Benoit Malon)，生于一八四一年死于一八九三年，所指導的改良主義份子，從法國

勞動黨脫離，別成組織；其黨員被人稱爲『機會主義者』(Possibiliste)，主張勞動解放儘可以由改良——不用革命——的手段而實現。機會派到一八九九年，仍還存在。同時，又有亞里曼 (Jean Allemane) 所領導之社會主義團體出現，更有維蘭 (Eduard Vaillant)，生于一八四〇年而死于一九一七年) 所領導之『勃蘭麥派』。此外則自一八九三年以來，又有獨立的社會主義團體，其領袖如米拉蘭 (Millerand)，維維亞尼 (Viviani)，白里安 (Briand)，歐格紐 (Augagneur)，及朱烈斯 (Jaurès) 等。當全國總選舉和地方選舉之時，各派社會主義之候補者，彼此爭競，互相排擠，遂令社會主義者之票數，因分散而不能佔大多數。這樣地，社會主義者之分裂，便促進舊日之蒲魯東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之餘派互相聯合，把反對議會主義的傾向加入于革命的勞動階級之間。法國社會主義運動，到二十世紀之初年，頗呈衰弱之光景，加以德烈夫士 (Dreyfus) 事件之訴訟，所以在社會運動上很受打擊。在這個不佳之情境中，其仍能以集中的勢力而

出現的，祇有朱烈斯一人罷了。亞摩斯德登之國際大會（一九〇四年）採用德勒斯登大會之階級鬥爭的決議為標準之原則，其後便把很多的小團體結合起來，而成爲一個統一的社會黨，因爲有朱烈斯之偉大的口才以爲繼續團結的力量，所以他對於法國之社會主義運動，實佔着重要之地位。

統一之結果，則米拉蘭，維維亞尼，和白里安三人，皆受除名之處分，其理由則在于他們不肯把亞摩斯德登和德勒斯登大會所決定的「反入閣主義」——社會主義者不加入資產階級的內閣之內——拋棄。自經此事之後，聯合社會黨非常發達。一九〇六年，全國總選，牠得八十七萬七千八百票，選出之議員，共有五十四名；一九一〇年，則大約得一百一十萬票，議員凡七十六人；一九一四年，更加到一百四十萬票，議員也增到一百一十人。然而世界大戰降臨了：一九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朱烈斯死于一國家主義者毒手之下。社會黨領袖如韻可德和桑巴（Sembat）等，聯袂加入資產階級之內閣，而

威爾則更爲賣力，他盡力煽動意大利和協約各國聯合，加入戰國。社會黨真成爲國家主義的黨派了！

從一八九二年到一九〇八年，在理論上，更比社會黨佔有重要價值的，爲以工團主義著名的法國勞動組合。根據法國法令，則勞動組合在一八八四年以前，還是非法之團體。至一八八四年，法律上始加以承認，唯許牠有發展之可能性。一八八六年，全國勞動組合同盟成立，牠是實行政治的勞動結社的和社會革命的目的之團體。白里安本在同盟大會之中，有極大之任務，他主張採用總同盟罷工爲勞動階級解放的手段（一八九二年）。但從具有反議會主義或無政府共產主義傾向的勞動者看來，則這個同盟實在太注重政治問題，所以批爾梯亞（Ferdinand Pelloutier）所統領的反對派之勞動同盟便成立于一八九二年，批爾梯亞爲知識階級的無政府共產主義者。並爲真正的工團主義之創始人。後來，到一八九五年，這兩個同盟發生友誼之關係，因而有勞動總同盟（Allgemei-

ner Bund der Arbeiter, 法文爲 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 故簡稱爲 C. G. T.) 之組織，於是兩黨便融合爲一，其時間爲一九〇二年。工團主義之理論，在批爾梯亞，拉格杜爾 (Lagarde)，和蘇列爾 (George Sorel) 勢力之下而完成，將階級鬥爭和馬克司之唯物史觀，和法國現代大哲學家柏格森 (H. L. Bergson) 主張直覺說——譯註) 哲學及蒲魯東巴枯靈之反國家學說，互相聯合，其內容爲工資制度之廢除，階級鬥爭之推展，由革命鬥爭和總同盟罷工而沒收資產階級，此後便由勞動組合的生產爲之繼承，由此以破除假僞之民主主義，軍團主義，愛國主義，同時又打倒資產階級爲着物質和精神以制伏勞動階級而御用的壓迫和欺騙民衆之政府。可惜工團主義之學說和行動，在勞動總同盟之內部，仍有不少人反對，因此便沒有完全一致之意見。勞動總同盟會員，在世界大戰之前不過五十萬左右。然而充滿着鬥爭之精神，以反軍國主義之目的而活動。當曾經做過總同盟罷工之教唆者克利蒙梭 (Clemenceau) 和白里安二人任職內閣總理之時候，勞動

總同盟竟受有最激烈之迫害。可惜一九〇九年以後，工團主義之宣傳和活動，都逐漸衰下了，世界大戰爭勃發之時，總同盟裏面之大多數會員，竟然一致爲主戰之擁護者；曾經努力宣傳階級鬥爭之機關報戰鬥 (Bataille) 竟成爲法國帝國主義對德國帝國主義之戰鬥機關。本來從第一國際時代反馬克司之巴枯甯主義者之傾軋，和第二國際對於無政府主義者之排斥，在勞動總同盟之機關報中，都曾利用來煽動反對德國之戰爭的極度情感了：巴枯甯主義者居爾謨教授 (Prof. Guillaume) 在將死的時候，發表汎德國主義者之馬克司 (Karl Marx, der Pangermane) 一長文，繼續刊登于戰鬥報上，又爲倫敦的國際大會 (一八九六年) 所除名之荷蘭無政府主義者哥尼里先 (Cornelissen) 也在戰鬥報上大登其爲德之主戰論，投稿于一間極端的國家主義報社法國行動 (Action Française)。

(7) 意大利

近代意大利之勞動運動，在一八六七年國際勞動同盟影響之下發生。在米蘭 (Milan)、福羅稜斯 (Florence)、基內亞 (Genoa)、拿坡利 (Naples)、和加坦尼亞 (Catania) 各地，都已設立有國際勞動同盟之支部，後來，國際同盟分裂，牠便受古斯達 (Andrea Costa) 和飛羅 (Carlo Cafiero) 之領導，而參加于巴枯甯派之中。牠自始即受政府之極大逼害，為社會主義之信念，遭遇很大之犧牲。勞動運動後來漸次超過無政府主義之領域；注入馬克司主義之思想；真實的勞動團體，直到一八九二年的基內亞大會，才成立一個團結而統一的勞動黨，次年，埃米里亞大會，開始採用意大利社會黨之名稱，古斯達也參加于其內。最有名之領袖為杜拉梯 (Filippo Turati) 和華里 (Enrico Ferri)。以後，黨之運動和機關報及出版物等，進步很為迅速。一八九二年之總選舉，共得二萬六千票，議員凡六名；一八九七年得十三萬五千萬，議員為十六名；一九〇四年，得十七萬五千票，議員三十二名；一九一三年，更增到八十八萬票，議員五十二名。但因爲

受有德法二國社會黨之影響，所以便傾向修正主義和工團主義兩派去，原來意大利之社會黨，含有知識階級較多，因此便自然受有一切學說之論爭和一切戰術的傾向之影響了。黨中以比梭拉梯(Bissolati)，波諾米(Bonomi)，卡尼巴(Canepa)等爲右翼；拉比里奧拉(Arturo Labriola)，爲馬克司主義者及大學教授安東尼拉比里奧拉 Antonio Labriola之子)，列昂(Leone)，阿蘭諾(Orano)等代表無政府工團主義而成爲左翼；而杜拉梯(Turati)，特列文司(Traves)，慕梭里尼(Mussolini)，和里華(Ferrì)等，則形成中央派。特里普里(Tripoli)戰役實爲世界大戰之序幕，同時也是意大利社會黨歷史之一個轉機：帝國主義之狂潮已把捉着了很多黨員之心理，但在一九一一年摩登拿(Modena)大會，却抑壓着主戰之狂熱心，次年，還把主戰的黨員——其中有比梭拉梯和波諾米——除名。這一種決議實爲當大戰爆發之時的一種良好之先例。大戰發生之後，該黨還宣告中立，不作左右袒，並把主戰主義者除名。其中有慕梭里尼，他完全迷信于

戰爭瘋狂的國家主義，而為捧喝主義(Fascist)之創始者。

(8) 俄羅斯及波蘭

俄國近代社會主義勞動運動，雖起于一八八〇年，但這並不是俄羅斯帝國最初之革命運動，因為反對俄國沙皇專制之鬥爭，實發現于拿破崙戰役之後，在這些鬥爭之中，其最重大之事件，便是所謂「十二月黨」(Dekabristen)之暴動，其時間為一八二六年，(註一)其中有比司達爾(Pestel)和賴里夫(Ruleff)二人，最為著名，他們一方面提倡共和主義，而他方面又為農業改革之提案。後來，兩人均處死刑。自是以後，便是聖西蒙和傅立葉思想流入俄國文學之時代(一八三〇到一八五〇年)。其中最優秀之社會革命作家為赫爾仁(Alexander Herzen)，他在莫斯科活動之時，已看出反對俄國沙皇專制之鬥爭，必要和社會主義之鬥爭相連絡；不過他的立腳點，還是曖昧不明的自由主義和

農業社會主義。他的重要事業，是在一八五七年之倫敦，創刊鐘 (Kolokol) 報，這個雜誌祕密輸入俄國，從事社會革命運動。繼其後的編輯人爲巴枯寧。他們二人在一八四〇年以後，都活動于國外。關於社會問題之趣味，在一八四九年的彼得堡，已爲少數智識階級所養成，其中有名陶司脫以夫斯基 (Dostojewsky)；他們之祕密陰謀卒致洩漏，他被捕于獄中，並受死刑之宣佈，然在長期監禁之後，却幸得減刑而流配于西伯利亞。五十年代之末，社會經濟學者車爾尼舒夫斯基 (Tschernyschewsky 一八二九到一八八九年) 和有名之文藝批評者德布洛呂波夫 (Dobrojubow 等，都藉着民主主義社會改良主義的雜誌時代的人 (Sowreijnunik) 而活動。車爾尼舒夫斯基在一八六二年被逮，在罪名未決定之前，經已監禁了兩年，其後仍處七年監禁。他在這一個時間，潛心著了一本很著名之小說，名應當做什麼？ (Was tun?)。當時，農奴解放 (一八六一) 問題之空氣，非常緊張，于是爲人民而獲取土地和自由的戰鬥的祕密團體便成立了。接着就是啓

蒙時代：自然科學的實證主義和政治的虛無主義之時代來了。並且因爲第一國際之影響，巴枯寧的祕密團體「社會民主聯合」，已出現于俄國學生之間。一八七三年，馬克司資本論已由洛巴丁（Lopatkin）譯成俄文。在七十年代，近世社會主義之影響，便已很強的表現；拉羅夫（Lawrow，生于1812年而死于1898年）爲當時最有名之代表者。其時，工業非常發展；一八七〇年罷工事件爆發于彼得堡。前此僅注目于取得農民的社會主義的智識階級，已次第傾向于勞動階級之方向，這一件事情，當然對于俄羅斯之農村共同社會（Mir）和家庭工業及手工業的共同社會（Arrels）的社會主義之意義，發生根本之爭論。很多社會主義者以爲俄國不必要經過工業化和勞動階級之鬥爭的階段，所以社會主義實在可與農民共同社會相結合，但又有另一派之社會主義者，以爲農民之共同社會已陷入崩壞之路途，而且俄國因爲要和西歐各國同入于社會主義之過程，所以便必須經過工業化和勞動階級鬥爭之階段。前一派堅信俄國農民社會主義精神之農業社

會主義；而近代社會主義者，却取相反之方向；要鞏固正在成長之中的勞動階級之階級意識和組織。然而在農村中之宣傳，究竟沒有什麼效力，而在勞動者當中，却發生秘密結社之戰鬥集團，一八八二年，牠受蒲列哈諾夫(Plechanoz)，死於一九一八年）和亞克司洛德(P. B. Axelrod's·死於一九二六年)，與夫蘇茲(Wjera Sasaulitcho)所指揮，採取馬克司主義而帶有社會民主主義的性質。

(註)十二月黨由高級貴族和軍官所結成，一八八二五年，十二月，謀反。其計劃洩漏，為政府所偵悉，于是其指揮者在一八二六年七月二十六日被逮，并處死刑。大多數十二月黨黨員，也流放於西伯利亞。

在七十年代，與農業社會主義及勞動階級社會主義同時并起的，還有「恐怖主義」(Terrorismus)之團體發生，這個團體由學生和智識階級所率領，其目的在於應用暗殺手段，令政府中八，為之驚駭，而令政府歸于破壞，因為一切自由結社都受慘酷的迫

害，所以很多戰士，都始終確實相信，若非破壞專制政治及其可恐怖之機關，則俄國必無自由之可說。一八七六年，革命團體『土地與自由』(Land und Freiheit)成立，同時更強大而勇敢的『人民之自由』(Volkselfreiheit)也成立了，其執行委員爲沙爾耶波夫(Scheljabow)，米希洛夫(Michailow)，和蘇菲亞(Sophia)。這個團體的黨員，暗殺了很多大官，便連俄皇亞力山大二世，也在一八八一年三月，爲海里尼維茨基(Hryne(wjicki))所暗殺。『人民之自由』的活動期間爲一八七九年在一八八一年，實際上，已引起國家機關之非常擾亂了；但其執行委員會對於這種擾亂，却沒有加以深沉之攷慮，而準備着更積極的手段。當亞力山大二世被暗殺後，政府當局狼狽已極，如果執行委員會能夠充份留神而規定計劃，則俄羅斯自由主義的份子，必同情于『人民之自由』的活動，如是，或者便可以奪取政權而成政治革命了。可惜沒有這種工作，所以便遭遇了非常悲慘的終局：執行委員被政府所起訴而定以死刑；繼亞力山大二世卽位的亞力山大三

世，則更聽從極端反動主義者波比德諾夫 (Pobjedonostzew) 之教訓，他實爲殘忍而專制之魔王。

亞力山大三世(一八八一到一八九四年)繼位，實爲俄國社會主義史的一個大轉機。因爲除了無政府共產主義者克魯泡特金(Peter. Alexievitch Kropotkin 一八二四年到一九二〇年)之外，其他担負社會革命運動的智識階級，都向後退，唯有勞動階級起來，繼承俄羅斯帝國革命之使命。一八八九年在巴黎開第二次國際大會，蒲列哈諾夫和拉羅夫代表俄國之勞動運動出席，其報告之結語如下：『俄國革命之智識階級，因爲離開民衆，所以對於帝制之鬥爭，已一事無成了。現在俄國之革命運動，便祇有勞動運動得獲勝利而已。在九十年代，俄國工業，因有外國資本之投入和軍備之擴張，便積極進步。第十九世紀之末，大罷工爆發于彼得堡。一八九八年，各個勞動團體聯合而成立『俄國社會民主黨』(Russische Sozialdemokratische)，但不久，內部即生出兩種不同之傾

向，到一九〇三年大會之後，便有所謂『多數派』（Bolsheviki，或音譯爲波爾雪維克）和『少數派』（Mensheviki，或音譯爲門雪維克）之分。在不魯塞和倫敦大會之時，多數派得編釋權，刊行 *Iskra* 報，這一派由蒲列哈諾夫和列寧領導，多數派之名稱，即因此，另一派則由馬羅夫和亞克司洛德所指揮，人數較少，故稱少數派，一般人所習知的俄國著名之社會主義黨，便由此而來。其後，因爲日俄戰役，俄國慘敗，因而發生一九〇五年之俄國第一次革命，又在一九一七年所經過之一種『總試驗』（Generalprobe），於是兩派之意見，又由分歧而復合，但終不能持久。因爲少數派採取進化主義，視革命事業祇爲一種長期資本進化發育作用之最後的目標。而多數派則反之，牠以爲革命事業實在是進化促進之一種動機，而不是長期資本進化之最後目的。換言之，少數派把革命當爲進化之鵠標，而多數派則利用革命以催促進化。由此言之，則少數派實在有類于德國之社會民主黨了。

俄國革命利用民衆鬥爭之方法，其開始實爲一九〇五年。當其時，全國風潮，風起雲湧，並且有武裝暴動。革命事業之唯一目的在成立國民國會。在第一次俄國革命之中，發生一個工人階級的政黨，黨中以少數派居多數，反之，在勞動組合之中，則多數派佔澎湃的勢力。多數派常常派遣秉性聰慧而可以造就的俄國工人到牠在外國所辦的學校去，以從事革命之訓練工作。

俄國社會民主黨中之最有精神的支部，實起于九十年代的猶太人同盟，這是由來多尼亞 (Litauens) 和一部份之波蘭的猶太人所組成的，直到一九〇三年，牠都成爲俄國社會主義運動之前衛。

在俄國社會民主黨之外，一九一〇年後，又有俄國社會革命黨 (Sozialrevolutionäre Partei Russlands，簡稱爲 S. R. R.)，信奉農業社會主義和個人的恐怖主義。

世界大戰爆發，社會革命黨和克魯泡特金，蒲列哈諾夫，及其隨從之信徒，都贊成

愛國主義，但多數派及一部份之少數派，則仍主張國際主義而反對戰爭。

波蘭社會主義運動史之思想和實質，在八十年代之前，實和俄國社會運動史有密切關係。波蘭也經過空想的社會主義，農業社會主義，和恐怖主義等階段。彼得堡的『土地與自由』和『人民之自由』等團體中，也參雜有二三極活動的波蘭學生；據波蘭人說，則海里尼維茨基也是他們當中的一個人。一八七八年，波蘭人團體『勞動者』成立，其中有克尼茨基（Kunitzki，前為『人民之自由』的執行委員），具着偉大的陰謀本領，而維林茲基（Ludwig Warynski），文德爾孫（S. Mendelsohn），及狄克史丹（S. Dickstein）等，都具有社會主義的知識。他們本來都是優秀之領袖，可惜他們因為從事于革命，于是或則殉其主義而死，或則長羈于長期監獄之中，或則死于流放，其後，他們的團體喪失了國際主義之立場，而成為國家主義的運動；一八九二年，『波蘭社會黨』（Polska Partya Socjalistyczna簡稱為P. P. S.）創立，更漸次把社會改良思想

和波蘭復國思想互相結合起來。牠逐漸變爲民族主義思想之代表，而與俄德二國之社會主義相對抗。他們以爲唯有戰爭，才能令波蘭脫離俄德奧三國之束縛，而得獲波蘭民族之解放。這一派當中，有達新司基(D. schinski)和比爾蘇司基(Pilsudski)，現爲波蘭之軍事獨裁者——譯註)二人，他們對於復國之主張，最爲努力，其後成立波蘭國民軍，卒之竟達到鬥爭之目的。

反對波蘭社會黨之活動的，則爲盧森堡女士。她要打倒這一班「社會愛國主義者」(Sozialpatrioten)這是盧森堡女士加于波蘭社會黨之名稱)，因而在二八九三年，創立俄國及波蘭社會民主黨。她分化波蘭社會黨之左翼，卒得成功。而既經分化之部份便成爲獨立之一黨。這一黨在世界大戰之初，和社會民主黨相聯合，到後來，便傾向于共產主義。

(9) 美國

本節不再討論那些由異端派，克慾主義者，烏托邦主義者，及人道主義者等所建設于北美之共產主義的移民村落，因為這些已經在本書第三卷之末，詳細討論了。從一八四一年到一八四七年，由美國的傅立葉主義者（其中多為學問家及著述家）如昌寧博士（Dr. Channing）、霍爽（Hawthorne）、李布利（Ripley），和丹拿（Dana）等，創設布魯克農場（Brook Farm）于波士頓（Boston）之近郊。但這在社會主義的歷史上，也已成爲過去之事實。本節之主題，在于以勞動階級爲主體的近世社會主義運動，這在美洲，實超源于十九世紀；其創始者大抵爲德國共產主義者，他們在一八四八年後，離開祖國，爲尋找新的活動地域，因而來到新大陸。除了站在空想的社會主義和階級鬥爭的勞動階級社會主義中間之韋德靈（Wilhelm Weitling）以外，美洲的社會主義的先驅人物，

都無一不服膺于馬克司主義，不是他的友人，便是他的信徒。其中有維德米爾（Josef Weydemeyer）、希爾蘇爾（Herm Meyer）、蘇爾治（F. A. Sorge）、和德依茲根（Josef Dietzen）等人。共產主義思想之擁護者首先成立『德意志體育協會』（Deutschen Turnvereine）。第一國際之美洲支部設立之後，也同樣為社會主義之普及而努力工作。一八七七年，紐約民衆報發刊；同年，『社會主義勞動黨』（Socialist Labour Party，簡稱爲S. L. P.）成立。這種運動本來是對於德國之社會主義鎮壓禁令（一八七八年）而發起的，後來因爲有多數德人之移居，黨中便更有力量，但同時無政府主義和拉薩爾主義之份子也跑到美洲來了。因爲由六〇年代之末期，在奧德英等國爲革命運動不屈不撓之戰士摩司特（John Most）也來到美洲，傳佈無政府主義的恐怖主義之思想。一八八六年，芝加哥（Chicago）城因罷工之動機而發生大示威運動，其後更演成炸彈暗殺之事件。因此，無政府的共產主義者斯比司（August Spies）、巴生司（A. R. Parsons）、稜

格(Louis Lingg)、恩格爾(Georg Engel)、菲爾登(Samuel Fielden)、菲沙(Adolf Fischer)、尼布(Osker Neebe)、和舒華布(Michael Schwab)等，都被逮捕。其結果，則斯比司，巴生司，菲沙，及恩格爾數人，在一八八七年十一月十一日，被處死刑；而稜格則于一日之前自殺。一八八六年和一八八七年，實為最值得注意之年份，紐約城有亨利佐治(Henry George)的土地改革方案之宣傳和比林美(E. Belamy)的二千年回顧錄(Ruckblick aus dem Jahre 2000)之出版。亨和佐治之宣傳，在一八七九年，已和其名著進步與貧乏(Progress and Poverty)之出版，同時開始，在英倫有很大之影響。而比林美之著作，也譯成一切文明國的文字，到處促進社會主義的思想；牠敘述在社會主義化之下的經濟，若用近代之技術，必有可驚之成績。在八十年代，美國之加入社會主義勞動黨的人漸多，其中有紐約大學講師列昂(Daniel De Leon)和著述家沙尼爾(Lucien Sanial)他們是反對任何妥協的嚴格馬克司主義者。不過列昂有一種錯誤，他

不令社會主義的勞動黨員活動于普通的勞動組合之內，而却另起爐灶，努力創立社會主義的勞動組合運動。他反對當時之『美國勞動聯盟』(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簡稱為 A. F. L.) 把勞動組合運動引入于社會主義之內，所以他另創社會主義勞動黨，注意于產業組合而不注意于職業組合。因此，美國勞動組合之領袖便乘機利用列昂之宣傳，說社會主義實為反勞動組合之學說。即在社會主義勞動黨內部之德籍的重要黨員，也大抵反對列昂之主張，而據着紐約民衆報為反對運動之機關，而他方面，則列昂也藉着人民(People)週刊以宣傳一己之意見。結果卒召兩派之分裂。反對派脫離社會主義勞動黨，在一九〇一年，另組『美國社會黨』(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 簡稱為 S. P. A.)，牠到一九二〇年，便非常發達，而社會主義勞動黨之本身却無進展之表現。選舉大總統之時候，兩黨之票數，列舉如下：

年 份

社會主義勞動黨

美國社會黨

一九〇四	三一、二四九	四〇二、二八三
一九〇八	一三、八二四	四二〇、七二三
一九一二	二九、二五九	八九七、〇一一
一九二〇	三一、一七五	九一五、四一二

從一九〇三年到一九〇五年，美國也發生工團主義思想之傾向；牠狼狽強烈地表現于德籍的麥酒工會之中。一九〇五年，列昂及其友人創設『世界產業勞動同盟』（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其簡稱爲 I. W. W.。這是勞動組合的階級鬥爭之團體，以經濟行動爲根據，同時也不拋棄議會之行動。未幾，世界產業勞動同盟之一部份會員，主張議會之行動實爲反動的行爲，必須放棄，于是又起分裂；信奉列昂主義之一部份，便另立『勞動者國際產業同盟』（Workers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Union，簡稱爲 W. I. I. U.）。在世界大戰之中，世界產業勞動同盟之會員，爲堅持其主張，致受

極大之迫害。一九一七年九月，九十五個有力量的領袖被政府所逮捕，并處以長期之監禁。

第十一章 國際戰爭與革命（一九一四至一九二〇年）

（1）第二國際之衰頹及分裂

在資本主義制度的胎中，不絕地產生內部之矛盾和對敵，到底便成爲激烈的衝突，而燃着了世界之大火堆，這種情形，如果要加以描寫，則恐怕用最宏偉的神話時代之幻想，也不成功罷。

海涅 (Heinrich Heine) 在一八四二年七月之時候，對於他的第二代的時代之世界戰爭和革命，曾有如下之預言：『悲慘荒涼的時代將要到來，著新的啓示錄 (Apokalypse) 爲基督教經典之一種——譯註』的預言者，必會發見一個新的怪獸，就是古代約翰

所傳流之象徵物遇見了牠，也會震懼驚駭，像馴良之小鴿的……」

暴風狂雨，遍佈世界。從一九一四年八月開始的英法俄三協約國和德奧二同盟國之鬥爭，實爲全人類之互相搏鬥。

交戰國的國民在戰爭發生之時候，資本家和勞動者聯合起來，彼此攜手，而祇以協約和同盟爲分野。交戰各國之內部全充斥着全國一致對外之論調。停止國內之產業鬥爭，利用數十年從外交家來之教訓，集合全國人民對外作戰。戰綫之分野，不依社會主義的勞動階級鬥爭爲劃分，而祇從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決定而已。

一九一四年八月，比利時之一部份爲德國佔領，國際社會黨的祕書局，已不能立足于不魯塞。祕書許司曼 (Huyssmans) 退居赫谷 (Haag) 地方，與荷蘭之指導者設立祕書局，而他方面，則樊迪文 (Vandervelde) 加入了比利時之內閣。許司曼雖想召集國際會議；但到底祇有各中立國的代表者參加，于一九一七年到末一九一八年初，會集于哥

平哈經 (Kopenhagen)，決議向各交戰國的社會主義者，請求戰爭之停止。協約國方面之社會主義者于一九一五年二月十七日，會議于倫敦，決議戰爭應該繼續，惟有俄國之多數派少數派都拒絕參加該會。一九一五年四月十二日及十三日，德奧二國之社會主義者開會于維也納。然而大多數之社會主義者都逐漸曉得他們陷入迷途，不忠實于以前之信念，所以他們都想從新回到國際主義之立場去。

最初之國際分裂實在善馬華德 (Zimmerwald) 和肯德爾 (Kienthal) 的會議中……一九一五年九月，善馬華德會議之參加者，祇有俄國——代表有列甯，辛奴維耶夫 (Sino-view)，及李德克 (Radek) 等——德國——代表有麗德布爾 (Ledebour) 及荷夫曼等——法國——布蘭期 (Blanc)，布利宗 (Brizon)，及羅利阿 (Loriot) 等，及二三個中立國之革命的社會主義者，他們決議要求階級鬥爭原則之一般地適用。同樣的會議又在——一九一六年召集于瑞士之肯德爾。英國代表對於這兩次會議都不出席，因為英國政府不給

予出國旅行證之原故。一九一七年三月俄國革命勃發，許司曼召集第二國際會議于斯德哥爾摩(Stockholm)，然因英法兩國政府不給予該國出席代表以出國旅行證，因之會議開不成功。

不過即在各交戰國之內部，仍有人力唱非攻之說。在德國，最先反對全國一致對外者爲李卜克內西(K. Liebknecht)，其時期爲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他和盧森堡(Rosa Luxemburg)女士，鍾吉茲(Leo Jogiches)及麥林格(Franz Mehring)等，共同活動，一九一五年三月，創刊國際雜誌，不久，又設立斯巴達團(Spartakusbund)，並且時常發佈『斯巴達團通信』的傳單。後一年，德國社會民主黨也呈分裂，屬於黑司(Hase)轉下者共有十八個政治議員，他們另行組織社會主義之勞動階級社會，該社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改組，是爲德國自由社會民主黨(Unabhängig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簡稱爲U. S. P. D.)。自此以後德國便有多數派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和少數

派的德國自由社會民主黨之分。此外，有斯巴達團，則具有革命之性質。——在法國，也有一個在野黨顯露頭角，牠的本質原來沒有德國自由社會民主黨那麼革命，其統率者為郎格德 (Jean Longuet)。然而其中有些左傾份子則逐漸傾向于共產主義，一九二〇年十二月，爲着決定對於第三國際的態度之原故，便召集大會，其結果以二三五二票對一四三〇票之比例，其黨便分爲社會民主派及共產主義派二者。——在英國，則由原有之社會民主黨分出共產主義派，並且分離的份子，在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一年，改組爲共產黨。此外，在巴爾幹，意大利，荷蘭，瑞典，挪威，丹麥，及北美合衆國等，都有同樣之分裂。總而言之，當戰時及戰後，盡把從一八八九年至一九一四年第二國際所發展之原理及戰術之反抗。完全丟棄。社會改良及革命的主張，都逐漸形成爲實體，並且在數次動搖之後，即形成爲續繼着第二國際之「社會工人國際」(Sozialistische Arbeiterinternationale，簡稱爲S.A.I.)及革命的第三國際。

現請先言一九一九至一九二八年之『社會工人國際』。

(2) 第二國際之新現象

想將各種改良主義的(社會民主的)政黨重新合作，實是最困難之事情。因為法國及比國的民族之感情，都聯結起來，反抗德國之社會民主黨，這是該兩國的少數派之態度；至于多數派雖與之表示同感，然也不能壓抑少數派之民族感情以同處于一個國際之下。戰後第二國際之第一次會議，召集於比因(Belgium)，其時期為一九一九年二月第一個星期，在大會中，德國社會民主黨竟被迫而要表示其錯誤。同時，大會又宣言民主政體，反抗獨裁，會中少數派代表，反對俄國蘇維埃民主制之印跡，其希望是在於成立一種統一國際，連布爾塞維克也包含在內。然而在最後的會議看來，却證明這種希望是假偽的，所以少數派在一九二一年的維也納會議中，通過設立一個『國際勞動社會主義

黨』（簡稱爲I.A.S.P.亦名第二個半國際），牠接納第二國際及第三國際所處理之一切重要問題。牠和兩方面都常常聯合召集特別會議，但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三年期間，第二個半國際漸漸衰弱，其原因實在於其中有一半黨員與第三國際相聯合，而一半則因爲再採用原日的社會民主黨之組織，所以當一九二三年五旬節日，第二國際邀請牠參加漢堡會議之時，牠欣然參加，極表融和，從此，第二個半國際便宣佈解散，而歸併於第二國際之中，稱爲『社會主義勞動國際』（*Sozialistische Arbeiterinternationale* 簡稱爲S.A.I.）。一九二三年之漢堡會議實爲社會民主黨之戰後第一次會議。社會主義勞動國際第二次會議於馬賽（*Marsellier*），時期爲一九二五年八月，一九二八年又開會於不魯塞，是爲第三次，這幾大會議之決案，此處無暇詳述，但其原則上之觀點及社會主義勞動國際之戰略，可從下文說明之：

一九一七到一九二〇年之舉行於東歐及中歐之革命，其性質並不是社會的及無

產階級的革命。所以資本主義之秩序，完全沒有損壞。俄國所經過的爲農民革命。這是擁有古代偉大民族性之被壓迫民族的大勝利。德國之勝利者爲民主主義；比利時工人得普通選舉權，英國則得有完全選舉權。同時，社會民主政黨及勞動黨，都爲着要妨範布爾塞維克主義之侵入，而堅立其社會主義勞動國際之標幟。牠們整頓一切秩序；原日政治之解體及經濟之擾亂，都非常重要，但社會民主黨却卓立起來，不畏艱苦，以實力重興一切。他們表示擁護國家。他們要求在政治及經濟之重興上，得有同等之特權，實行監督之責，希望這樣可以免除復興種動之中爲資本家所完全操縱：換言之，社會民主黨在國家及經濟之事件中，要有相當權力，以考慮及處斷勞動階級之一切利益。』

上面所述便是牠的觀察點和略策之大綱。從這樣的大綱，便發生所謂國會式之聯合政府，而勞動公會便處於企業家和工作者之中。

戰後社會民主黨之顯著標記便是承認參預混合內閣，或且單獨組織內閣，這是贊助資本主義政黨之表示。這種事情在一九一四年之前是不可能的。但在法國，則一八九九至一九〇四年，社會主義者如米拉蘭 (Millerand)，白里安 Briand)，和維維尼 (Viviani) 等，曾經參加資本主義之內閣，然而他們未經勞動階級之大多數所認可，而他們便被斥逐出黨。反之，在一九一八年，這一派人出而組織內閣或參加混合內閣，其勢力雖仍在少數派之中，但為社會民主黨所公認許。按照考茨基 (Karl Kautsky) 之說法，則混合內閣（並非無產階級之專政）才是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之轉形期。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九年，混合內閣及少數派內閣，陸續出現於德，比奧，匈，大不列顛，丹麥，瑞典及捷克斯拉夫諸國。雖然在牠們之中，也有小數之左翼份子，提倡異議，反對社會民主派加入混合內閣之中，但從這些黨派看來，則這樣妥協，與階級鬥爭並無衝突。由是，社會民主黨之策略隨處為大多數黨員及勞動家所贊許及援助。混合政府對於

資本家及工人，則採取農工經濟政策。

(3) 列寧及列寧主義

當社會民主黨在戰後的資本主義動搖中變而為擁護祖國之改良主義政黨之時，革命的馬克司主義却復活于社會主義國際之內。其開山始祖及前鋒戰士實為列寧，他是布爾塞維克學說，政策，及組織之領袖。

列寧原名為烏立雅諾夫 (Ulianow)，一八七〇年，生于辛比爾斯克 (Simbirsk)，為該地學校監督之子。十七歲時，其兄謀殺俄國沙皇，被處死刑。列寧為學生之時，研究法學，因參加革命運動，致被開除學籍。當九十年代之時，他領袖着『勞動解放鬥爭同盟』 (Kamrfbundes Zur Befreiung der Arbeiter) 為聖彼得堡工人罷工運動之響應 (一八九五年)，他又組織報館，以批評勞動者日常需用之不足，督促勞動者之暴動。

他站在馬克司派之立場，與社會民主黨員相爭論。其結果，便是被捕，並流放于西伯利亞，其後，又放逐于國外，流亡于法英瑞士等歐洲國家之間。他著作品有關於俄羅斯社會民主黨之各種問題及俄國資本主義演進史。從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三年，他和蒲列哈諾夫 (Plechano) 創刊火花 (Iskra) 雜誌，設立中央委員會，以期俄國勞動階級之團結。在俄國社會主義政黨分裂之時，列甯始終站在左翼，反對改良主義和投機主義。一九〇三年，在倫敦會議席上，布爾塞維克派尊為首席，以組織完全獨立之政黨。一九〇五年革命後，經過一度極恐怖的反動時期，到一九一二年，反動又起。列甯在這幾年之中為布爾塞維克派之領袖，同時又是門塞維克(少數派)之殘忍的鬥爭者，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革命成功後，被選為人民委員會主席。一九一八年為一個社會革命派的女黨員狙擊，受重傷，未幾恢復原狀。但卒因過勞之原故，于一九二四年病歿。

馬克司及昂格思在十九世紀所發表之經濟的社會主義及勞動運動，列甯以為這便是

近代社會主義之學理上的實驗。在列甯死後，自然便把其學說，當爲成功之因素，總稱爲『列甯主義』。不過這一個名稱，並沒有和馬克司主義對立之意義。因爲列甯終生都尊崇馬克司主義，而爲其正宗之黨徒。所以施塔林(Stalin)在一九二四年的列甯主義的問題(Probleme des Leninismus)一書中，說道：『列甯主義是帝國主義及無產階級革命時代之馬克司主義』。詳言之，列甯主義祇是馬克司主義方向之遵行及應用而已。

(一)列甯主義與馬克司哲學——馬克司之世界觀全爲列甯所接納。馬克司及昂格思之辯證法的唯物主義曾爲馬黑(Ernst Mach)所修正，成爲軟弱無力之學理，而列甯在其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Materialismus und Empirio-kritizismus)一書中，詞而闢之。他以這一種馬克司主義之絕對認可，確定馬克司之世界觀，使成爲哲學的馬克司主義，並應用之于現代俄國，以爲一切經濟研究之基礎。

(二)列甯主義與馬克司經濟學——當資本主義威權之進化尙未爲馬克司及昂格思所

能觀察之時，馬克司經濟學是未能完成的，但到列甯，便可由他之試驗而擴大其範圍。本來昂格思于一八八三年便已在其社會主義之進化研究當中，預先說明特權資本主義之將來，但對於帝國主義時代之內容，還沒有所論列。列甯接受了現代資本主義之經濟結果，因而檢驗帝國主義之真實原因，他又由學理之攷驗研究，以抉出最重要之馬克司終局論斷，一九一七年，他著帝國主義爲資本主義之最後階段 (Der Imperialismus als jüngste Etappe des Kapitalismus) 一書，闡明此義。列甯最重要之工作，尤在于分析和溫和的近代社會改良主義之經濟的原因，他以爲這完全是資本主義在有特權之殖民地的特別利權的剝削。于由這種帝國主義之現況的認識，于是列甯曉得必須聯合無產者之世界革命及殖民地民族之解放運動，才可以反抗列強帝國主義之壓迫。他又指出世界各資本主義之國家，其經濟的結合是不可能的，其進展是衝突而不平衡的，所以世界資本的統系連鎖必會破壞，而在連鎖的關節之間，便發生了俄羅斯一國之經濟的及政治的特別

情形。

(三)列甯主義與馬克司政治學——列甯主義把馬克司政治學之範圍加以展開。列甯推廣馬克司的國家與革命之說法，他在著名之雜誌中，討論『國家與革命，馬克司之國家論與革命中之無產階級問題』，他把馬克司及昂格思之著作，爲一次有系統的整理。列甯爲無產革命第一次勝利之首領，他面面對着世界歷史進化所發生之種種難題。按照他在一八五二年二月五日致 Weydemeyer 的短札之論旨，他完全屬於馬克司主義，他以爲過渡到完全社會主義之時期應該是無產階級專政。這種專政如何實現呢？馬克思時代的巴黎公社已經給我們以一個可靠的論據。列甯現在便把資本主義之民主政體和無產專政之制度加以劃清，惟有蘇維埃組織，無產者才能得獲勝利。勞動者與農民之結合實爲俄國羣衆革命與西歐各國之特殊情形。馬克司主義之普遍性可如下述證明：列甯上繼馬克司與昂格思學說之中心點，和社會民主派，大異其趣。一八九四年，昂格思曾論

農民實爲『工人之聯盟軍』，而一八五六年，馬克司又發表『援助農民戰爭之第二次開始的無產革命』（見馬昂二氏彙集第二卷一〇八頁）。在列甯之政治學中，需求農民爲必然之聯合戰綫。而勞動階級在這一種同盟之中，爲適應高級之經濟進程的原故，必須得獲政權。還有別一種政治事件，列甯以爲便是民族定律自決之聲明，一個被壓迫民族，儘可以分離而獨立。這一種列甯之政治學實發生于俄國之特有的情況，俄國沙皇時代，曾用壓制之手段，把無數小國聯合起來，而處于自己威權之下。列甯以政治學上之觀點，曉得一切民族應受同等之待遇，這樣，才可幫助無產革命之成功。列甯真是一個聰明的政治家，他在危急存亡的戰爭談判之中，認識分明，不屈不撓，絕不退縮，絕不妥協。但他在俄德和議于 Brest-Litovsk 之時，明瞭這對於俄國，實爲一種必要，因爲這樣，俄國紅軍才可得一個休息的呼吸機會；其後他在一九二一年，又實行停止戰時之共產主義，在新經濟政策指導之下，確定農工偉大之利益。

列寧領導布爾塞維克確定無產專政之制度，而他的政黨及其國際上之同派亦心悅而誠服之，他便決定如下之各種革命政策：強有力之民主集權制，鐵的紀律，黨的制裁，和武裝暴動及革命羣衆行動之準備。用各種產業的單位爲政治的基礎單位，努力于革命的社會主義之鬥爭，因以代替了西歐各國社會民主黨之地位。他又令第三國際之各國支部有整嚴之組織，因以代替第二國際之各獨立而鬆弛的地方支部。

共產主義政黨爲中堅之組織，牠領導着無產民衆追求利益，並且把半無產民衆納于正軌之中——這是列寧在第三國際大會之會詞中的名句（一九二〇年）。列寧爲革命的鼓吹之大戰略家，但是他又反對過于橫暴之激烈主義。他在其著作社會主義中過激主義之幼稚病一書中（一九二十年）說：『祇有前進，不能得勝。』（八十六頁）。他又在革命原理一書中說：『假如下層社會不想停在古式之生活，而上層社會又不能停在古式之生活，則唯有以革命得獲勝利而已。』（七十七頁）。

(4) 一九一七年之俄國革命及社會主義之復興

在世界大戰期間，俄國軍閥釀成各種特殊的損失，如各種國家機關之廢棄，和一切國內經濟之浪費——凡此種種，都足以引起社會民主黨革命之興起，尤其是布爾塞維克之發生，與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反對派之冷嘲熱諷——這些種種原因便鼓吹一九一七年總同盟罷工之急進，參加者凡四十三萬二千人，那時民主黨徒集合于彼得堡及各地工場中。與民衆爲敵之軍隊也降服于民衆。同年三月二十五日，俄國沙皇簽名辭職，實行退位。爲多數民衆所擁護的『臨時內閣』獲得了統治的地位。但當第二次革命的怒濤湧進了彼得堡之時，蘇維埃工人代表會在臨時內閣之附近開會，會議中，布爾塞維克大顯身手。當時國際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綫不會想及適合民衆之要求——和平與麵包——所以在世界大戰當中，牠已經崩壞了。克倫斯基 (Kerenski) 準備單獨地以極大的攻勢，大

張旗鼓，向加里敘賢（Galizischen）地方進軍，而不與布爾塞維聯克合，其結果都歸失敗。這種戰爭繼續之政策為社會主義派和社會民主黨所堅持，例如法國社會主義的領導者及堅阜爾（Genfar）支部的領導者托馬斯（Albert Thomas），對於這一次戰爭，曾說出下面的話：『參加戰爭，直到最後勝利為止』，英國工黨黨員安特生（Henderson）在蘇俄彼得堡還講述戰爭持續的問題。但六月時間之總攻擊，却完全歸于失敗之狀態。軍隊之精敏究勝過統兵之將軍十百倍。後來克倫斯基也得了一次勝利：然而還是最末一次之勝利了：全體武裝的布爾塞維克意外地在七月十五巡行示威于彼得堡，臨時政府加以極大之壓止，于是巡行羣衆大受創傷，報紙禁止出版，並把牠們之印刷機關毀壞，逮捕他們之黨員，加以拘禁：列寧易服潛逃，跑出了彼得堡。勞農和入伍兵也因為受着少數派的剛愎行為和聯合政府之監督而瓦解——這可以增加我們對於蘇維埃民主國成立之認識——促進布爾塞維克為下述之要求：『一切政權要歸于蘇維埃。』因為政府對於土

地所有權之猶豫和顛倒之措置，于是便增長反對政府派和社會革命派之勞農部長遮勒諾夫(Tschernow)之權力。一九一七年九月，彼得堡的無產階級襲擊專制獨裁之統兵者科爾洛夫(Kornilow)。同年十一月七日，布爾塞維克黨人穿上了軍服，依着原有計劃，踏着大步，實行暴動，到底顛覆了黑暗的克倫斯基政府。

農工兵第二次全俄大會公佈了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列甯被選爲主席。宣佈和平及土地分配法之施行，絕對政權和財產佔有權的推移之實行，這都是在歷史所能查核的。德司耶天年(Desjatinen)地方有五十億人民在活動的蘇維埃領導下服務。人民站立起來，把佔有產業的革命洪濤，洶湧地瀾漫于各地，大地主和大資本家一掃而空，蘇俄聲威震動大地。革命的怒濤摧毀了全球六份之一的資本家和大地主的虐待及國際帝國主義之壓迫。這是有史以來無產階級第一次革命成功，在這次革命之中，無產者洒放自己的鮮血，并不借助他人，因而奪取政權，躋于最高之位置。過去的國家權力機關，受了最大

之打擊而解體，即其軍隊也碰着了同樣的處置。勞農政府依舊循着列寧的吩咐，努力踏入和平之路。這種事情卒致實現于德國王朝之最後的時代，青春的蘇維埃共和國在 *Brest-Litovsk* 和約裏完成了掠奪和權力之解除。

在革命勝利的凱旋之前却發現了最大的難關。這種難關便是俄國內外的保皇主義和資本主義要保持自己地位而發生的反革命運動，這些反革命者穿着鴨形軍服，接受帝國主義接濟的金錢，并且贊揚社會民主主義之好處，于是歐俄及亞俄的蘇維埃全部，皆陷入于內戰之漩渦中。但即在這樣的困苦情狀之中，赤軍嚴密地組織起來，挺身在槍林彈雨礮火連天之火光中，抵抗反蘇俄的國際攻擊，和國內資產家的軍閥獨裁及其同謀者。赤軍抵禦敵人之敵愾，與一般人民並無異致，他們藉着社會主義勞動者的嚴厲檢查，因能洞見敵人之詳細情況。大多數勞動羣衆又和他們表示同情，共同合作，以抵抗爲民衆所共棄的及反革命之軍閥，所以勝利便易如反掌，他們之後援也爲赤軍所壓服。

蘇維埃勢力有可驚之膨漲，在一九一八年一九二一年當中，把各個反革命同盟之領導者，如Kornilow, Dutow, Kaledin, Petljura, Krassnow, Denikin, Kolschak, Awalow, Judenitsch, Wrangel及其他等都完全征服，或者驅于境外，牠并且把綿延八千格羅米突的前綫陣地之英法日聯軍逐去。

自然在這次戰爭之中，經濟紊亂之狀態，益形劇烈，這是國際帝國主義的戰爭和革命時代分娩的痛苦之必然的景象。一切農產品和工業品等有用之東西都因為戰爭而犧牲。一九二十年，為國家機關所分配的食物總量，如魚，肉，白糖等，每個赤軍，祇得平常的百份之六十，鞋匠可得百份之九十。一九二〇年農業產品降落至百份之四十八，大實業和大工業的純利減至百份之十八。各種汽車有百份之五十七尚在破壞之中，沒有修理。經濟之特殊困難影響到農業去，而社會主義下工業出產品又不足供給民衆之需求，民衆因此便直接索取農民之產品，戰時共產主義于是又禁止農產物之自由貿易，在

這樣的情境之下，農民喊苦連天。列寧看到了這一層，于一九二一年爲制止這種危險起見，便採行一種『新經濟政策』。（簡稱爲NEP）其意義便是『社會主義下的大實業及簡單以物品販賣的小實業都要基于市場關係上而集合。』

自一九二一年，這種情境實爲社會主義建立基礎，在這短小時間，已經企望着一切勝利，當時雖有資本主義列強之明顯的壓迫及摧殘，祕密的陰謀和詭計，與乎世界經濟勢力之束縛和壓制，但是牠們到底敵不過勞農政府。資產家依着國家須行之各種規則，得買賣品物及生產品物，其隨之而生的則爲國家之田租和地租，這是直接從社會主義下土地大產業的變態而形成的。在前綫戰事結束之時，出產方面已有相當之進展。在國家預算裏找得着經濟計劃之最高表現，而這種經濟計劃若能完成，則農業上的電氣應用及大規模的工業，都可以被引導而入于正軌了。

工農兵之文化革命又足以令『新俄國』之觀察者有更大之覺悟：無智識者之清算，

專門學校及大學校之激增——一九一三年大學校之數目爲九十一，而一九二六年，則增到一百三十四——，古物陳列所及影戲場觀者之突進，並且民衆還把這些地方當爲模範的民衆會所。百份之七十四·八的工場技師及場長都是先前的工人，而百份之七十一·四的律師，其前身也是工農羣衆。在蘇俄的國民學校學生中，共操有六十二種語言，但他們必須先曉得應用幾種以書寫他們的文字。兒童死亡率，一九一一年爲百份之二七·三，一九二六年，減到百份之一八·七。以上種種現仍在進展之狀態中。由此看來，蘇俄真是世界上一個惟一的國家，在其中包含有最廣大的羣衆——自然在其過渡期間不免有種種困難之發生及國際帝國主義之仇視，但是其工作之結果及收穫，還是世界上第一次之事件。

然而還有別一種的特點，就是俄羅斯國民精神完全孕育于社會主義的氛圍之內：他們要和國際集團及資本主義世界的壓迫和虐待相挑戰。有一個國家能像這一個國家一

樣，對於一切無產階級之自由奮鬥，付以熱烈之同情，例如一九二六年英國礦工之罷工，中國之國民革命，及一九二九年流血的五月之柏林市民的犧牲，蘇俄都表示着同感。俄國無產階級真是非常之幸運，蘇俄成爲世界上有階級意識的無產階級之「宗邦」，並且是他們的社會主義之希望和革命的最後理想之「本土」。

(5) 德國革命及一九一八年之反革命

一九一八年德國之十一月革命實爲戰事疲弱及國民經濟恐慌之結果。這兩種偉大的力量最後便造成這樣的情勢：由軍閥的霸權變形而爲資本主義之優勢，實爲不可再加毀壞的工作，在蘇俄方面，無產階級的革命指明自救的出路之力量，而在德國，則其無產階級革命之展開，也須藉助于極左翼的斯巴達團(Spartakusbund)及獨立社會黨共同的下層運動。最後，牠們二者也聯爲一起。一九一八年九月末，德國軍閥主義已在大戰之

中崩壞了，戰爭之大本營也陷于必須爲休戰談判之絕望中。爲德國社會民主黨薛德民 (Scheidemann) 及包爾 (Bauer) 所援助之普林馬克司 (Prinz Max) 出而接任德國之國務總理，其時期爲該年之十月一日。但是這種上層革命固然可以阻礙社會主義啓發之導綫，然而却不能阻止下層革命之蔓延。十一月三日，基爾 (Kiel) 軍港之海軍，勃起暴動，于同月五日及六日，向赫爾丹杜德 (Heldentod) 進發。同時，革命之火花，輝映于各個城市。十一月五日及六日，勞農會之威力蔓延于漢堡 (Hamburg)，呂伯克 (Lübbeck)，及布勒門 (Bremen)，而至于德國之中部及南部 (如 Stuttgart 及 München 等地)。十一月九日，革命勝利之火光已照耀着柏林城了。

歸附于社會民主黨之人數及機關，因爲明悉了社會民主主義的內容之原故，其數量有極速之增加，這像在天秤的兩方秤盤之上，投擲重量不同之物質，很顯然地可以看見一方急升，則他方驟降，就在上層社會也因爲斯巴達團運動之鼓盪因而受着普遍之影

響。普林馬克司不得已把國務總理之職權交給于歐伯爾 (Friedrich Ebert)，並且帶着痛心的悲楚對歐伯爾說道：「假如我仇恨革命，那便是一種罪惡了。」而當時德皇說道：「倘軍隊歸我掌握，明天我們便要向故鄉前進。」但他說了之後却立刻辭職。德皇逃往荷蘭去。凱撒之皇冠與德國之專制政體一同廢棄，這樣革命之勝利，不用流血便遍佈于全德國，恰巧在這幾天，革命的軍隊又戰取了奧大利國。

不過這種兵工會議所領導的德國革命，名目上雖是無產階級的武力，和社會主義性的革命，實則分明已發展為單純資本階級之革命了，自牠們第一次勝利的襲擊始，已以矛盾的革命而呈露了破綻，不久即歸于失敗。本來獨斷的統兵官是存有危險性的。這種事實在一九二〇年二月的 Kapp-Putsch 發生，發生之後，幾日間，便把權力集合在他們的身上。資產階級連合着社會民主派的資本制之反革命運動。至于社會民主黨之工人領袖則把戰爭之責任委於無產階級的身上，這和各軍閥及貴族之縹眉蹙額，實沒有什麼不

同。

社會民主黨之領導者實具有非常之敏銳，知道十一月革命的無產階級必不能勝利，所以他們便預防資產階級革命不蹈于以前之覆轍：十一月四日基爾革命之平靜，實為最大險象之呈現，像俄國一九一七年的十一月革命一樣。國家祕書局薛德民設置最速的傳遞方法以得獲俄國之政情，但他在十一月六日便被人逐出國外。

十一月十日，勞工會在柏林得獲了政治上之勝利，由多數派社會民主黨及少數派社會民主黨聯合而成立人民委員會，舉歐伯爾為領袖，以伯林為國都。然而聰慧的歐伯爾却在同日和原日之總司令部裏的 Groener 及其附從等祕密磋商，決定為柏林之肅清及斯巴達團武裝之解除等工作，結果，便是派遣大兵十團向柏林進發。當革命的勞工總同盟罷工以威嚇着德國威廉軍隊的時候，他在一九一八年正月，還是操演着他的軍隊。到底，歐伯爾及薛德民二人跑進罷工之場所去，以禁止罷工之風潮，因之，德國政府在

Brest-Litovsk 和約裏，便達到了略奪和平之目的了。

本來革命力量推倒了皇朝，依着社會民主黨領導者之指揮成爲單獨之系統，一般的趨向都朝着左邊走。發榮滋長的十一月勞工會革命似乎在地層之下跑了上來，在幾個月時間中，完全偏佈于德國各地，雖然這樣，牠們已成爲「政治上之自殺的團體」，一九一九年二月德國的勞工會開第一次大會。本來罷工之意義，用以爲無產階級對於革命時代酬勞分配之要求，然而爲少數派的社會民主黨加以最高的威壓，用嚴酷的刑法恐嚇他們。但是最重要的原因還是斯巴達團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三十日之倒塌。這個團體的組織便是爲德國共產主義政黨和無產階級而發生的。其領袖爲李卜克內西及盧森堡女士，他們是德國革命馬克司主義之著名領袖，他們創刊報紙，日日發揮革命之理論及宣傳。社會民主派對於斯巴達團非常仇視，想藉着政府之力量把牠無條件解散。但是柏林的羣衆也相當地武裝起來，政府方面急切無從下手。政府的警察和工人偵探雖極爲活

躍，然而斯巴達團仍極爲努力。前進（Vorwärts）報中有極激烈的詩句，爲宣傳煽動之工具。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五日李卜克內西及盧森堡兩人被逮，爲帝國時代之軍閥所慘殺。無產階級由此喪失了領袖，其他的工人領袖也處于同樣被逮捕的危險境地：如二月二十一日的愛司納爾（Eisner），三月十日的耶高茨司（Jogiches）。政府以威力鎮壓布勒門（Bremen）及漢堡等地之革命的罷工。比利茲（Bayrische）共和國爲社會民主黨所消滅，其時間爲一九一九年四月六日至五月一日。社會主義者李凡（Levine）在閱善（Munchen）地方受戰時軍法之槍決。這樣地資本階級革命完全成功，聯合着反抗無產階級！甚至德國中部的無產階級本以革命戰爭爲職志，然而現在也不得不屈服于軍閥霸權之下。白色恐怖及所謂法理之勢力遍佈全國。一九一九年八月十一日，德國頒佈了近代最完美的民主政治之憲法。

我們看一看德國十一月革命之結果罷：社會民主黨聯合內閣沒有一些東西給與無產

階級，而祇由純粹資產革命的路途以成立純粹的資產階級之政府。八小時工作制爲其他各戰後國所共同採用，而營業法之通過也不過是命令中之一種嘲弄而已。無產階級在壓迫之境境下，要完全退却了。然而當時革命同志黨徒和無產階級之犧牲是極大的。就在諾司基(Noske)地方，無產階級便犧牲了二萬人。第一任總統歐伯爾原來是一個小工，但他在工人之背後，採取急進的共產主義的敵對黨之態度。從一九一八至一九二八年，社會民主黨執政的十年中，把反對政府的社會主義者不可勝數地投入監獄去，禁止牠的報紙之出版，把牠的財產沒收。俾士麥在一八七八至一八九〇年中，頒佈了鎮壓社會主義之法律，現在都顯然地實施着。社會民主黨中產生了很多部長，交通長官，警察官，及其他無數低級的官吏，而這些官吏得獲資產階級的賄賂以自肥，却是屢見不一見的事體；社會民主黨之舉動是如何地公道而合理啊！

第十二章 第三國際

(1) 第三國際之形成與展開

在最近的社會主義運動時期內給與了我們三種事件，而這些事件都是隨着世界大戰的結束而發生的，這是三種特徵：

- 一，社會主義建立一種最新的國家形式，給與勝利的無產階級以絕對的政權；
 - 二，革命的社會主義發生一個變象，這便是一切資本主義世界的社會民主黨；
 - 三，國際社會主義的基礎是一切有階級意識的革命無產階級新戰鬥集團之體系。
- 俄國無產階級及其主張之勝利實是世界史上一件最偉大的事件，因為勞動運動之

分裂在戰爭的時期中是有決定的命運的，其原因，因由于當時各個資本主義政黨相互的聯合，但也因為無產階級不斷之失敗，工人們經過了種種艱辛，便不得已和傭主們暫時地融合于資本主義之範圍之內，然而這祇是資本主義及社會主義的最後之段手而已。由此，我們更應認識清楚列甯主義最重要的理論，因為在對方的資本主義上層社會之變動，這對于無產階級世界之進展，無疑地算是第一次之耽誤，然而窮苦民衆的下層階級，在各地各城之中，却已經發出很明顯的工作力量，而資本制度之本身也愈增加其怨恨，最後，便連各個上層民衆之所得也發生了問題了。

第二國際所聯合的是原日之社會民主黨，在其中，自然表現着上層社會之相當的勢力，他們因經濟之差別及政治的必然轉變，而成爲愛護祖國，并且爲祖國而獻身，此外，則改良的混合社會主義政府和資本主義的民主主義之崇拜者，也有與時俱增之現象，這一次世界大戰，大多數民衆都捲入戰爭之漩渦，而其結果，則死者二千餘萬，傷

者二萬餘萬，物質之破壞利損失凡二千五百億，然而同時牠也把勞動運動的下層潛勢力轉升于上層，自九十年來祕密運動的改良主義已達到了成熟的田地而進于開明地獲得政權，于是憑依着這種推進的力量，資本主義的國家也轉向于「民主主義之民族國家」了。

第二國際崩壞于一九一九年三月，同時在莫斯科成立了共產主義之國際，這是實行貫徹無產階級主張的馬克思和列甯的國際共產主義。列甯于一九一九年四月在第三國際的演講中，曾說出下面的話：「第一國際是國際無產階級對於社會主義論爭之基本陣營。第二國際是土地法對於土地等級運動的物質展開之新紀元。而第三國際則接受第二國際工作的結果，摒除投機主義，資本社會，和小資產階級社會之積痼，而開始無產階級絕對政權之實際的獲取。」

不過在第二國際進行着革命運動的時候，本來是向着國際資本主義的陣地張着反對

的旗幟的，而第三國際呢，牠所具有的決不是柔弱的反對力量，而是最狠毒和殘虐的敵對，這和第二國際之初期運動，實無異致。這便常常在新鮮而不可遏止的充滿着憎惡的鬥爭之中，呈現出資本家的最顯著之全部意識狀態。自世界大戰之後，無產階級曾有許多都處于殘酷和暴虐的階級鬥爭之中。

世界大戰後一年，國際無產階級發生急速進展之狀態。在第一次無產階級國際大會之時，代表人數祇有十九，一九二〇年，增到三十七，到一九二一年，無產階級的代表人數更增至五十二人了。到了第三次國際大會之時，決議起草二十一條特殊的規則，以制止那些搖惑不定而歸于向右傾份子之加入。同時，在他一方面，則羅致急進的左派之歸附。在這一次的國際會議之中，表明在資本階級的國會和改良主義的集團之內，實需要革命之工作。一九二一年那個年頭，事實明白地告訴我們，指明世界革命之潮流，已趨向着國際化之急速的進步。但從反對方面看，則各國之有產階級也呈顯着有勝利之攻

勢，這是因為牠們當資本主義仍在安定之情況中的原故。一九一九年正月柏林戰爭之失敗，同年三月比利茲（Bayrischen）共和國戰爭之失敗，同年八月匈牙利戰爭之失敗，一九二〇年無產階級赤軍之失敗，同年蘇維埃共和國赤軍進攻波蘭之失敗，和德國中部『三月戰爭』之失敗——這些失敗之噩耗，接二連三地傳到無產階級之耳鼓中，在這樣不良之境境當中，共產主義國際不得不採行『防禦陣地』（Verteidigungsstellung）和鼓吹團結之必要。而其最中堅之解決方法及其唯一之口號便是：進來罷！『加入我們的集團，我們會得獲勝利，我們會奪取政權，我們要大陸民衆之團結和合同工作，我們利用他們之力量，以達到多數之目的，我們所爭得的決不單是工人階級之多數。』（列寧在第三國際大會之演詞）

最近無產階級因反對資本主義而建立聯合戰綫，實爲各地無產階級運動之急切問題。在第三次國際大會後各個國際集團之新形成（如一九二二，一九二四，及一九二

八）便是無產階級努力建設鞏固之基礎，集合有組織之政黨，并且超出黨派的關係而為表示同情之扶助和邀約——這些都是集團的聯合戰綫之方法和歷程。

一九二三年，共產派受着兩種重大之打擊；第一次是在保加利亞，另一次則為德國之不戰而自敗的十月慘敗。這兩次失敗實為集團戰術上之特殊錯誤。第五次國際大會舉行于一九二四年，會中實行透關之研究，討論布爾塞維克的口號，換句話說，要在黨的變遷之已往痕跡中找出牠的變遷之要素，在這些要素之中，很明顯地是無產階級組織之進展和擴大，與乎集團勝利之必然性。

一九二八年開第六次國際大會，參加者有五十九個國家，五百一十五個代表，共產主義國際給與他們以完全的行政方針之宣言，這是將近百葉的小冊子（一九二八年九月一日議決草成的），其中載有戰略之標題，和最近社會主義運動之概況，由反抗國際帝國主義而發生的社會主義之必要。此外，對於「資本主義之趨向于社會主義與乎無產階

級之絕對政權』，也有很詳盡的說明。

無產階級運動的集中有兩種的開展：一種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在醞釀的情態下時有爆發——一觸即發——之可能，一種是第三國際對於國際資本主義種種壓迫之開明的及秘密的堅決之反對。

這種現象便是無產階級的急激而明顯的發展，呈在於我們之前，社會主義益發加強力量，並且暴露敵方之盲目的能力，準備為革命之鬥爭，以上一切，都是國際社會主義之事件。

(2) 社會主義國際化之進展

在以往的偉大資本主義國家下的社會主義運動，實在沒有怎樣重大的發展，像戰前的社會民主黨所能達到的地步。這其中自有牠的必然的原因，共產主義對於黨員的要求

是非常大的，牠要在運輸交通上，工廠營業上，和各種地方的經營方法上，都要有整個的革命精神貫注于其中，然而這便發生難題了，因為這樣，那便每一個共產主義黨員都應有一定的職務和効力，負在己身之上，然而社會主義實際上除了在俄國之外，都祇剩有幾個好看之名詞，並無實力。本來共產主義的政黨也是無產階級的最明顯的和堅決的先鋒隊，不過這些先鋒隊的數目夠不上己國的陸軍的人數而已。

除此以外，還有別一種原因，這便是敵對無產階級的偉大迫害——白色恐怖——漸漸兒增長起來了。共產黨也因為大部份是不法的行爲，因而不能留存在集團成長的期間之內，這是集團成長期間之必然的困難情狀。

但是最大的原因，還是觀念派之影響，在選舉中，在經濟之鬥爭中，在社會民主黨及其他種種政治鬥爭之中，都是如此。事實告訴給我們，凡整個過激的反對黨派都會以連合無產政黨為職志，而新的集團予以形成。然而在他方面，則社會民主派因難在尖

釘，陷于無立足之地，牠便脫離第三國際而孤立着。所以今日的社會主義真是任重而道遠。牠的心弦奏着悲哀之曲，牠的前面擺着很多困難的問題。但是好了，多謝上帝，現在可以解決了，因為在該黨之內已經能夠同時執行布爾塞維克教育之原則和革新之方法。

然而在社會主義的成長期間，仍常常有危險之現象，這在我個人看來，是這樣的。即如德國共產主義流行中的十年歷史（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九年），很明顯的可以看出共產主義成長時之許多困難。一九一九年在 Heidelberg 的共產主義政黨紀念日之時，勞動黨的無政府派和共產派脫離關係。一九二〇年，多數的獨立社會民主派又加入共產黨之社會民主派。一九二一年，『三月戰爭』之結果，素以善戰著名的將軍在利威司 (Levis) 領導之下，全行瓦解，脫離共產政黨之關係。一九二三年十月的失敗——因為兵額不足和左派社會民主黨對抗之不振——是本來必須以款項幫助 Brandler-Thalhei-

Big的中央黨的，但急進的左派在第二次的行動中竟不曉得聯結民衆之重要。因此，這一派便陷于孤立之危險裏。所以在一九二五年間，最重要的還是一種新的嚮導。社會主義的政府在左右艱難進退維谷之情勢中掙扎着。可幸在錯誤和反攻之狀態中，反攻之目標存有顯明之觀照！

一九二七年德國共產主義的黨員爲十二萬五千名，捷克斯拉夫爲十五萬名，法國爲五萬二千名，瑞典爲一萬五千名，美國爲一萬二千，而英國則祇有九千名而已。但我們不要忘記，所有這些國別的共產主義政黨，都表明有國際之趨勢，在革命鬥爭的一刻之內，動員之人數，可立即形成最大多數人，比較他們從前曾經登記爲共產主義黨員的數目多過數十倍了。

(3) 社會主義在殖民區域之廣佈

最近無產階級運動已經超出於歐洲諸國的範圍之外。憑藉看牠的巨大勞力之伸張，牠不僅想把一切資本主義的國土，渲染色彩，牠還想計議着遠地的大陸。當第二國際最後在不魯塞（一九二七）大會之時，事實上，仍沒有一個殖民地的代表參加，但當共產主義國際第六次大會（地點在莫斯科，時間在一九二八年）之時，非歐洲各國之代表，竟佔全數代表之五份之一，從各殖民地 and 次殖民地派來之代表參加大會的，已有七十二個了。

在這種情形之中，共產主義之著名宣言裏，所謂『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之標語，必會傳佈到為國際帝國主義的掠奪地和備受壓迫而生產缺乏的國家去。一九二〇年列寧在第二次國際大會中也曾明白地告訴我們，說世界上百分之七十的民族是屬於被壓迫的民衆，他們還在殘破的國土裏，迷戀着資本社會之民主主義的目的。所以民族之革命運動對於共產主義國際有很重要的意義。社會主義運動鼓吹各地殖民地的暴動和無產

階級之世界革命，而以正義爲基礎之革命的鬥爭，因此而有反帝國主義的騷動，例如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二年之印度暴動，一九二五年敘利亞及摩洛哥之暴動，一九二六年安南暴動，和偉大之中國革命，一九二五年中國革命勢力達到上海後的上海工人之被殺，和一九二七年以來的印度總同盟罷工。

國際帝國主義最後便要倒塌了，這是因爲資本主義國內無產階級的勝利之鬥爭和帝國主義殖民地內慘苦悲痛的民衆之自由戰爭互相連合。共產主義政黨黨綱所要求的也是：『一般被壓迫民衆之無產階級和努力工作集團裏的被壓迫羣衆應當如親生兄弟之密切，實行聯合工作。』

(4) 社會主義之最後目的

爲一切人類幸福的社會秩序的記號之社會主義是沒有掠奪和壓迫之痛苦的，然而經

過了幾千年之歷程，這都不過是幾個人的迷霧般的幻想而已，何時方是實現之一日。這幾個人在一切的悲哀聲浪和人間的污俗狀態之中，却發現階級是可憎惡的情形，同時又顯出一種熱望，這便是社會主義。但一到馬克司名著資本論出世之後，社會主義便成爲十九世紀唯一階級的政治標的合於科的法則了。自一九一七年俄羅斯工人和農人樹立蘇維埃共和國體而社會主義的建立已有了基礎之後，社會主義更屬於現實之事情了。

我們——在最大的歷史轉變時期端倪的我們——對於社會主義，應當用另一副眼光來測驗牠，當牠仍停留在社會民主黨之時。人們總以爲社會主義派之將來命運在于不可知之數中。社會主義之命令很簡單地表示着各種資本社會國家的責任依從着議會之多數爲準則。同時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先注意點便是交通事業之集中，所以有人以爲想瞭解社會主義之進程可以算一算民主國的統計學上的辦事處之數目和社會主義國家的最基礎的出產之關係，便可明白。然而在最近十年的事實上，指明這種比較方法祇是蓬萊仙境而

已。實在說起來，社會主義之進程是非常困難的，所需之時間又非常之久長。資本社會的民主主義決不是進入社會主義的門徑。牠決不能放棄牠的光榮的階級鬥爭以獲得政權。無產階級對於偉大政權之奪得是認爲毫無猶豫的。

所以政治革命的成功所能達到者，祇是經濟上和文化上的社會主義之基礎。經濟革命所實行的必然是各種偉大的經濟組織（如大工業，銀行，國際貿易，和交通事業等）之獲得。偉大城市和國家之運輸事業，應依社會主義同盟之組織法，加以逐步可能的實行清理和決算。牠如教育，金融，工資，及其他有工作能力的民衆之社會安寧的尋求，與乎其牠之價值，都有限制之規定。這便是俄國所稱爲的『新經濟政策』，而爲社會主義必然地建立于各國之原因。不過牠的範圍之過程是完全基于工業發達之程度，換而言之，便是基于資本主義國家現在所已達到的工業程度，而牠的進步，就是無產階級世界革命所達到的進步之階段了。

經濟社會化之工作，假如每地都是如此，則最容易看見的，便是文化之革命。因為爲資本主義所腐化，所以工作之生產，從人類看來，祇是一種不得不負之責任，和私人之利益，而這種利益祇爲個人的利益打算。牠必須藉助別種的生產以爲解決之方法，這便是教育的團結思想，和覺悟的集合交易。假如這些生產還在資產侵略下之過渡期間，便必不能合法地孕育着工作的生產品，並且即使有相當的提高之時，集合工作之利益分配仍不會援引「各人依其工作成績而分配」的原則的。反而言之，在已成功的社會主義社會裏，根本之分配法則是「各人依其需要而定」，他們可以無條件地自理。馬克司對於這些問題，曾在共產主義綱領一書中，很明白地告給我們，該文載馬克司及昂格斯之綱領之內，我們可以拿來參證。

社會主義之歷程並不是短促時間和沒有悲苦的歷程，然而牠仍是一種最重要而不可缺少的主義，在擾攘的今日，人類唯一的良方和救助，便是這一種主義。在現代資本主

義壓迫的情況之下，工業發達，達到最高頂點。『生產力與交通方法，很明顯地表演着牠的權威，這會成爲不測之巨禍，牠以後不會再有生產之能力，所具有的，祇是破壞世界之能力而已。』這是馬克司在一八四六年之演辭。給與我們的第一個炸彈便是世界大戰爭。便在最近，一切可驚可恨之危機和戰爭之危機也在在恐嚇着世人。在這樣波譎雲幻之狀況中，人類前面便祇有兩條路，這便是：我們要在社會主義裏尋求自救呢，抑或仍在殘酷的人間世沒落下去呢。這要我們加以選擇了。

全書參攷書目錄

第一卷 古代社會鬥爭史

Weltgeschichte in gemeinverständlicher Darstellung, herausgegeben von Ludo
Moritz Hartman, 10 Bde.

Cunow, Heinrich, Allgemeine Wirtschaftsgeschichte, 3 Bde.

Wiegler, Paul, Geschichte der Weltliteratur.

(三山三輔國中 雙加內疑)

Pohlmann, R. v., Geschichte des antiken Kommunismus und Sozialismus, 2 Bde.

Meyer, Ed., Geschichte des Altertums 5 Bde.

Eine moderne Bibelübersetzung bei Reclam.

Texte der Zitierten Griechischen und römischen Schriftsteller in guten Übersetzungen in: Osiander Schwab, Griech. und römische Prosaiker und Dichter in Helfchen zu 15 und 20 Pf. Verlag Kerler, Ulm.

Friedländer, Ludwig, Darstellungen aus der Sittengeschichte Roms, 4 Bde.

Droysen, Geschichte des Hellenismus, 2 Bde.

(以上爲古代社會門等書)

第二卷 中世紀社會門等書

Kautsky, Karl, Der Ursprung des Christentums (基督發之起源)

Schultz, W., Die Guosis. (Jena, Diedericho; Quellen.)

Renan, E., Die Apostel (Reclam.)

Bibliothek der Kirchenväter, Zirka 30 Bde. (Kosel and Pustet, Munchen).

Brentano, L., Die wirtschaftlichen Lehren des christlichen Altertums.

Lamprecht, K., Deutsche Geschichte, 16 U. 3 Ergänz Bde.

Kautsky, K. Vorlanfer des neueren Sozialismus: I. Der Kommunismus im

Mittelalter.

Meister Eckehart, 2 Bde.—Johannes Tauler, 2 Bde.—Heinrich Suso, 2 Bde; Alle

Diederichs, Jena.

第三卷 近代農民鬥爭與烏托邦社會主義

Mehring, Franz, Deutsche Geschichte vom Ausgange des Mittelalters.

Kautsky, K., Vorläufer des neueren Sozialismus. II. Der Kommunismus in der deutschen Revolution.

Engels, Friedrich, Der deutsch Bauernkrieg, herausgegeben von H. Duncker. (雙

國鐵式譯本)

Der grosse Bauernkrieg.—Die Wiedertäufer zu Münster.

Beide Bände herausgegeben von O. Brandt in der Sammlung "Das alte Reich",

Diederichs, Jena.

Franck, Sebastian, Paradoxa, Diederichs, Jena.

Morus, Thomas, Utopia, Reclam. (烏托邦)

Kautsky, K., Thomas Morus und Seine Utopie

Lafargue, Paul, Campanella.

第四卷 近代社會鬥爭及社會思想

Rühle, Otto, Kultur und Sittengeschichte des Proletariats, 2 Bde.

Rühle, Otto, Geschichte der Revolutionen Europas, 3 Bde.

Godwin, William, Das Eigentum, herausgeg. von G. Adter.

Kropotkin, Peter, Geschichte der französischen Revolution. 2 Bde.

(克魯泡特金之法國革命史)

Buonarotti, F. M., Babeuf und die Verschwörung für die Gleichheit.

Mehring, Franz, Die Lessinglegende.

- Wieland, C. M., **Der Goldene Spiegel**, Reclam.
- Heinse, W., **Ardinghells oder die Glückseligen Inseln**, Propylaenverlag.
- Fichte, J. G., **Der geschlossene Handelsstaat**. (Philos. Bibliothek, F. Meiner)
- Considerant, Victor**, **Fouriers system der sozialen Reform.**
- Rebel, A., **Charles Fourier** (Intern. Bibliothek)
- Saint-Simon, Henri de, **Neues Christentum.**
- Enfantin, Prosper, **Die Nationalökonomie des St. Simonismus**
- Beer, M.,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in England.**
- Owen, Robert, **Eine Neue Auffassung von der Menschlichen Gesellschaft.**
- Robert Owen und der Sozialismus. **Auswahl, herausgegeben von Helene Simon.**
- Gray, John, **Vom Menschlichen Glück**

- Hodgskin, Thomas, Verteidigung der Arbeit gegen die Ansprüche des Kapitals.
- Carlyle, Thomas, Der Chartismus.
- Schlüter, Der Chartismus.
- Engels, Friedrich, 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n in England.
- Stein, Lorenz V., Geschichte eder Sozialen Bewegung in Frankreich V. 1789 bis auf unsere Tage (1849), Neu herausgegeben von Gottfr. Salomon. 3 Bde.
- Proudhon, J. G., Bekenntnisse eines Revolutionärs von 1848, herausgeg. von G. Salomon.
- Blanc, Louis, Organisation der Arbeit.
- Marx, Karl, Der Bürgerkrieg in Frankreich.
- Marx, Karl, Der 18. Brumaire des Louis Napoleon.

第五卷 現代社會鬥爭史

Mehring, Franz,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1. Bis zur Märzrevolution.
2. Bis zum Preussischen Verfassungskstreit.
3. Bis zum deutsch französischen Kriege.
4. Bis zum Erfurter Programm.

Mehring, Franz, Zur Literaturgeschichte

1. Von Calderon bis Heine.
2. Von Hebbel bis Gorki.

Weiting, Wilhelm, Garantien der Harmonie und Freiheit, herausgeg. von F.

Mehring.

Quarck, Max, Die erste deutsche Arbeiterbewegung 1848. 49

Beer, M., Karl Marx (梁時之譯)

Mayer, Gustav, Friedrich Engels.

Biermann, W. E., Karl Marlo (Winkelblech).

Barustein, Ed., Lassalle. Zu Lassalle vgl. auch Mehring, Geschichte, III, S. 1 164.

Mayer, Gustav, J. B. Schweitzer und die Sozialdemokratie

Schweitzer, J. B. v., Politische Aufsätze und Reden, herausgegeben von Mehring,

Richardo, David, Grundsätze der Volkswirtschaft (Sammlung Sozialwissenschaftlicher Meister).

Lissagaray, Geschichte der Kommune.

Kersten, Kurt, Bismarck und Seine Zeit.

Bebel, August, Aus Meinem Leben, 2 Teile.

Kautsky, Karl, Das Erfurter Programm mit Kommentar.

Trozkij, Leo, Die russische Revolution 1905.

Sternberg, Fritz, Der Imperialismus

Luxemburg, Rosa, Die Krise der Sozialdemokratie 1915.

Trozkij, Leo, Der Krieg und die Internationale.

Frobelich, Paul, Zehn Jahre Krieg und Bürgerkrieg, 2 Bde.

Strobel, Heinrich, Die deutsche Revolution. Ihr Unglück und Ihre Rettung.

Hillgit, Morris,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Snowjew, Georg, Geschichte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Russlands. 6 Vorträge

1923.

Lenin, W. I., *Der Imperialismus als Jungste Etappe des Kapitalismus*

Radek, Karl, *Die Entwicklung des Sozialismus von der Wissenschaft Zur Tat.*

Illustrierte Geschichte der russischen Revolution 1917.

Illustrierte Geschichte des Bürgerkrieges in Russland 1917-21.

Reed, John, *Zehn Tage, die die Welt erschütterten.*

Hauptwerk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Sozialpolitik Verlag C. L. Hirschfeld, Leipzig.

此外還有馬克司，昂格斯，拉塞爾，盧森堡，列甯等全部著作及關於德俄二國革命的史實。

（在上列各書名中，其有漢譯文附于其下者，皆有漢譯本。）

民國二十三年八月初版發行

實價大洋七角（實買不折不扣）
（外埠酌加郵費）

社會鬥爭史

第五卷

現代社會鬥爭史

有著作權 不許翻印

總發行所

特約代售處

著者
翻譯者
發行者
出版者
印刷者

Max Beer

葉啓芳

程前
上海河南路一三六號

神州國光社
上海河南路一三六號

民光印刷所
上海新開路頭慶里

上海河南路一三六號
電報掛號七二七三
無線電報掛號七二七三

神州國光社發行所

重慶北新書局
開封豫都文書莊
雲南文化書局

武昌新生命書局
西安西安派報社

成都中國圖書公司
漢口現代書局

減低定價○元五角○分

神州國光社出版之歷史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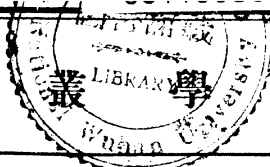
財政學史……一·八〇……阿部賢一譯著	國際運動史……一·二〇……張雲伏著	第一國際史……二·〇〇……G.M. Sleight, 吳樹仁張伯箴譯	歐洲哲學史……二·〇〇……馬爾文著	債票投機史……一·〇〇……摩特藍著	地租思想史……〇·八〇……高富素之譯	人類婚姻史……一·〇〇……Westermark 王亞南譯	日本現代史……〇·七〇……張谷川越次郎著	社會進化史綱……一·五〇……鄧初民著	法國大革命史……二·〇〇……克魯泡特金著	政治思想史 ^上 ……二·〇〇……Geertz 戴克光譯	政治思想史 ^下 ……二·〇〇……戴克光譯	政治學說史 ^上 ……一·五〇……謝義偉譯	政治學說史 ^中 ……一·五〇……謝義偉譯
--------------------	-------------------	------------------------------------	-------------------	-------------------	--------------------	------------------------------	----------------------	--------------------	----------------------	--	---------------------------------	---------------------------------	---------------------------------

政治學說史 ^下 ……一·五〇……謝義偉譯	中國哲學史 ^上 ……二·五〇……馮友蘭著	歐洲文學史 ^上 ……一·〇〇……金石聲編	托羅茨基自傳……一·二〇……托羅茨基著	太平天國革命史……〇·七〇……張霄鳴著	印度獨立運動坑略……〇·三〇……袁學易著	社會鬥爭通史第一冊……〇·七五……Max Beer 葉啓芳譯	社會鬥爭通史第二冊……〇·七〇……同	社會鬥爭通史第三冊……〇·七〇……同	社會鬥爭通史第四冊……〇·七〇……同	美國社會勢力發展史……一·〇〇……西門士著	社會形式發展史大綱 ^上 ……二·〇〇……庫斯聶著	社會形式發展史大綱 ^下 ……一·五〇……同	中國最近八年的革命與外交 ^上 ……一·〇〇……杜冰波著
---------------------------------	---------------------------------	---------------------------------	---------------------	---------------------	----------------------	--------------------------------	--------------------	--------------------	--------------------	-----------------------	-------------------------------------	----------------------------------	--

社 會 史 論 戰 叢 書

中國社會史論戰第四輯	中國社會史論戰第三輯	中國社會史論戰第二輯	中國社會史論戰第一輯	中國社會史論戰批判	中國農民戰爭史的研究	亞細亞之農奴封建之本題問質	中國經濟研究	追擊與反攻
胡秋原	胡秋原	胡秋原	胡秋原	李季	薛農山	吳清友	任曙	嚴靈峯
編	編	編	編	著	著	譯	著	著
○	○	○	○	一	一	○	一	○
•	•	•	•	•	•	•	•	•
六	六	六	六	六	四	七五	五	六
○	○	○	○	○	○	○	○	○

上 海 神 州 國 光 社 出 版



書 叢 學 哲

哲學大綱	哲學概論	歐洲哲學史	自然辯證法	中國哲學史上	戰鬥的唯物論	基督教之基礎	歷史哲學綱要	西洋哲學的發展	史的唯物論概說	希臘文明之潮流	胡適哲學史大綱批判	社會科學理論之體系	辯證法還是實驗主義
霍世英譯	金子馬威譯	彭信文譯	傅爾東譯	杜威之譯	馮友蘭著	杜畏基著	湯浩業啓芳譯	瞿世英著	Borchardt著	汪馥泉譯	王璧如譯	張栗原編	李季著
一·五〇	〇·八〇	二·〇〇	一·六〇	一·八〇	〇·五五	一·八〇	一·五〇	〇·九〇	〇·四〇	〇·八〇	一·〇〇	〇·八五	〇·五〇

上海河南路神州國光出版社

